2-67814

Fine Arts
DS
701
.W46

v.7

# 文物

# WEN WU

一九五九年　第七期

V
OF MICHIGAN
DEC 1 59
FAR EASTERN
ROUTING

方　　鼎　通高 24.2　耳高 4.6
足高 11.7　口径横 17.8
口径直 14.4 厘米

大　　鼎　通高 78　口径 56
腹径 58.4　腹深 35.4
耳高 16　足高 30.8 厘米

方鼎銘文

大鼎銘文

叔德毁銘文

德毁銘文

# 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談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簡化

郭沫若

1957年9月在上海文物保管委員会得見一个方鼎，形制甚古，銘凡二十五字（其中二字合書者二）。今揭其照片、尺度，并考释其銘文如次：

“隹（惟）三月王才（在）
成周，延武王
福自蒿，咸。
王易（錫）德見廿朋，
用乍（作）宝尊彝。”

延字有缺笔，殆范損，“說文”云：“安步延延也。”在此有等候之意，与迟字有等候意同例。

“武王”二字合書，乃周初彝銘慣例。康王时的大盂鼎銘“文王”、“武王”均合書。

福字作[illegible]，当是福之初字。卜辞中多有之。“我鼎”云“遣福二”作[illegible]，“毓祖丁卣”云“王在廙降令曰归福于我多高□”作[illegible]。福者胙也，祭祀之酒肉也。古者祭后分送其酒肉曰“致福”或“归（饋）福”。“周礼天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国語·晋語”：“必速祠而归福”。肉易腐化，酒較能保持，故福字金文或作[illegible]，从示从酉，酉者酒器也；想見古人“致福”或“归福”乃以酒鬯为主。肉經醃制亦可保存，然道远处恐不易立致。

蒿通鎬，即鎬京。咸，表示事願成就。

此当为成王时器。器之形制、花紋、字体、文体，均合，当屬于周初。周室在鎬京对武王举行春祭，成王因事在成周（洛阳），未能亲临，故恭候其祭后之致福。候到，王賞德貝廿朋，德因以作器。德当即致福的使者，故受王賞賜。

德殆古德字，不知何許人。“史記·齐世家”太公之孙有乙公得不知是否即此，曾为王卿士者，待考。德传世的彝器却有四件。除此方鼎外，有一大圓鼎，与康王时的大盂鼎形制相近，現存上海博物館，一見即可知其时代相隔不远。今揭示其照片、尺度，并考释其銘文如下：

“王益德貝廿朋
用乍宝尊彝。”

这和方鼎为同时所鑄之器无疑。

易（[illegible]）字作益（[illegible]），可以看出易字是益字的簡化。但易字在殷墟卜辞及殷彝銘中已通用，其結构甚奇簡，当为象意字，迄不知所象何意。今其繁体字乃发現于周初銅器銘文中，豁然可見其簡化的痕迹。由此可見周人文化早传自殷，而殷人已在进行汉字的簡化。殷墟文化之前必然还有更长远的历史是毫无疑問的。

益乃溢之初文，象杯中盛水滿出之形，故引伸为增益之益。益字既失其本义，后人乃另創溢字以代之，这是汉字由簡而繁的一种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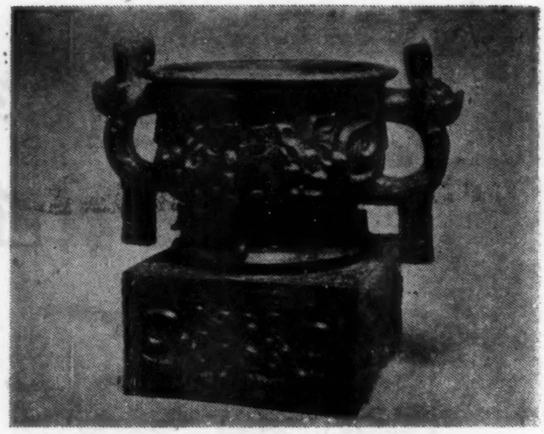
益既引伸为增益，故再引伸为錫予。錫予即是使无者有之，有者多之。但由益（[illegible]）而易（[illegible]）的变化，如无德器出現，三千多年来已失传，无人知道它們本是一个字。这是汉字由繁而簡的一种过程。目前犹有不同意汉字簡化的人，以为违背六書的規律，把形音义的系統破坏了。这是在所难免的。苟便于事，則不必一定要拘守旧規。請看由[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是在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已把形音义系統都破坏了嗎？

还有两件德的彝器已流入美国，藏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館，一为德毁，又一为叔德毁，“考古学报”（1955年10册）已著录，形制亦均甚古，断然屬于周初。

德毁銘为“王益德貝廿朋，用乍宝尊彝”，与大鼎同文，亦为同时所鑄之器无疑。

叔德銘云“王益叔德臣嬶十人，貝十朋，羊百，

徝　段



叔　徝　段

用作宝尊彝”。二段器制相近，必为同人之器，但不作于同时。称“叔徝”者，徝其名，叔其字，犹周公旦又称叔旦。

嬯字“說文”释为“迟鈍”，非其本义。案即“左传”昭公七年所謂人有十等中的“僕臣臺”之臺。“方言”三有儓字，云“农夫之丑称，南楚又罵佣賤謂之田儓”。此都表明古人曾以臺从事耕作，故臺在古时不仅为家內奴隶，也曾为生产奴隶。今嬯字从女，而以“臣嬯”并称，是犹言臣妾，盖謂賞賜男女奴隶共十人。“左传”昭公七年又有云：“是无陪臺也”，陪与僕通，僕与臺并言，盖亦犹“臣嬯”或“臣妾”。往者俗称夫人为“太太”，北地亦有呼丐妇为“太太”者，余頗疑此等称謂必有来历，可能是从嬯字音变而来。姑志此以备一說。

1958年6月10日

## 新疆巴楚县脫庫孜沙来古城发現古代木簡、带文字紙片等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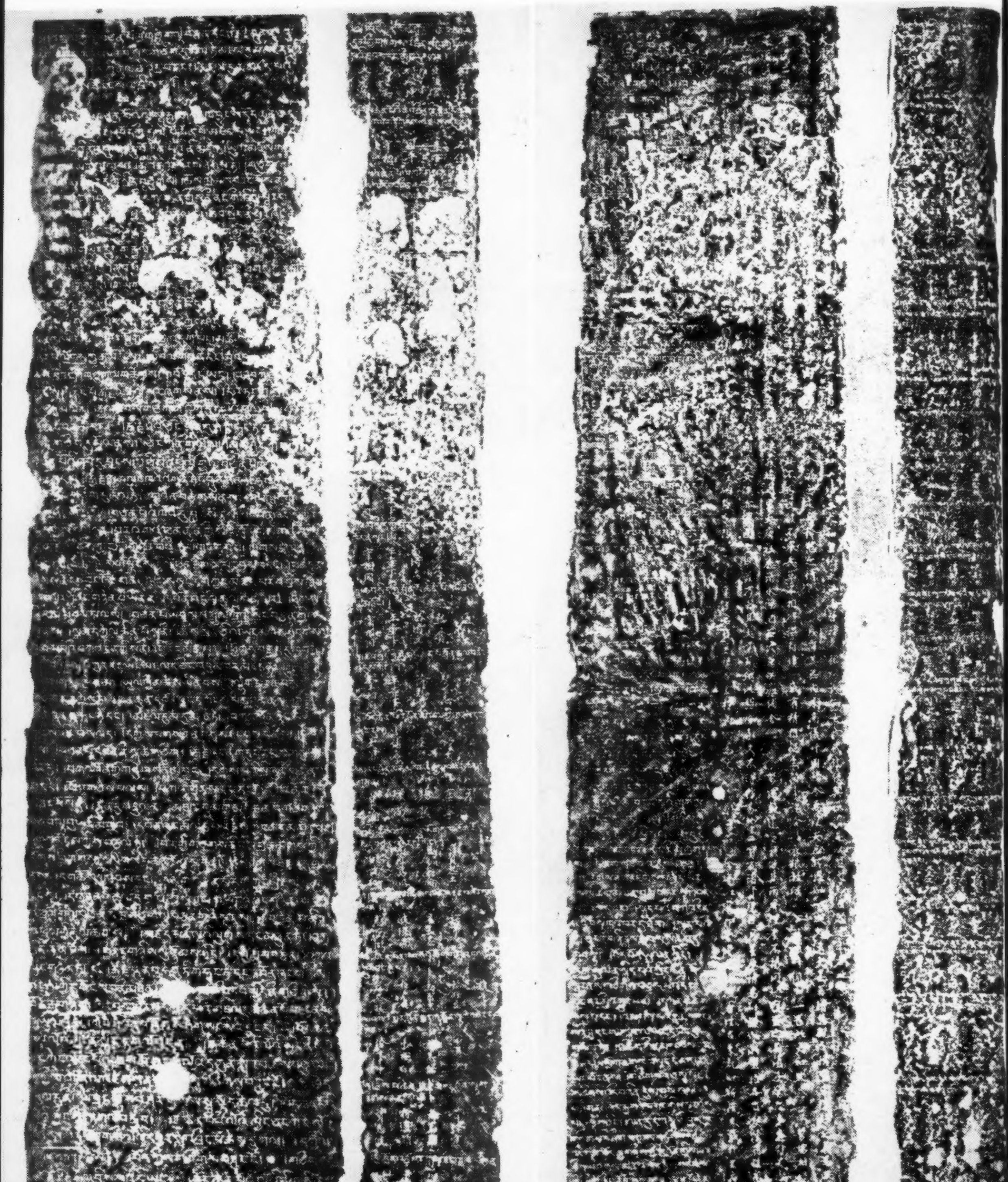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博物館南疆考古发掘队，在巴楚县脫庫孜沙来古城一带地方进行发掘和征集文物的工作。自四月下旬工作以来，到目前为止，所发掘和征集的文物就有三千多件。其中比較重要的发現有：有文字的古代木簡二十枚，有汉文和各种民族文字的大、小紙片一百五十多片，还有古代的麦种、棉籽、瓜果核等。

这批文物，是自治区十年来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发現。这个发現，将成为研究新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可靠綫索和宝貴的資料，新疆各兄弟民族的历史面貌，将从这些日益丰富的地下史料中逐漸地清晰地显示出来。（新疆博物館）

## 新疆博物館积极征集革命文物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目前正在积极筹建“新疆革命紀念館”。革命文物工作組，正在广泛地向伊犁、塔城、阿勒泰及烏魯木齐市等地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到目前已征集到的文物有：报章、杂志、图書、貨币、服装、兵器、奖章、旗帜等。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革命时期的宣言、土地証、革命先烈的遺稿和墨迹等。这些紀念性文物显示出新疆各兄弟民族，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爭中，所表現的英勇事迹。（新疆博物館）

唐 閻立本步辇图



长庆三年唐蕃会盟碑拓本

# 有关文成公主的几件文物

胡　嘉

在我們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往来已經有悠久的历史；汉藏两族的亲密关系，也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們在这里要介紹的有关文成公主的几件文物，不仅是汉藏两族亲密关系的标志，同时也說明两族人民的經济、文化交流，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 一

唐太宗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王松贊干布（弃宗弄贊）迎娶唐宗女文成公主，是汉藏两族友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历史記載："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贊普（王）弄贊嗣位，帝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弄贊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尙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賚金宝，奉表求婚，帝未之許。"①但是弄贊仍繼續遣使求婚，終于得到唐太宗的許可，于是弄贊"遣大論薛祿东贊獻黃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館河源王之国，弄贊率兵次柏海亲迎。"②

历史上还記載，弄贊的使臣祿东贊到了长安，"始入朝，占对合旨，太宗擢拜右卫大将軍，以瑯玡公主外孙妻之。祿东贊自言：'先臣为聘妇，不敢奉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敢辞！'帝异其言，然欲怀以恩，不听也。"③

关于松贊干布求婚、文成公主入藏和祿东贊辞婚故事，不仅在汉文和藏文历史资料中都有記載④，而且在民間还流传着許多美丽动人的故事，藏族人民对文成公主非常尊敬，歌頌文成公主入藏的"唉馬林儿"是藏族人民最爱唱的民歌；在西藏戏剧里，也有文成公主入藏的节目。

① 册府元龟卷978及新旧唐書吐蕃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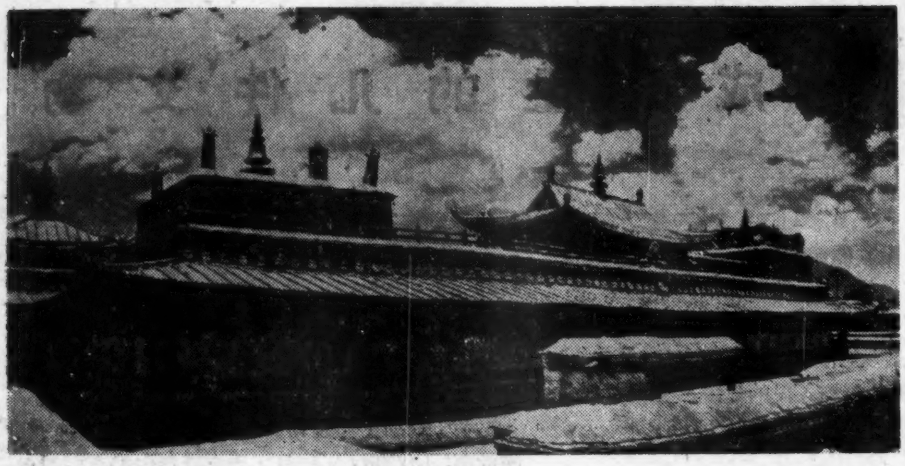
② 新唐書卷216吐蕃传。河源王之国及柏海在今青海。現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府結古南面的巴塘百南巴，尙存有文成公主入藏古迹，請参考本刊1957年第5期81頁报导。

③ 新唐書卷216吐蕃传。

④ 藏文历史資料如吐蕃王朝世系明鉴（rgyal-rab-me-loṅ）記載此事，并略有补充，請参考王忠著新唐書吐蕃传笺証頁29—38。

1　文成公主塑象　拉薩布达拉宫

2　吐蕃王松贊干布塑象　拉薩布达拉宫



3 拉薩大昭寺一角

我們在这里要介紹的步輦图（見本刊第3頁）是唐初著名画家閻立本（公元627—673年）对这一汉藏两族友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形象化的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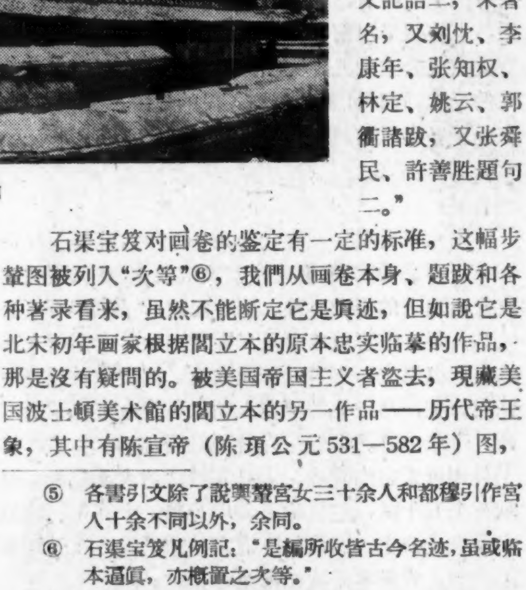
步輦图，在宋宣和御府收藏目录（宣和画譜）、宋米芾（公元1051—1107年）画史和元湯垕画鉴（公元1328年成書）里都有記載。明都穆（公元1458—1525年）輯鉄网珊瑚、张丑（公元1577—1643年）輯清河書画舫、汪砢玉（公元1587—？）輯珊瑚网画录和清卞永誉（公元1645—1711年）輯式古堂画考，都引录画鉴的說法如下："閻立本……步輦图画太宗坐步輦上，宮人十余舆輦，皆曲眉丰頰，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执笏引班，后有贊普使者服团花衣，及一从者。贊皇李卫公篆題其上，唐人八分書贊普辞婚事，宋高宗題印完，眞奇物也。"⑤

此外如式古堂画考（卷八）和佩文斋書画譜（卷九十六历代鉴藏五，清康熙四十四年輯，殿本），引录米氏画史的內容非常簡单，只說唐太宗步輦图有李德裕題跋，是閻令画眞笔。我們現在看到的步輦图画卷在画面上跟画鉴所說大体相同，但在唐太宗周围的宮女只有九人：两个宮女前后肩負，四个宮女分在四角扶持；还有两个宮女掌着扇，一个宮女在后面张着紅色伞盖。画卷后面的題跋，所謂"唐人八分書贊普辞婚事"，是宋人章伯益（公元1006—1062年）写篆書，不是唐人写八分書。而且所写內容，是祿东贊辞婚，不是贊普辞婚。其他題跋，和石渠宝笈初編（卷三十四）所記相同，現在把它引录如下："唐閻立本画步輦图一卷（次等），素絹本著色，画卷中幅署步輦图三字，卷后章伯益篆書本事，并署云唐相閻立本笔。拖尾有米黻、黃公器、张向、刘次庄、曹将美、陶舜咨、邓忠臣、张偓佺、曾巽申諸記語；又江灦篆書記語一，又田僩諸人記語一，又蔚宗記語一（姓闕），下署关杞二字，又琰記語一（姓并闕），又記語二，未署名，又刘忱、李康年、张知权、林定、姚云、郭衢諸跋，又张舜民、許善胜題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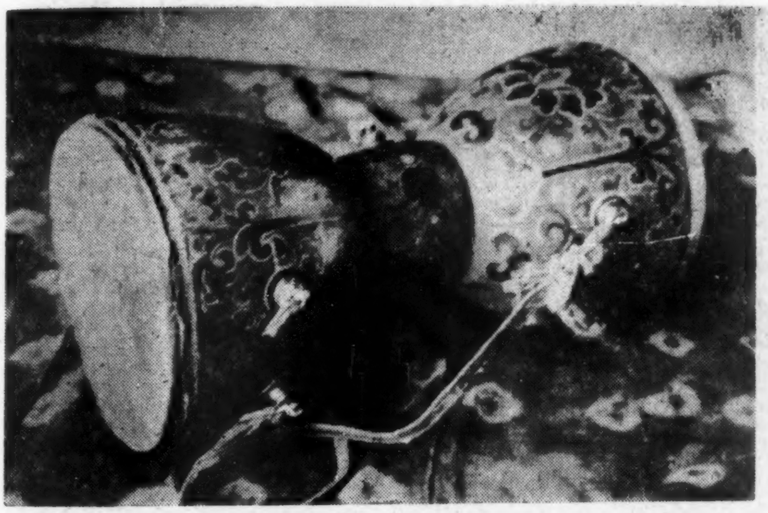
石渠宝笈对画卷的鉴定有一定的标准，这幅步輦图被列入"次等"⑥，我們从画卷本身、題跋和各种著录看来，虽然不能断定它是眞迹，但如說它是北宋初年画家根据閻立本的原本忠实临摹的作品，那是沒有疑問的。被美国帝国主义者盜去，現藏美国波士頓美术館的閻立本的另一作品——历代帝王象，其中有陈宣帝（陈頊公元531—582年）图，

⑤ 各書引文除了說舆輦宮女三十余人和都穆引作宮人十余不同以外，余同。

⑥ 石渠宝笈凡例記："是編所收皆古今名迹，虽或临本逼眞，亦概置之次等。"



4 大昭寺內的古代乐器



5 大昭寺內的古代乐器

画面結构和步輦图的唐太宗部分大同小异，不过把宮女改为“侍臣两人，从者并执扇各两人，(浩輿者四人”，据佩文斋書画譜（卷八十一）引录平园集所記宋人的評价，这幅图是历代帝王象里最好的⑦。但我們認为，如果把它和唐太宗步輦图相比，还略有逊色。而且，应該指出，我們对唐太宗步輦图的看法还不完全在它的艺术价值。第一、这幅图形象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祿东贊奉松贊干布之命見唐太宗是为了迎娶文成公主，唐太宗要把瑯玡长公主⑧外孙女妻祿东贊也是为了汉藏两族永远和好⑨。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过，唐太宗曾擢拜祿东贊为右卫大将軍。祿东贊是吐蕃王族，在松贊干布时任大相，松贊死后（公元 650 年），王孙年幼，政事专决于东贊。祿东贊死于公元 667 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十三年后（公元 680 年，唐高宗永隆元年），文成公主也死在西藏。在这期間（公元641—680年），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更加发展，例如唐高宗即位（公元 650 年）后，就封松贊干布为駙馬都尉、西海郡王；松贊也写信給长孙无忌說：“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国共討之。”并献金珠十五种以荐昭陵。汉藏两族在經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更頻繁，所以我們說步輦图是七世紀时汉藏两族亲密关系的标志，不是沒有根据的。

第二、步輦图是唐初杰出的人物画家閻立本的作品。閻立本是艺术家，同时也是政治家；他在唐太宗时就在朝廷做官，画过唐太宗象；在唐高宗时（显庆中，公元 656—660 年）为工部尚書，后来又拜右相（公元 668年），参与过对吐蕃的交涉。所以这幅画不仅是珍貴的艺术作品，而且还反映着当

时的实际情况。我們从历代著录看来，这幅画在內容方面，前半幅唐太宗部分仪宮女的人数有增減（原来有十余人以至三十余人，現在有九人），后半幅祿东贊部分完全沒有变化。如果說現在这幅画是摹本，估計跟原本未必有多大出入，由于原本并不是想象的虛构而是現实的描繪，摹本的历史价值仍然是极高的。为了紀念我国汉藏两族久远而牢固的友誼，我們面对着这幅伟大的艺术作品，不能忽略它的历史意义。

## 二

有关文成公主的文物，除了步輦图以外，在西藏現在还保存不少。我們选择几件来談談。

首先，得介紹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的塑象（图1、2），在拉薩布达拉宮和大昭寺，都保存着传

6 大昭寺內的古代乐器

說是从唐代传下来的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的塑象。松贊干布神采奕奕，具有英雄气概；文成公主容貌端庄，态度鎮靜；在她的臂弯里，还抱着一个孩子。我們看到文成公主健碩的样子，想到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从长安通达拉薩的交通情况，远非今天可以比拟，如果沒有强壮的身体，是难于长途跋涉，通过千山万水，克服艰难困苦，抵达西藏高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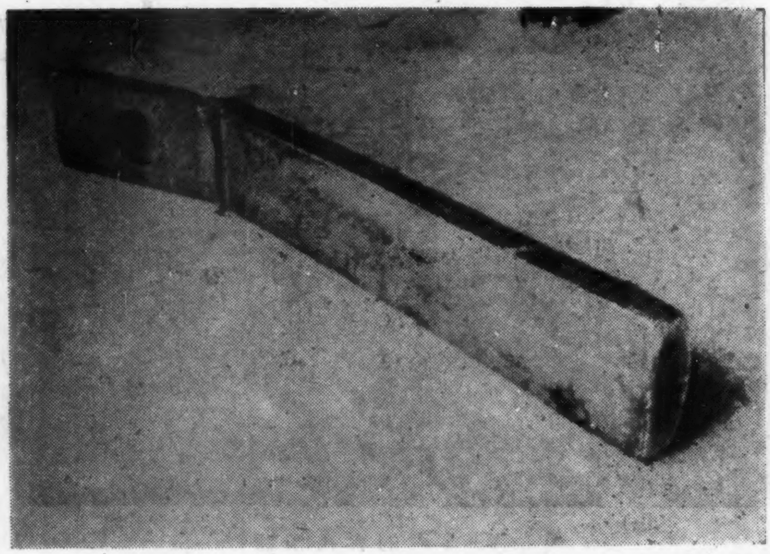
在布达拉宫，还保存着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結婚的洞房。

拉薩市区以唐代建筑大昭寺（图3）为中心。大昭寺的中心部分，是文成公主設計的，由松贊干布的另一王后尼泊尔公主建立（公元652年）。寺里供奉的释迦牟尼佛象，据传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它原来供奉在文成公主創建的小昭寺內。金城公主入藏（公元710年）后，才把它从小昭寺移到大昭寺⑩。拉薩的寺庙大門多朝南，独大昭寺寺門朝西，表示面向佛地；小昭寺寺門朝东，表示文成公主思念故乡。

大昭寺里还保存着各种古代乐器（图4、5、6、7）传說都是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乐队遺留下来的。这里发表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乐器一直被西藏人民珍貴地保藏着，只有在每年藏历二月三十日的亮宝会上，才把它和保藏在大昭寺里的其他文物一齐搬出来，在拉薩城里游行亮宝。这些乐器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史的重要資料。

大昭寺前小围墙內，有一株柳树，俗称唐柳，又称公主柳，传說也是文成公主手植的。

我們在前面列举的一些文物，都和文成公主入藏有关联；藏族人民怀念文成公主，因为她和随她入藏的一批人，包括工匠在內⑪，以及他們所带去的許多东西，影响了藏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并使藏族人民学会了不少生产技术，接受了他們传入的汉族和各族劳动人民累积的經驗和知識，比如建筑⑫、工艺、干支历法⑬、医药以及音乐、法律……等。藏族人民歌頌文成公主，实質上是通过文成公主歌頌汉藏两族的友爱和合作。



7 大昭寺內的古代乐器

我們在前面不过列举了几件有关文成公主的文物来談談，但从这些文物上已經充分說明了汉藏两族悠久和珍貴的情誼。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妄想趁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机会，来挑拨和中伤我国汉藏两民族有悠久历史的亲密关系，徒然显得它們的愚蠢和不自量罢了！

---

⑦ 除佩文著录外，仅在孙承澤（1592—1670年）輯庚子消夏記、李佐賢輯書画鉴影（1871成書）提及。

⑧ 唐代称公主仿汉制，帝女曰公主，帝姊妹曰长公主，帝姑曰大长公主。新唐書称以琅玡公主妻祿东贊，与章伯益篆書本事以琅玡长公主外孙女妻之意义不同。

⑨ 見吐蕃王朝世系明鉴。

⑩ 金城公主的兒子便是吐蕃历史上繼松贊干布之后的一位英明的贊普——赤松德贊。

⑪ 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在唐高宗时，又"請蚕种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并許焉。"后来金城公主入藏，"帝念主幼，賜錦繒别数万，杂伎諸工悉从，給龟兹乐。"（新、旧唐書吐蕃传）可見当时入藏的工匠不在少数；他們对西藏經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⑫ 新旧唐書、通典、唐会要都記載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贊干布曾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現在拉薩的古建筑如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等，传說都和文成公主有关，不是毫无根据的。

⑬ 黃沛翘：西藏图考說"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所流传。"現在西藏还传說干支历法是文成公主传入的。

# 跋唐蕃会盟碑

张政烺

唐蕃会盟碑，也叫"舅甥联盟碑"，立于公元823年，在拉薩大昭寺前，四周刻汉藏两种文字，是西藏的重要古文献之一。公元七至九世紀，中国境土上存在过好几个国家，其中国境最大的一个是唐，継承秦汉帝国的規模，人口最多，种族成分虽不尽是汉族，却以汉族为主，生产和文化在当时是最进步的，居于領导地位，代表中国的先进水平。其次是蕃，占有西藏及其附近地方，从作战出兵的人数估計，人口当不少于一百万，这主要是藏族。当时唐和蕃的边境大部分相接，他們的关系是"或弛或张"（旧唐書吐蕃传），所以如果能結成联盟，使人民达到和平生活的願望，这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一件大事情。

联盟的成立是在公元821年。这年是唐穆宗长庆元年，可黎可足贊普彝泰七年。这年唐穆宗新即位，可黎可足贊普派了两次使臣到唐去朝賀，接着又派遣使臣論納罗去請盟。当时請盟是有誠意的，唐也就答应了。这年十月十日，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和蕃使論納罗盟于京师长安的西郊，唐的宰相和大臣十七人参加了会盟。接着刘元鼎和論納罗入藏，第二年（公元822年）四月到达，五月六日在邏些（拉薩）設盟壇，"汉使与蕃相及高位者十余人相向列位，酋領百余人坐于壇下"。这时蕃已崇信佛教，最高的僧职叫作鉢掣逋，在上位設一榻，使鉢掣逋升坐讀誓文，讀訖歃血，并于佛象前作礼，"使僧諷文以为誓約"，說明土蕃当日很重視这次会盟。刘元鼎回程过河州的时候，土蕃元帅尚塔藏（即蕃相尚綺心兒）館待元鼎于大夏川，又招集土蕃的东道节度使将帅凡百余人看所署盟文，于台上高声晓讀，"因約束各守封界，无相侵掠"，可見土蕃对这次会盟和盟文的态度很認真。

立碑是在公元823年，即唐长庆三年，蕃彝泰九年的八月十四日，唐使太僕少卿杜載等参加落成典礼。这块碑現在还保存完好，拉薩大昭寺的大門向西开，碑立在門的右边，和传为唐文成公主手植的公主柳相伴。碑高一丈四尺五寸，广二尺八寸七分，厚一尺五寸二分，碑阳（向西）刻盟文，汉蕃文对照，按照汉蕃文字書写的习惯，右汉左蕃各占碑面的一半（有文字的部分約一尺寬），汉文每字約方一寸二分，直下左行，每行八十四字，共六行。蕃文横行，自左而右，依次而下共七十七列，每列字数无定。旧唐書吐蕃传載有这次盟詞，和碑文大义不差，文辞頗有出入，也删去了一些具体規定，显然是唐代文人学士們的修辞和諱飾，不算信史。碑文依照唐代习惯，尊敬唐蕃二主皆空三格，此外惟于盟約条文每条間各空一格，据此推断，当时所定条約实只三条，即

1. 蕃唐各守本境互不侵扰問題
2. 捉生释放問題
3. 驛使来往路綫与供应問題

这是当时土蕃急于定約解决的問題，在旧唐書吐蕃传里便不是很清楚了。

碑的右側（向北）刻着"大蕃宰相等和好登壇立盟官寮名位"，包括"大蕃宰相同平章事名位"（九人）和"大蕃諸寮案登壇者名位"（八人），先藏文后汉文，相間成列，以藏文为主，故汉文也直下而右行。左側（向南）刻"大唐宰相等和好登壇立盟官寮名位"，包括"大唐宰相同平章事名位"（五人）和"大唐諸寮案登壇者名位"（十三人），書写方式和右側相同。

碑阴（向东）全刻藏文，横書右行，自上而下共七十一列，記述土蕃的起源和蕃唐友好关系的历史，以及这次会盟經过、立石年月等等，大約是专为蕃人看的，沒有汉文譯文，頗有汉文里找不到的史料，是这块碑文的极可宝貴的部分。根据这段藏文記事，知道同样盟文的碑文在唐的首都长安也要树立一通，但不見于任何汉文記載，也从未被著录，大約未成为事实。

这块碑自公元823年树立后，巍然屹立于拉薩大昭寺之前，为汉藏两族亲密关系的标識，但因交通不便，汉族学者知道的人少，直到清康熙以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才被历史学家注意，大清一統志中曾著录碑阳汉文部分，当时会有拓本流传，惜未遇見。个人所見最早的拓本是乾隆年間所作，其次是同治光緒之交张之洞充四川提学使时派人所拓，皆四周完备。果亲王的西藏志曾录此碑，但移

写草率，錯誤很多。嘉庆时修的全唐文所据拓本較好，录文較为眞实。道光时刻的"西藏碑文"，也多認識出几个字，但皆限于碑阳汉文部分。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始兼录碑側，体例謹严，不仅审識文字，并記其行款。日本学者內藤虎在这个基础上又作过一次释文，曾参考藏文部分的記載，有所是正（見研几小录）。中国学者最早注意藏文部分的是陈寅恪先生，曾与蒙古源流蒙文满文本比对，作"吐蕃彝泰贊普名号年代考"，語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根据碑文中藏汉对音的材料（主要是碑側）作过研究，成"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書。以上各家考释碑文皆根据拓本为研究对象，拓本是手工成品，紙有完缺，墨有浓淡，每张不同，因此审識文字既各有所得也各有所蔽。今参考各家释文，彙集手头能找到的拓本和印本，重新写定释文如后（見附录）。有的地方可以文义推断，如盟文之末"登坛之臣亲署姓名，手执如斯誓文，藏于玉府焉"等字，笔画还較清楚，但因录者不解文义，却錯誤很多，一統志、西藏志所載尤不可通晓，"玉府"或錯成"王府"，按古代盟誓所用的玉敦珠盘藏于玉府（周礼天官），所以盟誓之文也藏于玉府，这是用典故。唐主称皇帝，蕃主称贊普，都无王的称号，何来王府？碑文是說参加会盟的大臣都签了名，并負責地拿着这样的誓文的原本，藏到国家档案庫里，也就是說用刻碑文的方式公布的并不是誓文的正本。

封建社会汉族学者沉溺于科举，研究历史者少，有藏族史知識者更少，因此对碑文有些錯誤的解释，見到碑文开头写"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內中有个德字，便說是唐德宗时的会盟碑（卫藏图識），有的書更干脆把"与"字释作"撰"字，一开头便写"大唐文武孝德皇帝撰"，認为碑文是唐德宗作的（西藏碑文）。我們知道，唐德宗时和土蕃虽有"建中之盟"，其盟文見于旧唐書吐蕃传，与此不同，参加会盟的唐蕃官員也和这碑側所載不同，絕对不能混为一談。只有两唐書吐蕃传所記"长庆之盟"，其盟文节要，和唐蕃参加的大臣姓名与碑文无不相合，陈寅恪先生更据碑阴藏文，指出会盟立石之年，吐蕃贊普名号，則此碑建立的年代已毫无問題。因为过去謬說流传，現在还未能肃清，所以在这里簡单解释一番。

专制时代，国家对外的和与战，取决于皇帝与貴族統治集团，人民是不能参加意見的，从"舅甥联盟"这类字眼也說明这一点，但和約如果能成为眞实，出現和平局面，使人民能过和平生活，从事劳动生产，对历史发展則是有益的。碑文記載了盟約三条，而最重要的則在"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即会盟的总的精神，这是汉藏两族长期以来的共同願望。这次会盟后，唐蕃一般保持了和平往来，經历五代两宋，直到十三世紀，西藏地区正式列入元朝版图，所以唐蕃会盟碑，大体講来，可以看作是标識着藏汉两族和平团結的紀念碑。

藏族从唐代称为"蕃"，碑文中常見"蕃"和"大蕃"等字，藏文系拼音文字，如果用拉丁字母移写則当为Bod，和"蕃"字的中古音相似，可見"蕃"字是用汉字記藏音，沒有文义可言，但因为藏族名是专名詞，所以自唐以来汉文書籍中便固定下来，长期不改。因为她在唐的西方，也叫西蕃，有时遵从藏族的习慣則称"土蕃"。这样称呼了几百年，因为汉語的中原音有了变化，"蕃"和"土蕃"的讀音和藏語已有了距离，到清初又改譯土蕃为土伯特（或图博特）。Bod是藏族自己的名称，用这个汉字"蕃"又是藏族在唐代自己所承認的，名从主人，理所当然。有些人誤会，以为这是汉人对藏人的侮辱或污蔑，这是不正确的。"蕃"字只是用它来表Bod音，本与字义无关，即以字义而論，"蕃"字本身只有繁盛、蕃殖……等意，絲毫不带侮辱污蔑的意思。

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她进入古代社会在七世紀，这时才有了藏文，在这以前的历史只有依靠汉文記載，而汉文記載藏族名所用的字則尙无一定，今日考証起来便感到非常困难。隋書有"附国"，后汉書有"发羌"，发字、附字和蕃字声音相近，从地望考証可以肯定就是藏族。再往上追寻，在商周春秋时的"濮"可能便是Bod的譯音。濮的分布区域比較广，往东到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一带，往南到云南北部，至于康藏高原的情况，因为交通不便反而記載不清楚。古書上常見"百濮"，說明当时部落繁盛，还沒能出現一个統一的国家。中国古史上第一次記載濮的活动是在商代末年，当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紀，黃河下游的奴隶制商王国出現了一个不可一世的暴君商紂王，憑借武力对內进行阶級压迫，对外进行掠夺財富和奴隶的战爭。周武王联合西北西南許多少数民族起来反抗，当时濮便是这支反压迫斗爭队伍中重要的一員。商紂王終于被打倒了，联合軍队胜利了，受压迫的人民得到解放。如果濮眞是藏族，这可以說是藏族人民的光荣史，她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現便是和各族一道，反对黑暗統治，体現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統精神。經过战国秦汉几百年間，生产发展，經济文化交流，长江中部的濮人和各族人民同

化幷融合了，构成了汉族的一部分，濮的名称在汉文書籍上也逐漸少見了。元代封駙馬章古鎮守西宁，称为“宁濮郡王”（明史西域传），“宁濮”的意思就是安定藏族，又用到了濮这一古老的名称，但这是由于文人学士好用古典的习慣呢？或是还有些語言学和历史学上的根据呢？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藏族的起源必很早，她的活动在汉文書籍里一定会有記載，决不是从唐代称蕃开始，有很大可能濮就是Bod的对音，这一問題目前还不能解决，因为談到唐蕃会盟碑里藏文汉文有关蕃族名称的問題，所以在这里附带講几句。

## 唐蕃会盟碑汉文部分（□缺字）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與　　大蕃聖神賛普　　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讚、是以盟文節目題之於碑也、（第一行）

文武孝德皇帝與　　□□□□都賛陛下、二聖舅甥、濬哲鴻被、曉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善、再續慈親之情、重申隣好之義、爲此大和矣、今（第二行）蕃漢二國所守見管都□□□□□□□□□□興實已西盡是大蕃境土、彼此不爲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　或有猜阻、捉生問事訖、給以衣糧放歸、　今社稷叶同如一、爲此大和、然　　舅甥相好之義、善□（第三行）每須通傳、彼此驛騎一□□□□□□□舊路、蕃漢並於將軍谷交馬、其綏戎柵已東、大唐祗應、清水縣已西、大蕃供應、須合　　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揚、罔聞寇盗之名、復無驚恐之患、封人撤備、鄉土俱（第四行）安、如斯樂業之

恩、□□□□□美之□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国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乃合其大業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寶及諸賢聖日月星辰請爲知證、如此盟約各自契陳、刑牲爲盟、設此大（第五行）約、儻不依此誓、蕃漢□□□□□□□□□□□禍也、仍須讎□及爲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

蕃漢君臣並稽告立誓、周細爲文、　　二君之驗、證以官印、登壇之臣親署姓名、手執如斯誓文、藏於玉府焉、（第六行）

### 右側漢文（字旁有點的是還有疑問的字）

大蕃宰相等和好登壇立盟官寮名位

大蕃宰相同平章事名位

□□□□□□政同平章事沙□□□□□□□□

□□□□天下兵馬都元帥同平章事尙綺心兒

□□□□□同平章事□□□□□□

天下兵馬副元帥同平章事□□□□

□□□□□□□□□□□

宰相同平章事論結賛世熱

宰相同平章事尙綺立賛窟寧悉當

宰相同平章事尙綺立熱貪通

宰相同平章事論頬藏彎悉恭

大蕃諸寮案登壇者名位

曩論琛尙頬熱窟寧賛

紕論伽羅篤波屬盧論賛熱土公

悉南紕波琛尙旦熱悉諾匝

岸奔樝蘇戶屬勃羅末論矩立藏名摩

給事中勃□伽論悉諾熱合軋

資悉波折逋額論悉□昔斡窟

紀論沒盧尙□纓勃藏他□賛

刑部尙書□論結□□賛

### 左側漢文

大唐宰相等和好登壇立盟官寮名位

大唐宰相同平章事名位

正議大夫門下侍郎□□

朝散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

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

中大夫尙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

正議大夫兵部尙書蕭俛

大唐諸寮案登壇者名位

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韓皐

朝議郎御史中丞牛僧孺

太中大夫尙書右僕射兼吏部尙書李絳

銀靑光祿大夫戶部尙書楊於陵

通議大夫禮部尙書韋綬

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兼太常卿趙宗儒

太中大夫禮部尙書兼司農卿裴武

正議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

銀靑光祿大夫工部尙書兼右金吾衛大將軍郭鏦

□□大夫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

□□郎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老

□□郎守尙舍奉御□□大將軍兼監察御史驍騎尉李武

朝散郎□京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 八思巴朝見忽必烈壁画

安 守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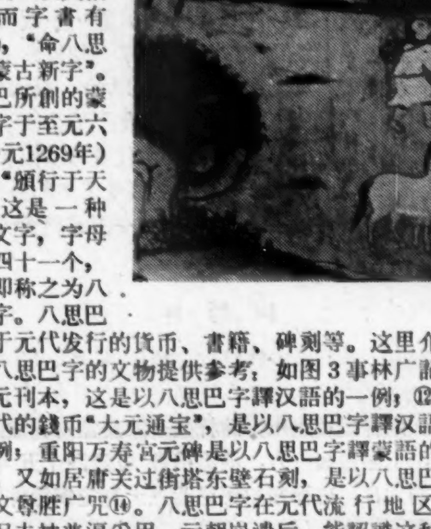
西藏地方自九世紀中郎达尔瑪自立为王至十三世紀初叶的四百余年里，內部紛爭，形成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战乱連年不絕。在这四百多年里，西藏人民沉溺在痛苦与灾难的深渊中。十三世紀初，元宪宗繼位之次年（公元1252年），即命皇弟忽必烈进軍西南地方。元世祖本紀載："癸丑秋八月……师次临洮，九月次塔拉，分三道以进。"①世祖平云南碑載："八月絕洮蹤吐蕃，分軍为三道，禁杀掠焚廬舍。"②元世祖忽必烈进軍西藏，西藏地区便結束了长期紛爭战乱的局面，因而也給西藏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安定生活。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薩迦派法王八思巴"謁世祖于潜邸"。③根据元史記載，八思巴不是一般的法王，而是掌握政治实权能代表当时西藏地区的最高法王，因之八思巴謁見忽必烈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会見。而忽必烈見了八思巴便"与語大悅，日見亲礼"④。我們这里介紹的几幅壁画，正是八思巴謁見忽必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好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西藏地方与元朝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这两幅壁画，是从日喀則班禅德庆頗章（汉語意为极乐宫）中近代藏族画家所作八思巴朝觀忽必烈壁画中选印的。第一幅是八思巴朝觀忽必烈途中景象(图1)；第二幅是八思巴謁見忽必烈的場面。(图2)

早在八思巴謁見忽必烈以前，元朝中央政府已和拥有实权的薩迦派法王有过緊密的联系。元太祖成吉思汗曾致書薩迦派，当时薩迦派即派喇嘛察克罗乍干阿难达噶尔貝去蒙古謁見成吉思汗，但到了今甘肃兰州，因病逝世；不久，元朝中央政府令在兰州修塔紀念⑤。到元世祖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以梵僧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⑥，并于"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領以国师"⑦。权授八思巴"掌释僧徒及吐蕃之境"⑧，并特别明文規定"其用人則为自选，其为选則軍民通攝，僧俗并用。"⑨元朝中央政府不仅授"帝师""玉印"給当时西藏薩迦法王八思巴，而且还建立了行政机构"总制院"，从組織系統上确保薩迦法王管理西藏地方的行政和宗教事务的权力。从此西藏地方便开始了"政教合一"的局面，薩迦寺也就成了元朝一代西藏地方的政治中心。

1. 八思巴朝觀忽必烈途中景象壁画

八思巴不仅是代表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政治和宗教职权的首領，同时也是当代杰出的語言学家。据元史載："(八思巴）年七岁誦經数十万言，能約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⑩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以文治寖兴而字書有闕"⑪，"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所創的蒙古新字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正式"頒行于天下"。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字母只有四十一个，后人即称之为八思巴字。八思巴字見于元代发行的貨币、書籍、碑刻等。这里介紹几种八思巴字的文物提供参考：如图3事林广記一書是元刊本，这是以八思巴字譯汉語的一例；⑫图4元代的錢币"大元通宝"，是以八思巴字譯汉語的又一例；重阳万寿宮元碑是以八思巴字譯蒙語的一例⑬。又如居庸关过街塔东壁石刻，是以八思巴字譯梵文尊胜广咒⑭。八思巴字在元代流行地区极广，但未被普遍采用，元朝崩潰后，能認識这种字的人就很少了。近年来許多学者从事八思巴字的研究，已有不少专門論著問世，帮助了人們認識八思巴字。

2. 八思巴謁見忽必烈壁画



3. 元刊本事林广記

由于八思巴是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和宗教首領，也因为創造蒙古新字有功，元世祖封他为"大宝法王"。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八思巴逝世，元世祖又追封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圣至德普覚眞智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⑮。幷建大窣堵波于京师，集藏眞身舍利，更命学士王盘述行状⑯。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詔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⑰，特別規定"其(殿)制視孔子庙有加"⑱，幷命法洪撰碑，赵孟頫書丹，元明善篆額⑲。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繪帝师八思巴象十一頒各行省俾塑祀之"⑳，元朝对八思巴表示了很大的敬意。

4.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币

---

① 元史世祖本紀。② 世祖平云南碑。 ③④ 元史释老传。⑤ 按塔現尙在，因塔建于兰州北山，俗称北塔，該山亦称北塔山。⑥ 元史卷四，世祖紀。⑦ 見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按元史載："因唐制吐蕃来朝見于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⑧⑨ 同上。⑩ ，元史二〇二释老传。⑪ 元史。⑫ 元刊本事林广記現藏北京大学。⑬ 碑在陕西盩厔，盩明人赵崡曾把文录入他所著石墨鐫华一書中。⑭ 居庸关过街塔在北京北郊昌平区。⑮ 元史二〇二释老传。⑯ 行状文見释氏稽古續略卷一。⑰⑱ 見元史二十七英宗紀。⑲ 文詳見释氏稽古續略卷一。⑳ 元史二十九泰定帝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 故宮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

朱　家　溍

西藏自古就是我国的領土，是我們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流传到現在的很多有关西藏的文物，就是历史的見証人。

本文只就故宮博物院所藏尚未发表过的若干文物，来說明一下明清两代北京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統一关系。

### 明永乐八年九月十六日敕諭

敕諭，明黃色描金云龙笺地，縱二市尺，橫約五市尺，墨笔楷書。首行为“大明皇帝敕諭剌麻失家摄嚭”。正文抬头書“朕惟佛氏之兴，其来已远，西土之人久事崇信……所在土官軍民人等听从本僧从便修行，益弘願力，丕闡宗风，为一方之人祈福。并不許侮慢欺淩，生事沮坏。敢有不遵朕命者，必罰无赦，故諭。”末行抬头書“永乐八年九月十六日”鈐“敕命之宝”一。

这是明永乐八年（公元1416年）北京中央政府給西藏地方的一道命令。明代制度，全国各地設有“指揮司”和“卫所”，烏斯藏地方（即西藏）当然也不例外，設有烏斯藏都指揮司。洪武十八年，命班竹兒为都指揮。永乐元年在必里和上邛，設二卫所，（見明史）这是管理軍政的机构。又有喇嘛八人，被封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管理宗教事务，从“所在土官軍民人等……敢有不遵朕命者必罰无赦”字样，足以說明一切行政宗教事务等，都需听从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据清史稿藩部列传第八載“崇德順治間，闡化王等番僧先后入貢，献前明敕印”估計这一类明代敕書从西藏地方又回到中央，是由于朝代变更接受了新的封号而繳还的。这一文件已于1956年移交国家档案局保存。

### 銅鈴杵

銅鈴，四周八宝瓔絡紋，柄作杵形，鈴內鑄“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款。通柄高22.5厘米，口径10厘米。銅杵縱13厘米，鈴杵盛一漆皮盒內。盒內裱紅緞，上貼白綾一方，墨笔楷書“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班禅額尔德尼恭进大利益銅鈴杵”。汉滿蒙藏四体文。（图9、12）

另一銅鈴杵，花紋式样同前，通柄高19.5厘米、口径9.5厘米，鈴內鑄“大明宣德年施”六字款。盒內白綾上墨笔楷書“达賴喇嘛恭进大利益銅鈴

1. 明永乐八年九月十六日敕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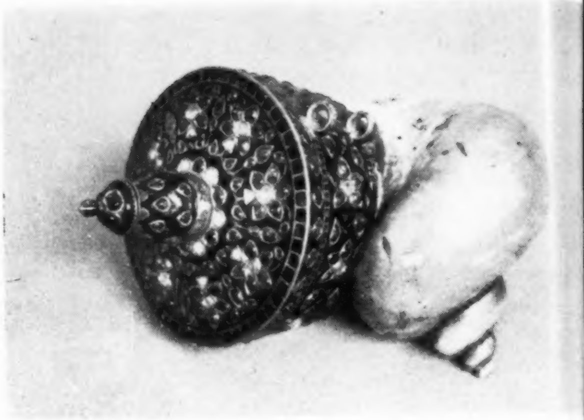
2 銀 曼 达

3 铜鍍金大拉木朗佛象

4 铜扎什利瑪无量寿佛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5　铜鈴杵（达賴进）



6　海　螺

7　白　螺

8　綠珐瑯靶碗

9　铜鈴杵（班禅进）

10　杂古杂雅碗

杵。”（图5、11）乾隆四十五年是乾隆的七十岁整寿，班禅額尔德尼曾到热河避暑山庄祝嘏，又到北京，鈴杵就是来京貢品之一。据明史卷三百三十一烏斯藏大宝法王等八人的列传中都記着到北京朝見皇帝得到賞賜的事。大乘法王列传更具体說“明年（永乐十二年）辞归，賜加于前，命中官护行，后数入貢。帝亦先后命中官乔来喜、楊三保齎賜佛象，法器、袈裟、禅衣、絨錦、彩幣諸物。”銅鈴杵是法器之一，这些有明代永乐宣德款的銅鈴杵大概就这样到了西藏，乾隆年間，达賴班禅又当作宝物献給清朝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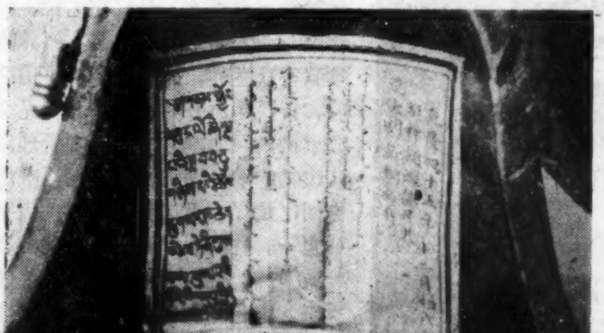
11 鈴 杵 題 签

**銀胎綠珐瑯靶碗、海螺、白伞盖經注**

碗銀胎，綠色珐瑯，通体嵌紅宝石。上有盖，下有盏托，碗靶插于托內。通高29厘米，盛一漆皮箭內，箭盖內裱白綾一方，墨笔楷書“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三日班禅額尔德尼恭进銀胎綠珐瑯碗一件”，汉滿蒙藏四体文。（图8）

海螺，通体珠光，长17厘米。鑲珐瑯口嵌紅宝石，有盖，盛于皮箱內。箱盖內貼白綾，墨笔楷書“班禅額尔德尼恭进利益珐瑯鑲嵌海螺一件”汉滿蒙藏四体文。

这些比較特殊的珍物，都是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到北京来时所进。五世班禅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5年）由原来班禅呼图克图，被册封为班禅額尔德尼，因故未能入覲。六世班禅借着祝寿的机会来到热河和北京，乾隆还特意在避暑山庄外面新盖了一座大庙，与日喀則城的扎什倫布一样。又把班禅所进的白伞盖經注，命人譯成汉滿蒙文雕板刊行。



12 鈴 杵 題 签

这部經文为单叶式，无装訂綫，上下有夹板。全書为汉滿蒙藏四体文，序文說“敬以薄伽梵白伞盖佛母成就悉的甘露瓶仪軌經恭詣神都，瞻仰天颜，覲見圣文殊师利大势轉輪圣王。（达賴班禅都称清朝皇帝为文殊菩薩）奉大皇帝旨，喇嘛即来此，当于此地益为宣广佛教，俾天下一切众生乐平康之福。”只有統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才需要几个民族文字合刊的書籍。

**右旋白螺**

白螺，鑲銅鍍金装飾，通长22.5厘米。吹口宝瓶式，承以蓮瓣。下有一突雕行龙，从龙的造型和猪嘴倒鬃等特点来看，是明代作品。盛于长方皮箱內，盖上白綾墨笔楷書“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一日班禅額尔德尼呼弼尔汉恭递丹書克时敬进右旋白螺，供奉之处增寿吉祥，說見佛說大游戏經。（图7、13）

这是第七輩班禅額尔德尼，罗布藏巴勒垫丹貝宜瑪所进物品。原文中称班禅額尔德尼呼弼尔汉，是因他才五岁，还未行坐床礼。呼弼尔汉譯成汉語是化身的意思。等到行坐床礼之后，正式受封，才免去呼弼尔汉字样。例如有一銅鍍金文殊象黃紙签上，墨笔楷書“后藏班禅額尔德尼因坐床差巴雅堪布曲罗布藏曲批，恭請圣安，进文殊佛一尊”就是剛剛免去呼弼汉尔字样时，差他的“堪布”来京請安的貢品。

**銀 曼 达**

曼达，圆形，周围凿花云水八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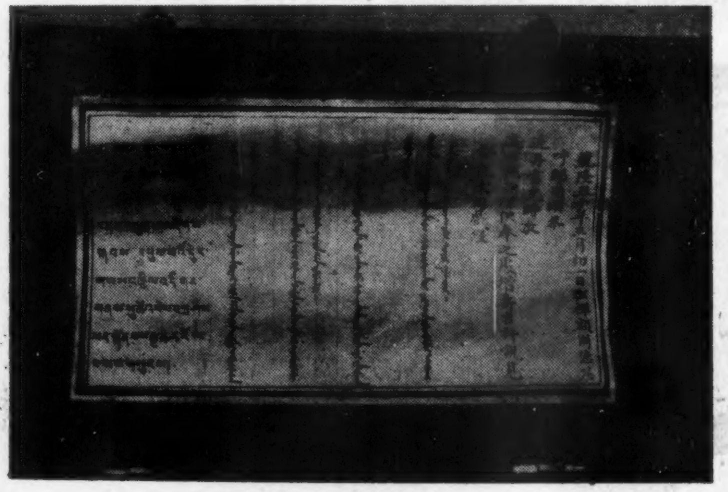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有方塔形堡垒一座居中心，四周菩薩金剛俱面向中心，是佛教的法物之一，象征卫教护法的意思。旧档案中有譯作“滿达”“曼达”或“曼达拉”的，现在或譯作“滿扎”，故宫博物院所藏佛教法器中，曼达很多，有的还附有原来进貢的黄紙签，现在重点地介紹几件銀曼达。

（1）第一件底径36.5厘米，上有黄紙签，墨笔楷書“达賴喇嘛接办藏务叩謝天恩，呈进銀曼达一个。”（图2）按清代制度，每一世达賴到了一定的年龄，奉旨封为达賴喇嘛，賜給金冊金印。二十岁左右再命他管理西藏事务。当他接到北京这样的命令时，和全国各地行政主管人員接到北京命令时一样，要向皇帝“叩謝天恩”，这件曼达就是达賴謝恩时所进，非常重要。

（2）第二件形式制作与上一件大致相同，拴黄紙签，墨笔楷書“达賴喇嘛呈遞丹書克，进銀曼达一份”按規定，达賴喇嘛、班禅額尔德尼間年遣使来京进献方物，大清会典事例載“达賴喇嘛、班禅額尔德尼，及由京派往办事之呼图克图，四噶布倫，各呈进庆祝之礼曰丹舒克”，这件銀曼达就是整份“丹舒克”內的一件物品。

（3）第三件曼达，黄签墨笔楷書“达賴喇嘛恭祝万寿，呈遞丹書克，进銀曼达一个(图14)。”皇帝的生日叫“万寿节”，整寿的时候，在京的王公大臣，在外的官員都进献礼物，达賴也不例外。以上三件曼达，除进貢时拴的黄签之外，还有收庫时的黄签。第一件是“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收，首領郭双富交銀滿达一件，随供养重九十六两”。第二件“光緒十七年五月初四日收，总管刘得志交銀滿达一件，随供养重八十四两”。第三件“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收，首領郭双富交重六十五两”为管理庫房太监所写。一般說来，入庫日期距进貢日期总有相当的时期，根据入庫日期推断进貢或制造年月，是不确切的。但有些物品虽未記年月，却可以推算出来。如銅鍍金无量寿佛，高26厘米，上拴黄签，墨笔楷書“达賴之呼毕勒罕，跪請皇太后安，进扎什利瑪无量寿佛一尊”，可知这是光緒二年（十三世达賴生）至光緒四年(达賴免去呼毕勒罕)間，十三世达賴土登嘉錯进。給太后的，因为正是她垂帘的时期。



13 白螺题签

## 銅佛象

（1）銅鍍金大拉木朗佛象。立象，面部鍍金，全身紫銅本色，通座高133厘米。上拴黄紙签，墨笔楷書“掌办商上事务哷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因达賴喇嘛圓寂，另进大拉木朗佛一尊”。又拴一黄布条，硃笔書藏文。（图3）

（2）銅鍍金文殊师利象。立象，通座高90厘米，上拴黄签，墨笔楷書“掌办商上事务哷征阿齐图，呼图克图，代达賴喇嘛之呼毕勒罕，恭請圣安，呈进文殊佛一尊。”

（3）銅扎什利瑪金剛象。立象，三目，紫銅本色，腿部压銀絲，手持金剛杵，以海螺祥云組成三朵火焰背光。通座高50厘米，背光上拴黄签，墨笔楷書“掌办商上事务哷征阿齐图，呼图克图，恭請圣安，呈进扎什利瑪金剛佛一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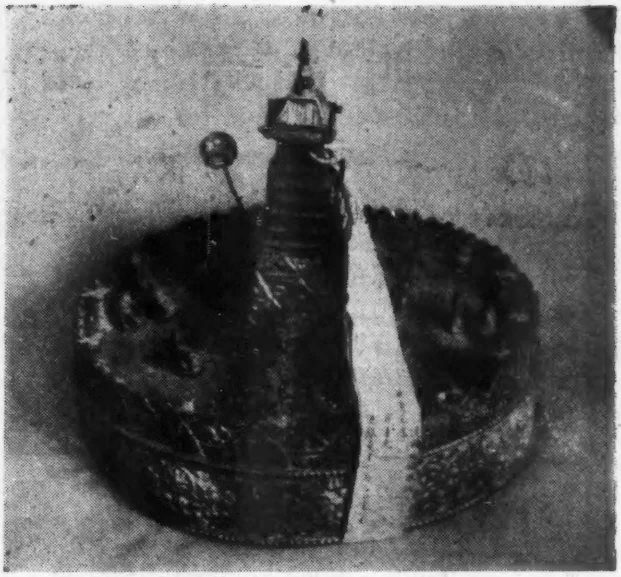
以上三件銅佛是达賴死后，下一世达賴未奉旨接办藏务以前进貢的。每一世达賴喇嘛死后，由理藩院奏請皇帝特派一个“呼图克图”地位的喇嘛代理，一直到下一世达賴及岁，奉旨接办藏务，再撤消其职务。所謂“商上事务”，据乾隆五十七年諭：

“前后藏所出租賦向归达賴喇嘛、班禅額尔德尼收用，又众蒙古平素崇信佛教乐善喜施，是以布达拉、扎什倫布两处商上蓄积饒裕，除养瞻喇嘛番众之外，或有贏余，不仿为唐古特兵丁添补养瞻之用。”（見会典事例）說明掌办商上，即管理庫藏出納的职务。哷征阿齐图，呼图克图，是仅次于达賴、班禅的大喇嘛之一。乾隆三十五年理藩院奏准“勒正呼图克图，照前輩呼图克图之例，賞給阿齐图名号。”（見理藩院則例）他曾代理达賴喇嘛处理藏务。

（4）銅琍瑪长寿佛，手托宝瓶，通座高50厘米。上拴黄签，墨

笔楷書“掌办商上事务，荣增师傅，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拉布結，恭請圣安。呈进利瑪长寿佛一尊”。这个呼图克图，除了管理商上之外，还是十三輩达賴的师傅和代理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因病辞退。（見清史稿藩部列传）十三輩达賴就在这一年阴历十一月，由理藩院奏准，奉旨接管政教事务。

（5）銅扎什利瑪无量寿佛。坐象，通背高25厘米。上拴黃紙签，墨笔楷書“噶布倫，敦珠多尔济等四人递丹書克，进扎什利瑪无量寿佛一尊。(图4)”噶布倫是官职，敦珠多尔济是人名。噶布倫是由当时北京中央政府任命的藏族官員，他們的官厅叫“噶厦”。据大清会典事例載：“噶布倫有总理藏务之責，著賞給三品頂戴”“乾隆五十六年諭……着交駐藏大臣，嗣后噶布倫缺出，会同达賴喇嘛于应升用人員內择其能事者，秉公选定正陪，于各人名下注明如何出力之处，奏請补用候朕簡放。駐藏大臣倘有徇私不公者，一經发觉必加重譴，著为令。”“五十七年理藩院議准，駐藏大臣督办藏务，应与达賴喇嘛、班禅額尔德尼为平等。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分系屬員，无論大小事务，俱禀命駐藏大臣覈办。”从这几項規定里，可以看出噶布倫对駐藏大臣的隶屬关系以及所管的事务。噶布倫在年班来京时，也要向皇帝呈递丹書克。



14 銀曼达

### 杂古杂雅碗

碗木制，內盛藏紅花，口径12.5厘米，底径4.5厘米，外套凿銀八宝盖盒。盖上貼黃紙签書“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喜祿交下藏紅花，連銀碗木碗，重十五两”。碗內一黃紙签，墨笔楷書“班禅額尔德尼，恭祝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寿恭欽献崇熙皇太后，六旬万寿。呈进杂古杂雅碗一个，連銀盒內盛紅花”。

杂古杂雅碗，是类似樺木而比樺木更細膩的一种木碗，故宮博物院藏品尚有更早的，口径約20厘米，隶書嵌銀“乾隆御用”四字款。有的在題詩中还說到“皇祖所賜”“皇考所賜”字样，是康熙、雍正时代的物品，木碗外盛以鉄鍍金鏤空云龙紋碗套，套外有紫檀盒，盒面刻隶書塡金詩句，有“木碗来西藏，草根成树皮”等語。本文所介紹的这一件为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6年)第九輩班禅罗布藏吐巴丹曲吉冝瑪格勒克拉木結所进，足以說明这一时期的关系。

从以上介紹的几件明清文物来看，可見西藏自来就是在北京中央政府統一政权下的一个地方，那些叫嚣“西藏独立”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謊言，是站不住脚的。

### 新疆文化厅指示該区各地开展革命文物工作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最近向該区各地发出通知，要求認真研究执行中央文化部关于“必須大力开展革命文物的征集展覽工作，并且广泛进行革命历史遺址、遺迹和紀念地点的調查、保护和恢复工作，以配合当前在全国范围內开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統教育”的指示。

通知要求全区各专署、市、县文教主管部門应組織专門力量，对一切有关革命的文献与实物进行普遍征集，对經过調查的一切重要革命遺址应坚决地保护下来，特別重要的革命遺址遺迹应加以修繕恢复原状。并逐步作到五有：有标志說明；有調查档案；有保护組織；有保护合同；有保护措施。为了充分发揮革命文物的教育作用，把展覽送上門去，有条件的地方建立革命博物館、紀念館，各人民公社应注意建立地主庄园与貧雇农对比館。今年自治区博物館組織了文物征集組重点深入塔城、伊犁、阿勒泰三区征集革命文物，以保証重要革命文物和文献資料不受損失，重要文物集中起来交自治区文教主管部門妥善保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 西黄寺与須弥福寿庙

朱　家　源

清朝入关以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間的关系，在元、明以来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和喇嘛往来京师和內地非常頻繁，因此先后修建了許多和西藏地方有关的庙宇，其中有不少留存到現在，現在选择有代表性的一两个，来談談它們的历史意义。

## 一

首先要介紹的是北京安定門外的西黃寺(图1)。西黃寺在清初是“北垌名刹”的双黃寺之一，建于順治九年（公元 1652 年），为第五世达賴喇嘛亲朝京师时給他准备的駐錫之所。

清初一百年間，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更加密切，清代許多著名的寺庙，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这些寺庙的建立，多和当时重大政治事件有关联，特别是与西藏地方有关的寺庙很不少，而专为五世达賴所建的西黃寺在这些建筑中是最早的一个。

五世达賴喇嘛未来北京以前，即經常派遣官員朝貢。順治九年（公元 1652 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五世达賴喇嘛到达北京，正值清世祖出猎，当时皇帝即在南苑围場，用隆重的礼节接見了这位大师，并接受了他所进貢的馬匹方物。第二日达賴喇嘛就“奉旨”移居西黃寺。順治十年（公元 1653 年）达賴喇嘛辞归，清世祖派和碩承澤亲王碩塞偕固山貝子古尔瑪紅及吴达海率八旗官兵护送回藏；又遣礼部尙書覚罗朗丘、理藩院侍郎古达礼等頒賜达賴喇嘛汉、滿、藏三种文字的金冊金印，其文如下：

> “茲尔达賴喇嘛襟怀貞朗，德量淵深，定慧双修，色空俱泯……朕甚嘉之……茲冊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释敎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賴喇嘛……”

达賴的封号及执掌西藏政教事务从此有了成文法的規定。自此以后，达賴喇嘛与班禅額尔德尼，每隔一年即派朝貢的官員和喇嘛来到北京，他們照例都在西黃寺居住。信奉黃教的蒙古諸部每次来北京朝貢，都要到西黃寺去“和南”頂礼。

清高宗在“重修西黃寺碑文”中曾提到“达賴喇嘛在国初，导諸藩傾心归命，其功最巨”，可見五世达賴之朝北京，在促进信奉黃教的蒙古諸部逐漸傾向当时的中央政府一点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西藏地方說来，自五世达賴来朝以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更为发展，对于帮助解决西藏地方的困难問題更增加了有利条件；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段很长的时期，西藏地方几次遭受兵灾，都是依靠当时中央政府派兵入藏，才結束了战乱，使得西藏人民重新得到安定生活。

1　西黃寺大門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第六世班禅額尔德尼来朝，庆祝清高宗的七十寿辰，在承德避暑山庄祝寿以后，就“随駕”来北京。为了尊重六世班禅，清高宗特指定把五世达賴曾經駐錫的西黃寺作为他的安禅之所。因为西黃寺是历来款待达賴与班禅所遣来京官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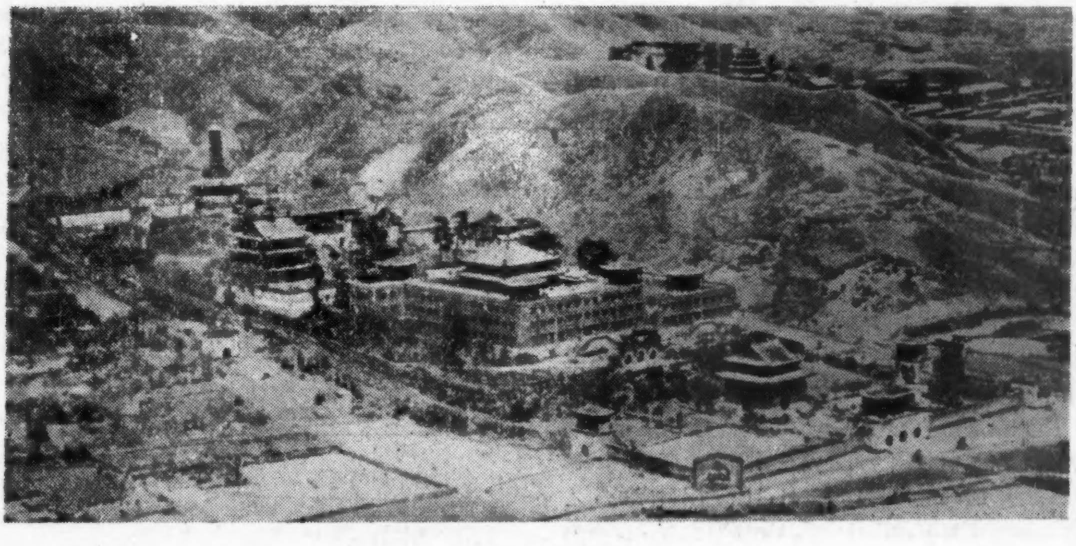
2 清淨化城（班禅塔）

招待所，所以清政府很注意这个建筑的修繕事宜。康熙时就“时加繕治”，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蒙古王公“鑄佛象宝塔送寺供奉，寺宇亦輪奐一新”①。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重修，增加許多“御题”的匾額。六世班禅居住的时候还是一个重修不到十年的新庙。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禅在西黃寺圓寂，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在西黃寺內建清淨化城，安藏六世班禅的經呪衣履。所以民間相传西黃寺为达賴庙，清淨化城为班禅塔。（图2）

从順治到乾隆一百年間，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喇嘛居住西黃寺的不計其数，清廷两次招待来朝的西藏政教領袖都在西黃寺。

## 二

在清代建国一百年間，須弥福寿庙（图3、4）在著名的寺庙中是建立最晚的一个，建立的年代是清朝最盛时期。当时，內地承平将近百年，就是历經憂患的西藏地方，在清朝中央政府三次平服了准噶尔之后，也得到安定。清政府又对西藏地方施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废除藏王，規定四个噶倫的职权，相应地限制了一些大农奴主的势力，使得达賴喇嘛执掌了政治实权，因此西藏地方得以避免战爭和分裂；在一个比較长的时間，維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西藏政教領袖的六世班禅对于当时的中央政府是滿怀着感激心情的，所以跋涉万里为清高宗祝寿，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班禅入朝，才建立



3 須弥福寿寺全景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了須弥福寿庙。清高宗在他的扎什倫布庙志事的詩注中，叙述了建庙的原委：

"庚子岁（公元 1780 年），班禅額尔德尼以余七旬万寿，来京祝釐，念其自后藏跋涉二万余里而来，因仿后藏班禅所居扎什倫布庙式，于山庄特建此寺，以賚安禅②。"

在他"御制須弥福寿之庙碑"上，更說明建庙是遵照清世祖"建西黃寺于京师，以居第五达賴喇嘛之例"。

4 須弥福寿之庙（見"热河志"）

早在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年）避暑山庄建成以后，承德地区相繼建立了許多寺庙，其中不少的建筑都是仿效西藏的，譬如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所建的普宁寺即仿西藏三摩耶式。有的建筑形式虽与內地庙宇式样相同，但塑象都仿自西藏，如乾隆二十五年（公元 1760 年）所建的普佑寺。至于建筑形制及內部設置完全仿照西藏庙宇的，一个是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61 年）建成的普陀宗乘之庙，是仿照拉薩的布达拉都綱法式建造的；一个就是須弥福寿之庙，是仿照后藏日喀則班禅所居扎什倫布庙建造的。藏語扎什倫布有須弥福寿的意义，所以清高宗"御制詩文集"中把須弥福寿庙直接称为扎什倫布庙。庙內匾額和承德各庙相同，都是用汉、滿、蒙、藏四体書③。从庙宇建筑的形式以及內部設置来看，都具备了多民族国家的特征，而建立須弥福寿庙这一史实的本身，更体現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密切关系。

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七月清高宗七十寿辰以前赶到避暑山庄，在淡泊誠敬殿进見了清高宗。在山庄之日，除"应召侍宴"之外，即在須弥福寿庙內为清高宗唪經上寿。并向高宗报告了第八世达賴喇嘛学习經典的情况，因八世达賴尚未成年，高宗曾有敕諭，命六世班禅負輔导責任。六世班禅在北京西黃寺圓寂以后，清高宗命他的弟子罗布藏敦珠布带領二十人住持須弥福寿庙，传授藏經律，挑选了一百八十名內地喇嘛学习藏經。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870 年）正月，在送六世班禅舍利回藏之前，清高宗特敕諭第八世达賴喇嘛照管后藏政教事务："扎什倫布所屬人众皆賴尔喇嘛照管，务須仰体朕怀，加意約束，善为教养，此即为吉祥善事矣。"④

西黃寺和須弥福寿庙經历了三百年，現在依然尙存。民国年間，这类庙宇一度遭受了北洋軍閥的破坏，解放以后都迅速得到修复和保护，西黃寺更是"輪奐一新"。在清代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史上，这两个寺也是政教关系发展的标志，是值得紀念的地方。

---

① 日下旧聞考卷 107 引重修黃寺碑文。
② 清高宗御制詩文十全集卷 48。
③ 承德府志卷 19 寺观。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122。

# 关于駐藏大臣的几件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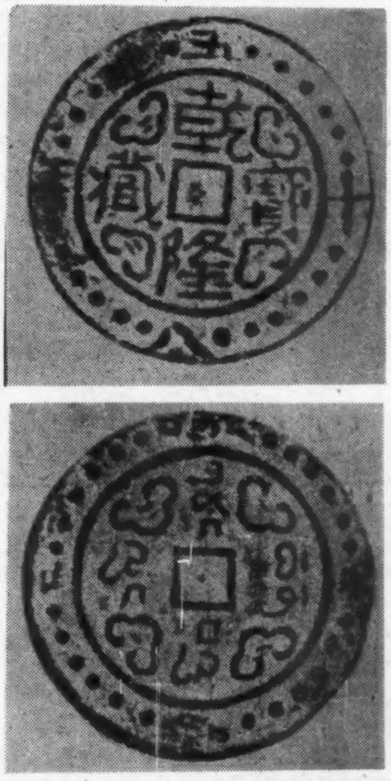
张 林

西藏地方古称吐蕃、西蕃和烏思藏，和內地自古就有密切的經济文化关系。从十三世紀起，西藏地方已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到了十七世紀，清朝政府在西藏地方"画疆置吏，有如內地"，"統之以重臣，监之以分司"①，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亲密关系。我們現在只談談几件有关清代駐藏大臣的文物。

清朝未入关前，太宗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第五世达賴喇嘛罗桑嘉措已向清朝政府朝貢。順治二年（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后不久，西藏地方僧俗官員仍然沿袭明朝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雍正初年，由于藏臣不和，有发生战爭的可能，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进藏，直接監督西藏地方政府，乃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正月，派遣副都統瑪腊和大学士僧格赴藏，这是清政府派大臣駐藏的开端。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代表极端反动的大农奴主势力的藏王朱尔墨特那木札尔，为了奴役藏族人民，竟向准噶尔借兵，阴謀发动叛乱，为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和左都御史拉布敦发覚，叛乱未扩大，但后来傅清和拉布敦在这次事件中仍被叛乱份子所杀害。从朱尔墨特事件中，清朝政府認識到必須对西藏大农奴主的权力加以限制，才能保証西藏的和平和祖国的統一，因而下令废除藏王，"設噶卜倫四，岱貧（代本）五，第巴三，堪布一，分理藏务，均受駐藏大臣及达賴喇嘛統轄"②。清政府授予达賴喇嘛总理藏务的权力后，达賴喇嘛乃成为西藏的政治領袖。为了紀念傅清、拉布敦的殉难，在拉薩大昭寺东北，他們的殉难地点——原来駐藏大臣的行署（在朱尔墨特事件中已被火烧毁）旧址上，建立"双忠祠"，"肖象以祀"。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大将軍福康安奉清廷命入藏平定外患后，曾为立碑并撰写"重修双忠祠碑記"。根据他当时的記載，那时虽距傅清、拉布敦殉难已四十余年，但他們仍为西藏人民所紀念，"岁时奔走，香火不絕，至今犹有能道当时遺事者"③。

由于西藏地方政权的腐敗，清政府决心加以整頓。乾隆皇帝屡諭駐藏大臣："藏地一切事宜，均应大加整頓"。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五月十九日駐藏大臣鄂輝、和琳"为会商拣放噶布倫各缺"的奏折（图4）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陋习弊端所进行的改革。如折中提到将办事不認真出力的噶布倫索諾木札什斥革，并指出西藏地方"向来噶布倫缺出，达賴喇嘛皆于东科尔家道殷实內挑补，并不論其能否办事"（按：此行字旁有乾隆帝批語："可笑，今豈当更如此。"），認为"若拘泥旧习，仍以东科尔出身者拣放，既不能鼓励人材，且恐貽誤公事"，因此要"择其奋勉出力者，知会拨补，以示鼓励"。这項建議得到了清朝政府的贊同，乾隆亲批"甚当"。后福康安、八世达賴、七世班禅奉命共同筹議卫藏章程。这里，我們再介紹一个文件，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十二月廿七日軍机大臣阿桂等，根据福康安等酌定条款而議定的有关駐藏大臣职权及西藏地方事宜的奏折(图3)。其內容要点如下："藏內諸事应归駐藏大臣管理，以除积弊"，"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应稟命駐藏大臣办理"；"藏內大小'番目'缺出，应定等級，統归駐藏大臣会同达賴喇嘛秉公拣放"，"駐藏大臣每年应亲身巡查边境，



1. 乾隆宝藏錢(放大)原大为直径2.6厘米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2. 駐藏大臣衙門（見"藏語"一書）

3.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軍机处筹議駐藏大臣职权等事宜奏折

4. 乾隆五十七年五月駐藏大臣鄂輝"为会商揀放噶布倫各缺"奏折

以重地方"；"駐藏文員应請添設"，前藏再添粮务一員，"专管监造銀錢事务"；后藏添設县丞等官員，"支放'番兵'口粮"，俱"令四川总督务选明白勤慎之員前往办理"等等。乾隆皇帝即于次日朱批："諸凡妥协，永以为例行，欽此"。經过反复酝酿后，提出一百另二款条例，由清政府修正后批准，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公布，这就是著名的"欽定章程"。

"欽定章程"詳細地規定了駐藏大臣的职权，主要是管理西藏內部事务。对于达赖喇嘛、班禅額尔德尼和其他大呼图克图（活佛）呼毕勒罕（化身）的轉世，清朝廷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抽签时要由駐藏大臣亲临监視，灵童認定后，要由駐藏大臣主持坐床典礼。同时，駐藏大臣有任免噶布倫、审查財政收支和春秋巡閱国境等职权，"章程"并規定了有关西藏地方財政、稅收、币制、軍制、司法、差役，以及僧俗官員的任免和待遇等一整套規章制度，成为清朝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規定的最高法律。

当时西藏政府的腐敗情况，經过清朝政府的整頓，以及駐藏大臣对"章程"規定的积极执行，有了一定的改善。在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三年的駐藏大臣松筠"西招紀行图詩"④和嘉庆初年駐藏大臣和甯的"西藏賦注"⑤中，都有所記述。松筠以西藏薩喀为例，他說当地的情况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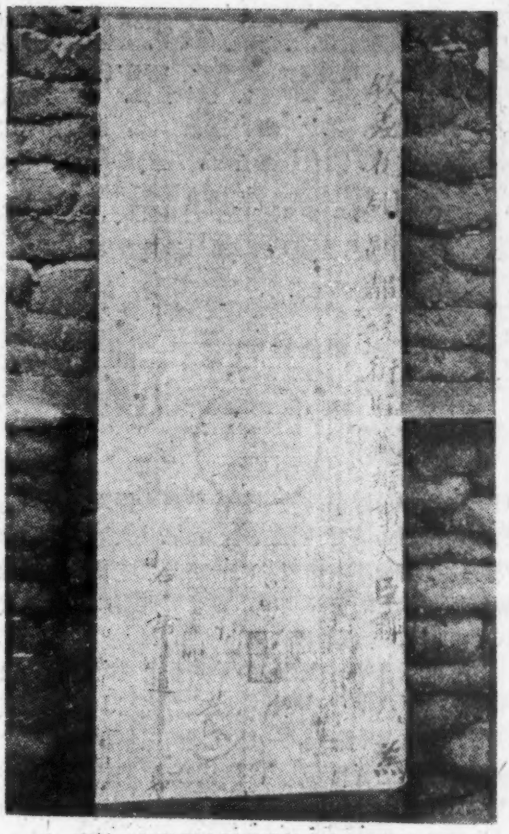
游牧缺禾稼，生計惟牛羊。民力苦竭蹶，背盐以易粮。

昔有千余戶，今惟二百强。豈是苦征輪，蕩析任逃亡。

幸遇皇恩溥，子惠救蛮荒。繼以减賦納，边氓乃阜康。

指出西藏人民在农奴主压榨下的非人生活以及駐藏

6. 駐藏大臣有泰（左第三人）和他的高級随員



5. 宣統二年駐藏大臣联豫的布告（貼在帕克里）

大臣对此曾进行了一些改革：

伊昔半流亡，往往弃田閭。甘心为乞丐，庶得稍安舒。

乃因差徭繁，頻年增役夫。出夫复不役，更欲折膏腴。

凡居通衢戶，烏拉鞭催呼。耕牛尽为役，番庶果何辜。

敬以广皇仁，严格积弊除。

（按：松筠"西招条議"中載："乾隆乙卯，旣經达賴、班禅蠲免錢粮，复蒙恩賞銀两撫恤，边氓乃得复甦。然其司事头目貪饕性成，如不善为治理，虽岁岁恤賞，亦不能拯救其民，于是乎为之除苛，为之减費，有案可稽 数年来，民生庶几矣。"）

和宁所著"西藏賦注"中，这样描繪西藏地方在"欽定章程"制定和执行前后的情况：

出家則荼毗成灰，在家則碎封成脍 藏俗天葬地葬水葬火葬相沿已久，乾隆五十九年，出示严禁之，并刻石于大招前，教之埋葬，其风稍息，然未能尽革也。

畏天花而弃子如遺 藏地小兒，向不出痘，近岁传染甚盛，遇有出痘者，遂弃之荒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山僻野，冻餒而死，其俗甚惨，自乾隆五十九年，劝諭达賴喇嘛捐養，于离藏幽僻处所，建盖房間，供給糌粑酥茶，以資撫养，又派妥干‘番目’經理，如此数年来，全活甚众，藏风稍变。

头念箕斂，累及牛驢，屋栗口錢，祸及妇子。

布帛粟米、力役扑地齐征，坉土雁戶、凶年弥天追比。藏地賦納旣繁，差徭又重，民多逃散，（按：戶口逃亡后，并将租賦分攤其余农民負担）皆营官第巴剝削重征所致，乾隆六十年，严明立禁革除。

税及鵝卵楊花，波逮月华雨水。藏地旧俗，扫地割草烏拉，折錢征比，岁輒数万，嘉庆元年，概予删减。

茶块充閭，銀錢遍里。藏地行使銀錢，向出廓尔喀鑄造，販运至藏，易銀而往，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章程，令达賴喇嘛自行鑄造“乾隆宝藏”錢文（图1）由川省派文員监鑄（按：鑄錢局局員由駐藏大臣监督）

可見由于“章程”条例的施行，駐藏大臣对西藏地方种种非法行为的“严明立禁”，和駐藏大臣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对藏族人民采取的一定的讓步政策，对西藏反动农奴主的残酷剝削，曾有所抑制，对藏族人民显然带来了一定好处。

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到清末（公元1911年）凡一百八十余年中，清朝政府先后委派的駐藏办事大臣达七十余人，一般任期两三年或三四年，連任五年以上者凡五人（見附表）。他們代表清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职权，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和活动照片很多。我們列举其中数件如下：如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駐藏大臣衙門致軍机处的咨文，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貼在西藏帕克里地区的駐藏大臣联豫的布告（图5），都盖有駐藏大臣官印，文为“欽差大臣之印”。此外，还有光緒年間駐藏大臣的衙門，衙前旗杆上挂有“駐藏办事大臣”的旗帜（图2）；光緒廿八年（公元1902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駐藏大臣有泰及其高級随員的合影（图6），以及至今尚存的原駐藏大臣衙門前的石獅子等。（图7）

7. 駐藏大臣衙門前的石獅子

上面介紹的几件文物，可以反映駐藏大臣的职权和行使职权的一部份情况，而且保留下了駐藏大臣活动的片断，供讀者閱讀历史时参考。綜合以上所說，証明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不可分割的关系，是長期的历史发展的結果，这是誰也不能把它歪曲和抹杀的。

附表：清朝历代駐藏大臣表

| | |
|---|---|
| 雍正5年(1727)正月—8年(1730) | 僧格、瑪臘 |
| 雍正8年(1730)—9年(1731)6月 | 青保、瑪臘 |
| 雍正9年(1731)6月—12年(1734)8月 | 青保、苗寿 |
| 雍正12年(1734)8月 | 青保、阿尔珣 |
| 雍正12年(1734)8月—13年(1735) | 那苏泰 |
| 乾隆元年(1736)—3年(1738)9月 | 杭奕祿 |
| 3年(1738)9月—6年(1741)9月 | 紀山 |
| 6年(1741)9月—9年(1744)6月 | 索拜 |
| 9年(1744)6月—13年(1748)4月 | 傅清 |
| 13年(1748)4月—14年(1749)2月 | 拉布敦 |
| 14年(1749)2月—14年11月 | 紀山 |
| 14年12月—15年(1750)4月 | 拉布敦 |
| 15年4月—16年(1751)12月 | 班第 |
| 16年(1751)12月—19年(1754)4月 | 多尔济 |
| 19年(1754)4月—22年(1757)5月 | 薩拉善 |
| 22年(1757)5月—25年(1760)12月 | 官保 |
| 26年(1761)正月—28年(1763)12月 | 輔鼐 |
| 29年(1764)正月—31年(1766)4月 | 阿敏尔图— |
| 31年(1766)4月 | 官保 |
| 32年(1767)—38年(1773)11月 | 莽古賚 |
| 38年11月—40年(1775)10月 | 伍弥泰 |
| 40年10月—43年(1778) | 留保住 |
| 44年(1779)—45年(1780)2月 | 索琳 |
| 45年2月—12月 | 保泰(博清額代) |
| 46年(1781)—49年(1784)11月 | 博清額 |
| 49年(1784)11月—51年(1786)8月 | 留保住 |
| 51年8月—52年(1787)12月 | 庆麟 |
| 52年(1787)12月—55年(1790)5月 | 舒廉 |
| 55年(1790)5月—8月 | 普福 |
| 55年8—56年(1791)9月 | 保泰 |
| 56年(1791)9月—11月 | 奎林 |
| 56年11月—12月 | 奎林（鄂輝代） |
| 57年(1792)—58年(1793)5月 | 鄂輝 |
| 58年(1793)5月—59年(1794)7月 | 和琳 |
| 59年7月—嘉庆3年(1798) | 松筠 |
| 嘉庆4年(1799) | 英善 |

| | |
|---|---|
| 5年(1800) | 和甯 |
| 6年(1801)—8年(1803)11月 | 英善 |
| 8年11月—9年(1804)10月 | 福宁 |
| 嘉庆9年(1804)10月—10年(1805)10月 | 策巴克 |
| 10年10月—13年(1808)10月 | 玉宁 |
| 13年(1808)10月—15年(1810)10月 | 文弼 |
| 15年(1810)10月—16年(1811)10月 | 阳春保 |
| 16年10月—19年(1812)2月 | 瑚图礼 |
| 19年2月—22年(1817)5月 | 喜明 |
| 22年5月—25年(1820)10月 | 玉麟 |
| 25年10月道光3年(1823)7月 | 文干 |
| 道光3年7月—7年(1827)2月 | 松廷 |
| 7年2月—10年(1830)10月 | 惠显 |
| 10年10月—12年(1832) | 兴科 |
| 13年(1833)正月—14年(1834)5月 | 隆文 |
| 14年(1834)5月—15年(1835)12月 | 文蔚 |
| 15年(1835)12月—16年(1836)8月 | 庆禄 |
| 16年(1836)8月—19年(1839)10月 | 关圣保 |
| 19年10月—21年(1841) | 孟保 |
| 22年(1842)—23年(1843)3月 | 海朴 |
| 23年3月—10月 | 孟保 |
| 23年10月—26年(1846)12月 | 琦善 |
| 26年12月—27年(1847) | 斌良 |
| 28年(1848)—咸丰2年(1852)6月 | 穆腾額 |
| 咸丰2年(1852)6月—3年3月(1853) | 海枚 |
| 3年3月—5月 | 文尉 |
| 3年5月—6年(1856) | 赫特賀 |
| 7年(1857)—9年(1859)10月 | 满庆 |
| 9年10月—11年(1861)10月 | 崇实 |
| 11年10月—同治7年(1868) | 景紋 |
| 同治8年(1869)—12年(1873)7月 | 恩麟 |
| 12年7月—13年(1874)9月 | 承繼 |
| 13年9月—光緒5年(1879)11月 | 松溎 |
| 光緒5年11月—11年(1885)11月 | 色楞額 |
| 11年11月—13年(1887) | 文碩 |
| 14年(1888)—16年(1890)5月 | 长庚 |
| 16年5月—18年(1892)9月 | 升泰 |
| 18年9月—22年(1896)2月 | 奎焕 |
| 22年2月—25年(1899) | 文海 |
| 26年(1900)正月—9月 | 庆善 |
| 26年9月—28年(1902)11月 | 裕鋼 |
| 28年11月—32年(1906)10月 | 有泰 |
| 32年10月—宣統3年(1911) | 联豫 |

（根据清史稿，疆臣年表九，十，十一，十二）

① 清朝通志卷七十，职官略七。

② 清朝通志卷三十一，地理略。

③ 西藏图考卷七，艺文考上，福康安重修双忠祠碑記。

④ 西藏图考卷三，西藏程站考。

⑤ 西藏图考卷八，艺文考下。

# 1904年西藏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軍的几张图片

谢　平

### 春丕谷的石墙

这是春丕谷里横跨两山之間，靠近藏、錫边界的一道石墙。它离亚东很近，是自印度到江孜、拉薩所必經之地。公元1886—1888年，英国帝国主义者第一次武装侵略我西藏，逼迫清朝政府先后签訂了中英藏印条約（1890年）和中英藏印續約（1893年），这两个条約規定：清朝政府承認哲孟雄（即錫金）为英国保护；中国开放亚东为商埠；五年內进口貨物概不納稅。当时为了随时监視英国帝国主义者派遣的那些“商人”或“旅行者”闖入我国边境进行阴謀活动，同时也为了防禦英軍越境侵扰，所以修筑了这道石墙。

春丕谷大道上的石墙

在西藏边境这样的石墙不少，1904年英国侵略軍侵入西藏时，西藏人民曾巧妙地利用大道上的石墙抵禦和消灭了敌軍。

1904年守卫在藏、錫边界上的我武装藏胞，他們和藏軍一起捍卫着祖国的边疆，痛击英国侵略軍。英侵略軍調用来运输軍用物品的犛牛来到边地时，也被他們赶跑了，使敌人遭遇到运輸上的困难。

### 李汀代本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代表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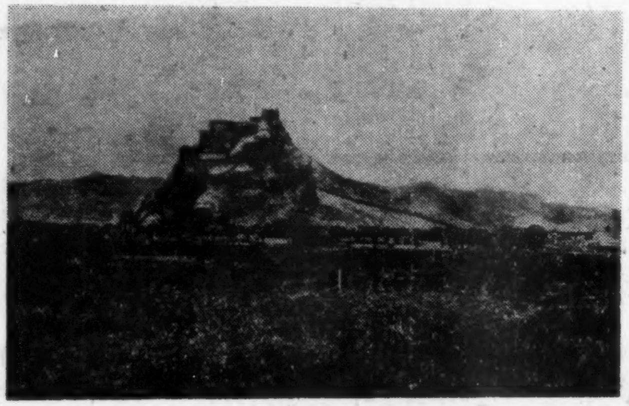
1904年，英国侵略軍，侵入我国西藏境內。为

了警告敌人，抗議英軍的这种侵略行为，当时在西藏南部領导抗击英国侵略軍的李汀代本(代本意即团长)，前往敌方陣地与敌方代表荣赫鵬(Francis Younghurband)进行談判。

談判情况(中坐面朝外者为李汀代本)

在談判时，李汀代本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他認为一切問題都可以商議，但侵略軍必須終止进攻，立即撤出境外。但是，英国侵略軍蛮不講理，反而要求遣散西藏抗英軍的武装力量。为了維护西藏的安全，在李汀代本領导下抗英軍回击了敌人。由于敌軍使用了现代武器，这次的抗英斗爭失敗了，李汀代本不幸在这次战役中光荣牺牲了，他和英勇牺牲的将士們都是永垂不朽的!

### 江孜炮台



江 孜 炮 台

江孜炮台在江孜城的东面，藏胞称它为“庄”，就是堡垒的意思。在1904年抗英斗爭中，勇敢善战的抗英軍民坚守堡垒，回击敌人，使江孜城博得了“英雄城”的称号。

棕山是江孜城的重要据点，敌人曾在这里用了二百多名的兵力向上冲击，企图夺取它，但勇敢的人民只用石块、木头等作为武器来代替火藥、枪炮，就是这样地把侵略軍的这次进攻击退了下来。

英国侵略軍逼近江孜，但入不了城，江孜人民用土枪、弓箭和大刀就把他們挡在城外。敌人既飢餓又无柴烧飯，江孜人民选派了自己的好射手，暗藏了刀、箭，扮成卖柴的样子来到了城外敌軍兵营兜售柴火，趁其不备，就射杀可恶的敌人，使敌人极为惶恐和不安。

英雄的人民勇敢而机智地与敌人作斗爭，并在这里坚守了八十多天!

### 侵略者的下場

1904年英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我西藏时，曾胁迫印度、尼泊尔和錫金等国的居民为他們充当侵略工具和炮灰。但这是被迫的行动，当他們一旦覺悟或当他們的生命处于危險情况下的时候，他們往往用罢工或逃亡的行动来表示对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抗議。

象任何侵略者的下場一样，虽然英国侵略軍曾經逞凶一时，欺压人民，屠杀人民，但他們最后終归走失敗的道路上。

这就是当年被我軍民击毙的英国侵略者的坟墓。其中还有些軍官，如：貝当、克来斯特尔和白尼等。这样的坟墓是不少的，这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英侵略軍坟墓

# 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几件革命文物

## 赤卫队的鉄叉、梭标和紅軍的土炮

鉄叉(图1左)是紅安县紫云区三圣乡郑買文同志保存和捐献的一件革命文物，是郑買文同志的父亲在1927年参加革命时所用的武器。1931年他的父亲曾用这把叉参加了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以后还經常用它在馬鞍山一带与敌人斗爭，后来不幸牺牲，郑買文同志为了紀念父亲和抱着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信念，将这把鉄叉埋在屋后山沟內保存至今。这种鉄叉原是黄（安）麻（城）地区农民在稻場上用来叉草和在湖塘中叉脚魚的工具，当地农民叫它脚魚叉，几乎是戶戶都有。因此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成了黄（安）麻（城）一带农民赤卫队的重要武器，1927年的大別山起义，农民們所使用的武器中，最多的也是这种脚魚叉。

梭标(图1中)是紅安县老革命根据地紫云区黄崇貴同志保存的革命文物。黄崇貴同志今已六十八岁了，1927年土地革命时，他参加农民赤卫軍，在永佳河与反动的紅枪会战斗时，繳获了这根梭标。从此，它就成了黄崇貴同志的重要武器，他带着它与反革命武装打过百多次大小仗，幷用它杀死过二十多个敌人。在紅軍长征后，黄崇貴同志把它埋在屋內的阴沟里，保存下来。

土炮(图1右)是1929年駐鄂东阳新地区的紅軍某部自己制造的武器。1930年紅軍某部与江西瑞昌反动軍队作战时，七名紅軍战士用此炮打退了敌軍好几百人。在当年紅軍装备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种炮曾經起过很大作用。紅軍轉移后，阳新龙港的群众把它埋在地下，得以保存。

（张玉鳳、譚維四）

## 庆祝鄂东北道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标語

这条标語（图5）是从湖北省麻城县乘馬区李家坳李庆海家的墙上揭下来的。1929年，麻城县乘馬区苏維埃政府就設在李庆海的房子內，这些标語是当年区苏維埃政府制的。紅軍轉移后，曾經遭到敌人的多次刷毁，但由于群众細心的保护，残留下来的标語經过粘补后，仍能看得出原貌。这一张就是用残存的几张相同的标語粘合而成的。

（譚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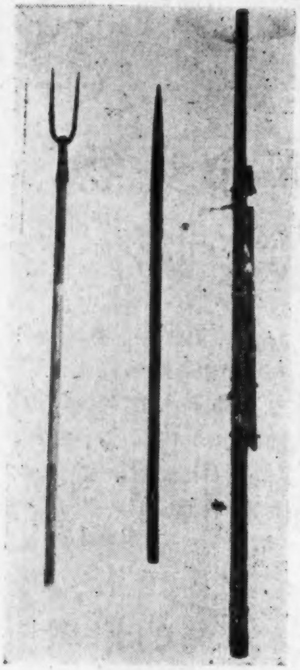
## 紅軍搶渡清洪沟的炮繩

这件革命文物(图2)。原是紅軍某部抬炮的草繩，1931年7月，該部紅軍在湖北均县境內受到国民党反动軍队和当地地主武装的围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紅軍机智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急速轉移陣地。恰巧这时均县境內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盐池河区內的許多地方，急流泛滥。紅軍在敌人的尾追下，到达蛤蟆口乡清洪沟时，一条平常的小河已成了水面寬达四、五丈的急流了，紅軍战士里只有部份同志会游泳，即使会游泳的同志，在这样的水势中也是难以泅过去的，而敌人追的很紧，在这紧急关头，英勇的紅軍战士們，机智地拿出这条五、六丈长的炮繩，由一个最会游泳的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險，带着炮繩的一端，經过与洪水的激烈搏斗，泅到对岸，把繩头拴在河岸上，然后其他的同志攀繩而过。正当紅軍全部渡过，扔掉繩索时，匪軍追来了。他們滿以为洪水一定会阻挡住紅軍的去路，但被洪水挡住了的不是紅軍，正是他們自己，他們只能瞪眼望着紅軍胜利轉移。該乡群众为了紀念紅軍的英勇斗爭，从河边将这条炮繩拿回，秘密保存了下来。

（譚維四、张玉鳳）

## 新四軍第五师医院用过的鍋和缸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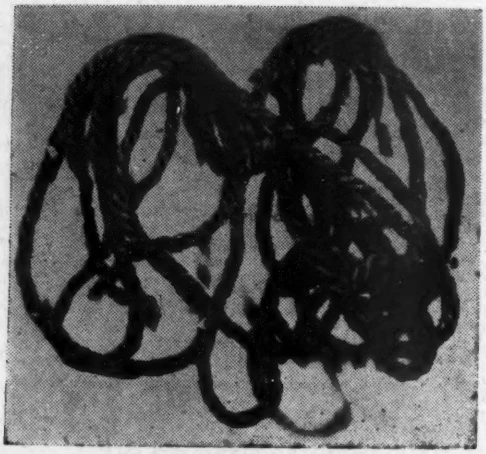
抗日战爭时期，新四軍第五师在湖北省紅安七里坪一带建立了伤病医院。当时日寇对我根据地不



1 左：鉄叉、中：梭标、
右：土炮

4 左：鍋　右：缸底

5 庆祝鄂东北第一次工农
兵代表大会标語



2 紅軍搶渡清河沟的炮繩

3 徐全直烈士的上衣

6 馬灯

时进行扫蕩，因此医院也經常轉移。

这个缸底（图4右）是在紅安县七里坪区黄茅尖眼睛洞內发現的，据当地徐士臣同志介紹：1944年，新四軍第五师的伤病医院的伤員曾在这个洞里住过，这个缸底是他們留下来的；当时領导該院的黄卓同志（現任七里坪医院院长），也認为此缸确是当时該院伤病員用来打飯、打菜、洗脸、洗脚和搞茶水用的。这口鍋（图4左）是新四軍掩蔽在七里坪黑石沟尾上树林子里时，遺留下来的。

（屠忠琳）

## 一盞馬灯

李世屛同志是湖北省黄岡县竹陂乡牌楼墻人，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他参加了本地的农运工作，經常在夜間提此馬灯（图6）召集农民开会。李世屛同志在斗爭中牺牲后，他的妻子为了紀念他，将此灯挂在屋梁上，保存了近三十年。

（屠忠琳）

## 徐全直烈士作地下工作时化装用的上衣

徐全直烈士，湖北省沔阳县人，中共党員，湖北学生运动的先驅。北伐胜利后，她参加組織并領导了湖北妇女协会的工作。大革命失敗后，与陈潭秋烈士（湖北省中共党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徐全直烈士的爱人）一道到江西、上海、东北等地工作，1932年正当她准备离开上海轉入苏区的前夕，不幸被捕，国民党将她送往南京审問，她始終坚貞不屈，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这件衣服（图3）就是她在上海等地作地下工作时化装用的。

（屠忠琳）

# 十年来上海文物、博物館事业成就展覽

为了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会于六月間联合举办了“十年来上海文物、博物館事业成就展覽”，展覽內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文字、图表、照片、实物等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不法奸商掠夺、破坏我国珍貴文物的滔天罪行；介紹人民群众在解放前为保护祖国珍貴文物，坚决进行斗爭的一些事例；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勾結蔣介石集团企图劫夺我国在台湾文物的阴謀活动以及說明解放前上海的博物館是帝国主义窃取我国資源情报，掠夺文物、标本，进行文化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装飾門面的工具。第二部分，是有系統地介紹在党和政府的領导下，貫彻执行了正确的文物政策法令，从而所取得的文物事业上的一系列的重大成就。陈列內容有：貫彻禁止珍貴文物、图書出口的法令；制止不法奸商盗运文物出口的斗爭；上海人民踊跃捐献家藏文物的情况；配合生产，发动群众，大力搶救废銅、废鉄、废紙中文物的工作；坚持群众路綫大力开展革命遺址的調查和文物普查工作，重点修复革命遺址和古代建筑，清理、发掘古墓葬。在这里陈列了从征集、捐献、搶救、发掘中获得的許多珍貴文物。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紹十年来上海博物館事业的发展，博物館为貫彻开門办館，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所进行的各項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为科学研究服务，文物保管、修复、印刷出版等工作的成就与經驗等。

这个展覽会，反映了上海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各項經驗，有力地說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文物、博物館事业才能取得光輝的成就。展覽会除組織群众参观，广泛宣传党的文物保护政策，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外，并将邀請捐献人士、收藏家、文物市場与有关协作单位同志参观座談，并拟組織郊区各县博物館干部进行业务学习与經驗交流。

（上海市文化局办公室）

# 东阳木雕与建筑上的木雕艺术

賀鳴声

浙江东阳县从事木雕的艺人，曾有千人以上，他們散布在上海、广东、青島各地在雕刻艺术上具有地方风格，故称为"东阳木雕"。

究竟"东阳木雕"起于何时，已无文字材料可以稽考，但它的起源是与刻書工艺分不开的。远在宋代，东阳胡滄就刻过"三苏文粹"(南宋版本)，書的末頁有东阳胡滄桂林堂王氏刻印。到了明朝用活字木子排印的譜牒，普遍发展起来，同时翻刻宋人書写的对联也很流行，那时东阳木刻工艺就有了很高的成就。此后木雕佛象、刘海釣蟾图、和合图、赵公明图、姜太公图、鍾馗捉鬼图，以及神馬、年画等逐渐增多，从这些残存的刻本上，可以看出东阳木雕的綫条是純熟有力的。

近百年左右木雕大多数用于建筑方面，如祠堂庙宇、楼台亭榭及大宅院等的各种装飾，浙江各地較有名的建筑物雕刻多是出于东阳艺人之手。

东阳木雕从地区上分为南乡、北乡两处，清乾隆、嘉庆前后，当地土豪劣紳为了"夸豪竞富"都以建筑漂亮的厅堂为荣，对建筑上的雕刻特别講究，有些雇用数百艺人，作长期的雕刻。并利用大荒年，百工手艺失业的时候，把工价压得很低（每个工只有二十九文錢），雕飾一所大宅院往往需要数千工之多。現在在东阳地区如岭山、馬上桥、安恬馬、湖头陆、里湖、郭宅仍保存不少早期建筑的木雕。

东阳木雕大致可分为圓雕、深雕、浅雕、鏤空等数种：

（一）圓雕：（又名立体雕刻）以雕刻佛象为主，东阳楼西宅木雕朱相公的坐象，神态逼眞，也是难得的杰作。在建筑上的圓雕多用在牛腿(替木)上，雕刻的范围很广，有人物、动物、獅子(图5)、戏出等，后期的雕刻并把人物和风景結合在一起。东阳地区的替木有高达一人左右的，雕刻在这个地方，对人物的处理，要求适合于仰望时的透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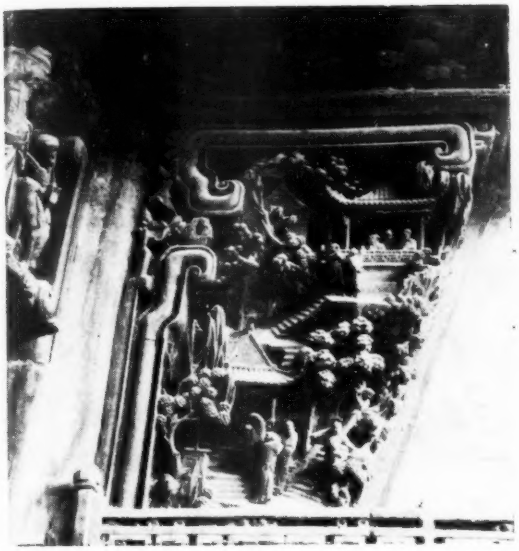
（二）深雕：是东阳最擅长的一种雕刻，有些深雕已和圓雕接近，它在建筑上应用的范围較广，大都用于房屋上楣、斗栱、插尾、梁鎖（图8）等处。因地区不同雕刻的题材也不相同。

（三）浅雕：它适宜于近看，大多数用在接近人的視綫位置上，如門窗的堂板、鎖腰、大肚板、天头等处。象东阳湖头陆地方的陆姓宅內，百年前的房門上的浅雕（图9）及門窗堂板花卉浅雕（图3），景物簡練，刀法遒劲有力，木面既浅又平，那时还沒有三角刀，全用斜刀刻出，确是有很高水平的精工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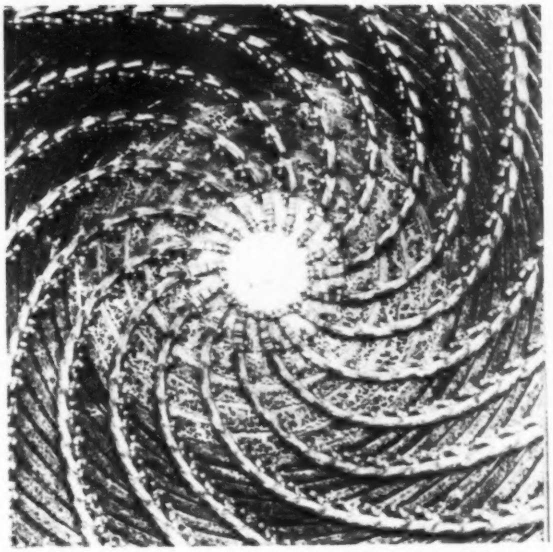
（四）鏤空：这种雕刻多是用长短或弧度不同的木条作上接榫，用在門上的挂落（灰板）、窗格（图4）、栏杆及廊檐、藻井（图6）等处，編排出一根藤、鎖曲、洋花、风旋等图案。图案包括了单独様样、連續様样的各种变化，如一根藤、鎖曲就有将近数百种之多。至于鷄籠頂的建筑木雕，则是一种堆迭的接榫艺术。(图2)鏤空木雕到了乾隆时有了新的发展，由于使用了銅絲鋸，从那时以后的鏤空木雕大多数都改为木板鋸空了。(图7)其后更創造了一种夹板深雕（这种雕法只有数十年的历史，目前所雕的壁挂多用此法），它的特点兼具深雕和鏤空的特长，又使两者相互輔助，层次更为复杂，但衬托却十分明朗，如山間有树，树丛中有澗，前后层之間有很强的立体感。

如上所述，在东阳及浙江各地留下了不少优秀的木雕作品，但这些艺人的名字已无可考。从老艺人中了解，道光年間有个郭鳳熙很有名，他的作品有硤石鎮圣塘庙及肖山南明堂雕刻，可惜均已无存。他的后輩郭金局富于創造性，开始将木雕发展成繪画的形式，(图1）在风景方面大都承袭了国画中的散点透視，当地艺人把这种雕法叫繪画体，成为清末及以后的一种新作风。

解放以后，由于党的提倡和鼓励，东阳木雕艺人已組織起来，成立了两个大社(現改为工厂)，艺人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不断創造出新的思想性較高的作品，并曾参加六十多次出国展出，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評价。木雕艺人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正准备雕刻紅軍长征壁挂。东阳木雕的花朵正在欣欣向荣的向前发展着。



1 繪画体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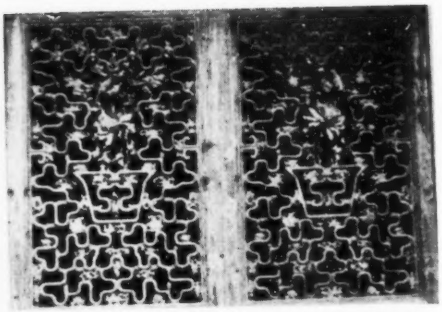
2 鷄籠頂式的建筑木雕

3 門窗堂板花卉浅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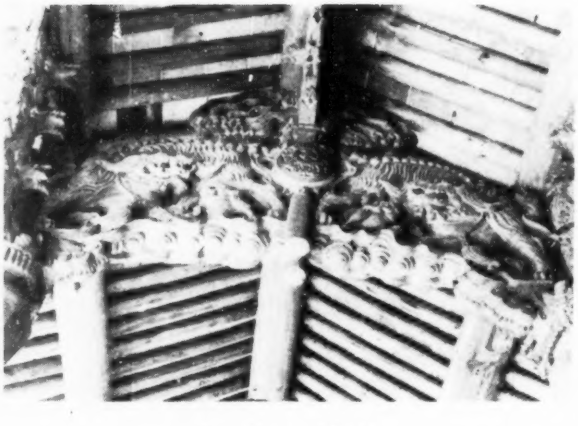
4 鏤空窗格

5 獅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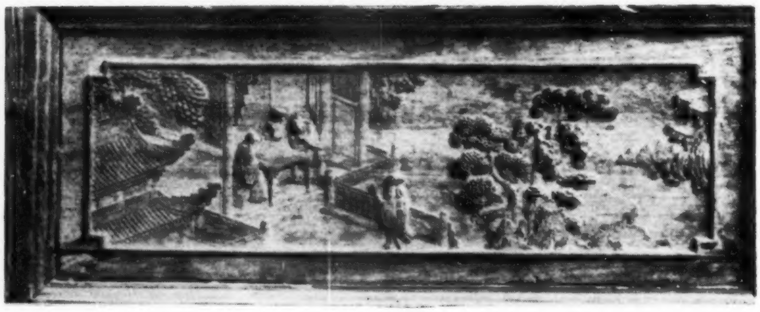
6 藻　井



7 木板鋸空图案



8 梁上雕刻



9 房門上的浅雕

# 湖北均县武当山古建筑調查

湖北省文物管理处

武当山是我国名山之一，周围800余里，拔海1600余米，中有七十二峰、二十四澗、十一洞、三潭、九泉、十池、九井、十石、九台等风景名胜。又有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等建筑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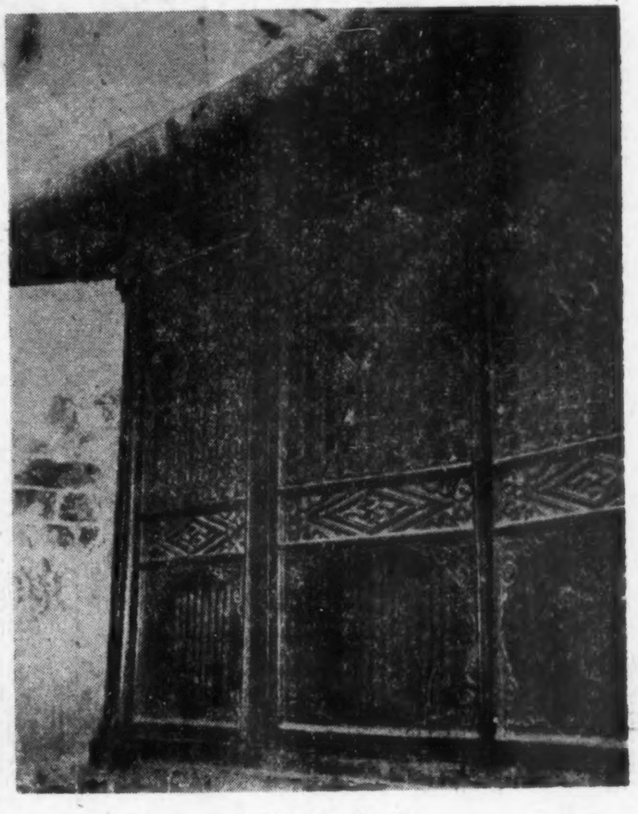
自均县城西南行五十里許，即达武当山山麓。由山麓至山頂約八十里，沿途所經名胜古迹計有：玄岳門、遇眞宫、元和观、玉皇頂、迴龙观、迴心庵、磨針井、老君堂、太子坡、剑河、十八盘、玉虛岩、南天門、紫霄宫、南岩宫、小金頂、黄龙洞、朝天宫等；由朝天宫又分两路，一为老路，一为新路（1926年开凿的）。老路有头天門、二天門、三天門、天云楼、天鶴楼、皇經堂等；新路有百步岩、金童峰、玉女峰等，到皇經堂二路会合，再由皇經堂进皇城經过九連蹬即至金頂。在这些名胜古迹中的建筑和附屬物，据初步統計，共有房屋472間，銅鑄造物351件，鉄鑄造物618件（其中有475个小鉄灵官），錫鑄造物61件，泥塑603件，木雕384件（其中有346个小木灵官），石刻269件，其他68件。現择要簡介如下：

（一）金殿（又名金頂）：殿建于海拔1,652米的天柱峰上，殿基用花崗石砌筑，基址以上全为銅鑄鎏金，仿木結构，重檐廡殿式，高5.5，深4.2，寬5.8米。殿頂正脊两端飾以鴟吻，戗脊飾以一兽头、五蹲兽、一嬪伽，檐头施以云龙紋圓瓦当和滴水，殿內有云龙紋天花藻井。大門裙板鏤鑄二龙戏珠，大小額枋和垫板鑄成旋子彩画和云龙紋。下檐斗栱为单翘双下昂七踩，上檐斗栱为重翘双下昂九踩。殿外围栅栏一周，均用銅衣包鑲，上鑄云龙紋和銘文。据太和志載：“永乐十四年創建，冶銅为殿，黄金飾之”。在殿的石基和栅栏上雕鑄有明嘉靖、万历等年号。

（二）元代古銅殿：殿为銅鑄仿木結构，悬山式，高2.4、寬2.7、深2.5米，平面仅一間，略呈方形。結构簡单、朴实，正面角柱間使四抹球紋槅扇，槅扇上放一横枋承托瓦頂。瓦底和槅扇均鑄有銘文，記載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各地信士捐资鑄殿事宜。

殿通体榫卯，可拆可合，原置天柱峰上，永乐年間，移至小蓮花峰轉展殿內雕花石須弥座上。銅鑄造的建筑物，就目前所知全国总共不到十座，其中多数为明代所鑄，少数为清代所鑄，而这座銅殿鑄于元大德十一年，实为現存最早的銅鑄建筑物。

（三）南岩宫：宫建于悬崖陡壁上，地势險要，风景奇特，惜大部建筑已毁，現存建筑中較好的为石殿。殿全部石建仿木結构，面闊与进深均为三間，檐下施斜形斗栱，上作悬山屋頂。这样大的明代石构建筑，湖北省仅此一座。



元代古銅殿

（四）紫霄宫：在展旗峰山麓，左右群山环抱，前面較敞，有一小溪流过，花木丛生，頗引人入胜。宮內現存建筑，保存較早較好的是紫霄殿。

殿为木构建筑，重檐歇山頂，面闊与进深均为五間。殿頂全部琉璃瓦面。殿身檐柱間使用四抹棱花槅扇。殿內天花藻井梁架結构，通体施以彩画。外檐和內槽均使用斗栱，外檐斗栱五踩出双下昂，并用眞昂，上檐为七踩出单翘双下昂。（图見本刊1956年5期頁79）

据太和志殿的建造年代——为明永乐十一年至十六年間；又說紫霄殿建成，明宪宗在北京为之鑄造陈設供器，"特遣太监陈嘉送詣宮所奉安"，可見殿的建造，在明宪宗时以前。

南岩宫

（五）附屬物：武当山各宮观庙庵的附屬文物以銅鑄艺术品为主。現存成組的鑄象共有五組，每組五至九象，如祖师象一組为祖师（坐象、高1.85米）、桃花、周公及执旗、捧剑（此四象均为立象，各高1.46米）等象組成，为現存鑄象中較精致的一組。单件鑄象有：张三丰坐象（高1.4米），武士立象（高0.3米），大蓮花瓶（高0.8米）等。又有立体瓶形的武当图，上鑄武当山各主要宮观和山峰道路以及神話故事，上部鑄"大明嘉靖"、"北京"等字，高1.20米。玄武象：相传龟蛇为水火二神，鑄此象，象征水火既济之义，高0.50米。

祖师象

武当山是湖北省保存較完整的明代建筑組群，据太和志載："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命隆平侯张信、駙馬都尉沫昕，統率軍夫二十余万敕建武当山"，又传說明成祖与建文之爭，建文奔至湖广均州太和山出家，故以十三省十三年之田賦納来建修武当山。从这一工程規模之宏大，耗資之巨来看，反映了明代上层統治者的豪奢；而另一方面工程建筑壮丽精美，也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执笔者：[illegible]安民

桃花女象

周公象

武当图

玄武象

# 金　殿

李竹君

出湖北省均县城搭乘汽車南行五十里抵草店鎮，然后步行二七里就进入了名聞全国的道教盛地——拔海1600多米高的武当山风景区。武当山方圓800余里，中有七十二峰逶迤聳峙，尽多險崖奇峰，茂密的丛林給它們披上了翠綠的衣衫。这里泉流潺潺，小径幽深，到处可以听到动听的鳥鳴，不知名的野花的芬香袭人心肺而使人陶醉；变幻离奇的云霧竟日地飄忽在山头。这是多么綺丽和娇媚的祖国河山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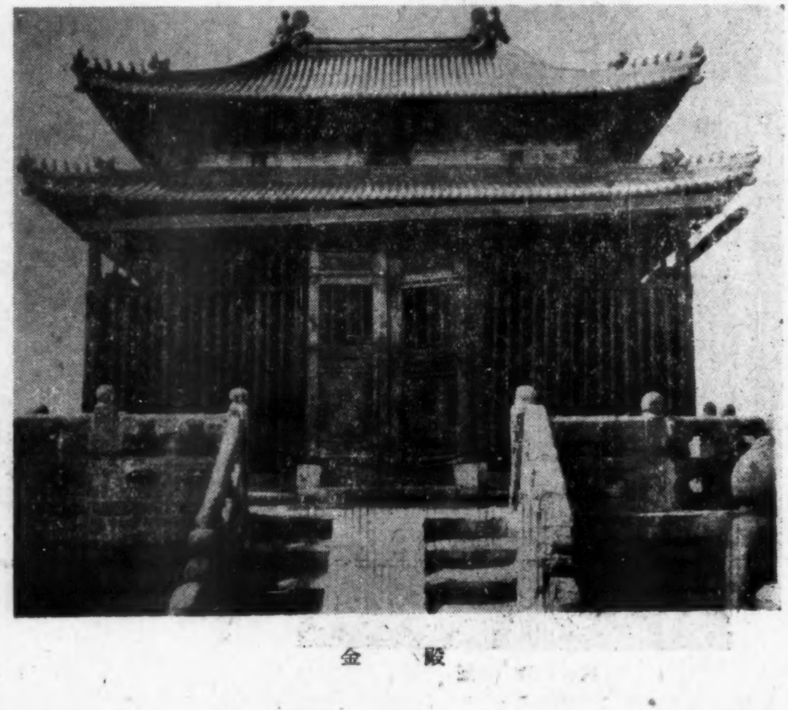
明成祖朱棣登位后，为了巩固他的封建帝王統治，极力提倡和推崇道教。永乐十年（1411年）他派隆平侯（官名）张信和駙馬沐昕率領軍队二十万人来到武当山，开始了規模庞大、耗財百万的建筑工程，大約經过了七年，至永乐十六年（1417年）工程才告竣，建成了以太和宫、紫霄宫、五龙宫、南岩宫等八大宫观和金殿为主的建筑組群。在武当山的腹地有太和宫，其东面有一条小径，上鋪石阶，旁护以栏干，依山九轉而上，当地呼为九連蹬。爬越过九連蹬就是武当山主峰——天柱峰的頂端。当游客剛剛走完了这九連蹬的最后一折时，一个小小的院落便豁然呈現在眼前，使人精神为之一爽。在小院落中央的白石台基上，矗立着一座金黄色的庄严凝重的宫殿，这就是武当山中的一顆明珠——金殿。

这里少有晴天，在多数的日子里，这里都瀰漫着从山谷中吹送过来的云霧，金殿在其間若隐若現，离奇变幻，气象万千。一遇上了碧空万里无云，紅日当头的时刻，金殿就一变而为光彩煥发，迎着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輝，显示出富丽堂皇的景象。

金殿完全用銅雕鑄成，除正面的槅扇門外，表面皆鍍以黃金。不論是它的結构体形，还是細部构件和装飾，都极其精細地逼眞地模仿了木构建筑，毫无一点鑄凿的痕迹，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境地。

金殿共立柱十二根，宝装蓮花柱础。殿的通长5.8米，通深4.2米，面积近20余平方米，高5.5米。殿身的两层檐部有排比整齐的斗栱和椽飞；柱梁枋和天花板上雕着綫条流暢、优美細致的花紋和图案，犹如木建筑中的彩画。殿頂上置大兽头和数十个小动物，形象都很生动可爱。进入金殿內部，在有着美丽的竹叶状紋理的光滑的石灰岩石地面上，是銅鑄的神象、供桌等。后壁前中央一尊坐象是眞武帝君；其两側各立一尊侍者象，左为周公，右为桃花女；左右壁前是两个天兵站象，左者手执一面大旗，右者捧一把长剑。每尊銅象都刻画入微。那眞武的尊貴威严，侍者的拘謹恭順，天兵的魁伟豪劲，一經我們古代劳动人民双手的鑄刻簡直表露无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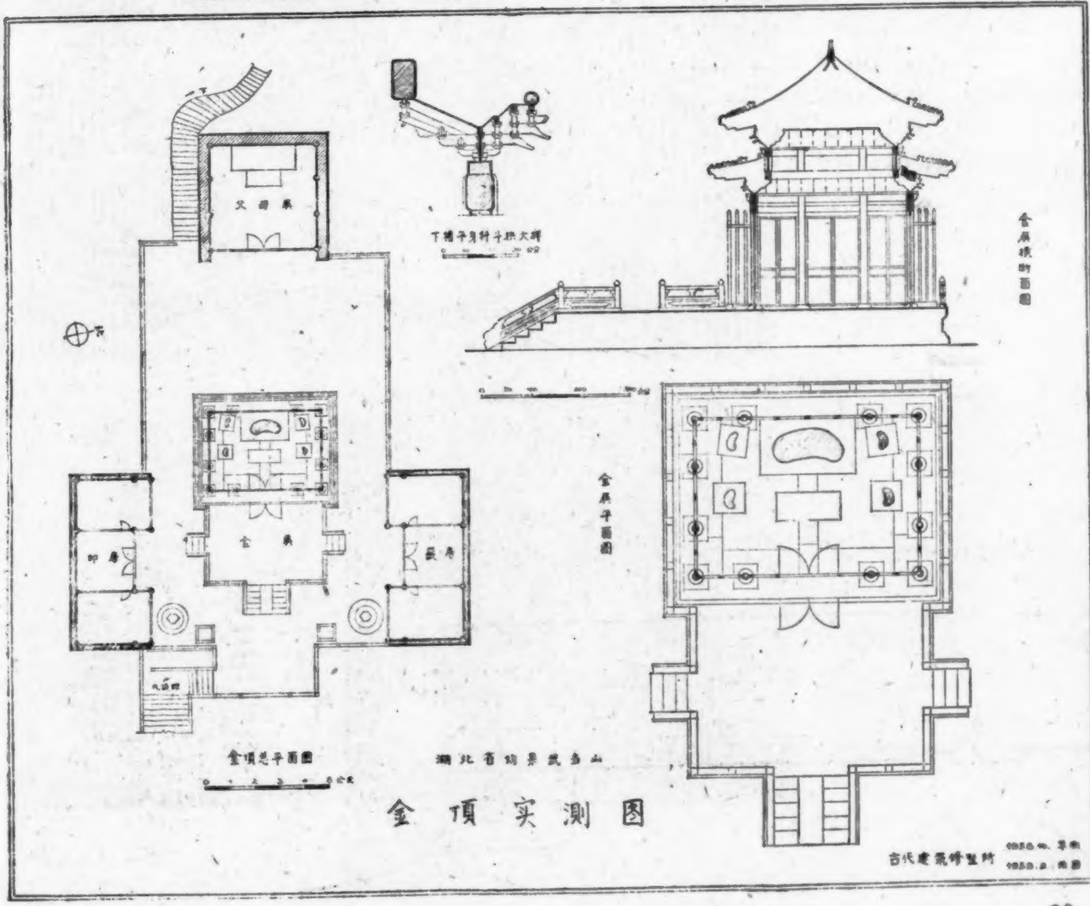
这个經历了五百多个寒暑的金殿，今天仍然完整地屹立着。它作为建筑来看，对于我們了解明代初期木构建筑的結构造型及其装飾艺术，将是一个最有力最确切可靠的实物例証；把它看作工艺美术品，无愧是我們祖国銅雕艺术中一件珍貴的精品。早在十五世紀中叶，我們聪明智慧的劳动祖先就在銅鑄建筑艺术上取得了这样高度的成就。这一建筑和艺术上的成就，加深着我們热爱祖国的情感，激励着我們在今天祖国的建筑上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金　殿

金殿大門裙板

金殿翼角細部



# 紹兴大禹陵及兰亭調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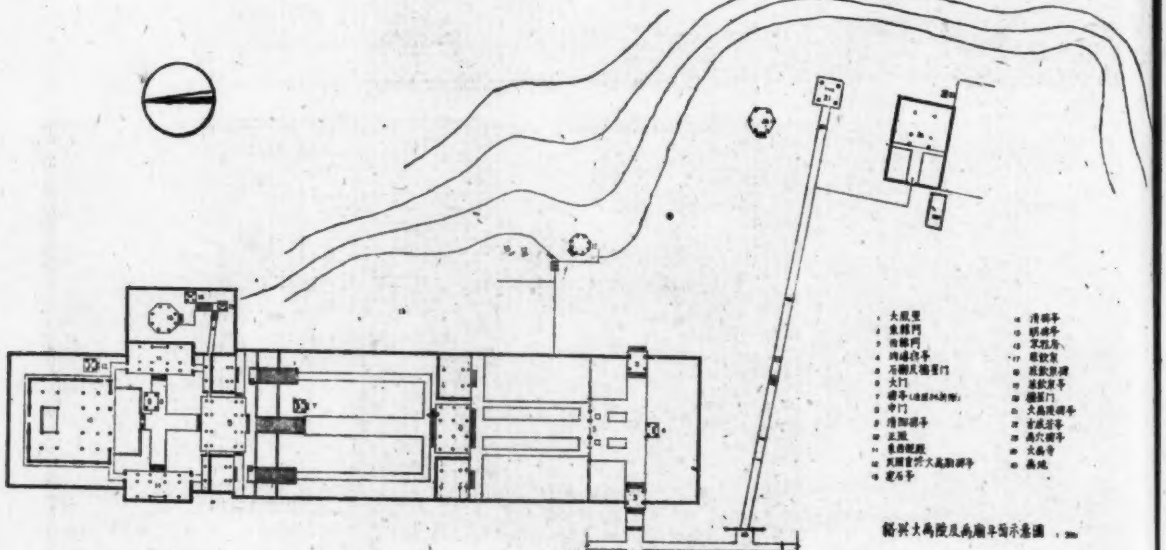
陈　从　周

1958年1月，浙江省紹兴县人民委員会对大禹陵和兰亭进行修复，我参加了施工前的調查、計划工作，現将調查所得分述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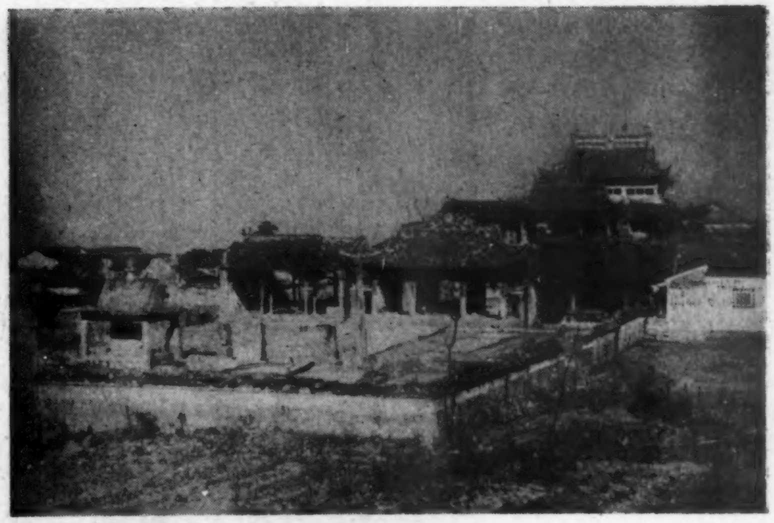
大禹陵在紹兴市东南約十二里的会稽山麓，出紹兴市稽山門由水路可达，古人所謂“山阴道上”，风景确是明秀宜人。現在該处建筑群計分：(一)大禹陵，(二)大禹庙，(三)大禹寺。三者皆在一地，后二者因前者而产生，如以建筑而論，当首推大禹庙。

大禹庙的历史，浙江通志卷二百二十一說：“大禹庙在县东南，少康立祠于陵所、梁时修庙，……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敕庙額曰告成，东廡祭嗣王启，而越王勾践亦祭别室。……郡境尙有四所，一在山阴县西塗山，一在山阴县蒙搥山，一在嵊县了溪上，一在新昌南名公塘庙。山阴庙在塗山，宋元以来，咸祀于此，明时始即会稽山陵庙致祭，茲庙遂废，大禹陵庙每岁有司以春秋二仲月祭。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南巡閱視黄河，念大禹神功，特幸会稽，二月十四日昧爽致祭，……紹兴府知府李鐸增葺祠宇，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知府俞卿重修，而旧祠規模狹隘，岁久断圮，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总督李卫动帑兴修。”同書卷二百三十八：“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詔吳越王立禹庙于会稽，……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月修大禹陵庙，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浙江省进大禹陵庙图，九年（公元1377年）命百步之內禁人樵采，設陵戶二人，有司督近陵人看守，每三年遣道士斋香帛致祭，登极遣官告祭，每岁有司以春秋二仲月祭。”到了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阮元巡撫浙江时曾重修一次（見阮元重修会稽大禹陵庙碑），其后张載阳又集款大規模进行修理（見章炳麟大禹庙碑），遂成今状。

大禹庙既經历代修建，今日从文献方面可以考知其規模的只有康熙会稽县志，該志卷十四上說：“夏禹王庙在县东南一十二里，正殿七間（作者案志附图仅五間），东西两廡各七間（作者案志附图



紹興大禹陵及禹廟平面示意圖



大禹庙全景

大 禹 陵

大禹庙中門

作八間似誤),中門三間,櫺星門三間,大門一間,宰牲房一所,窆石亭一座(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修,二十年知府张明道重修)禹書碑亭一座(碑文明嘉靖二十年知府张明道将岳麓書院本翻刻入石),陵殿三間,石亭一間,碑曰大禹陵,斋宿房一所,櫺星門三間。(俱知府南大吉建)"其他如紹兴县人民委員会所藏清未俞駿繪禹陵一图,也与今日布局相似。

現在的大禹庙,已經过1935年的一次大修理,但当时所及以正殿为主,其他仅略加修葺,現存木构当以大門、中門、及乾隆"御碑"亭較早。

大禹庙窆石

大禹庙明碑亭

大禹庙在大禹陵旁,坐北朝南,周以丹垣,总体布局前低后高,不在一个平面上。入口为东西轅門各一間,悬山頂造,現已損毁。入內北向为岣嶁碑亭,石制,单檐歇山造。碑高一丈一尺七寸,广五尺六寸。其北为石獅一对及石制櫺星門三間。入內进甬道为大門,面闊三間,进深七檩、单檐歇山造,中柱之間辟三門,东西次間的梁架应用垂蓮柱脊檩之下施欀間。斗栱平身科明間用四攢,次間三攢,山面与次間相同,用五踩双昂,手法近官式,梁枋砍杀,亦非当地常态,又正背两面尙存頂部有卷杀的柱二根,从这二柱以及脊檩下的欀間来看,証以乾隆"御碑"亭的若干做法,此門似在清乾隆时重建,并用了一些旧料,至于脊飾及屋角起翹屡經修理,則純为江南做法了。其左右有朵殿各三間,施前廊,单檐硬山造。其出檐将把头梁延长向前伸作挑梁状,前端置挑檐檩,也是江南常用手法。再北登高台为中門,面闊三間进深七檩,单檐歇山造。梁架手法与大門相似,用方料直材,与当地一般建筑稍异,但比官式用材又較小。其建造年代当与大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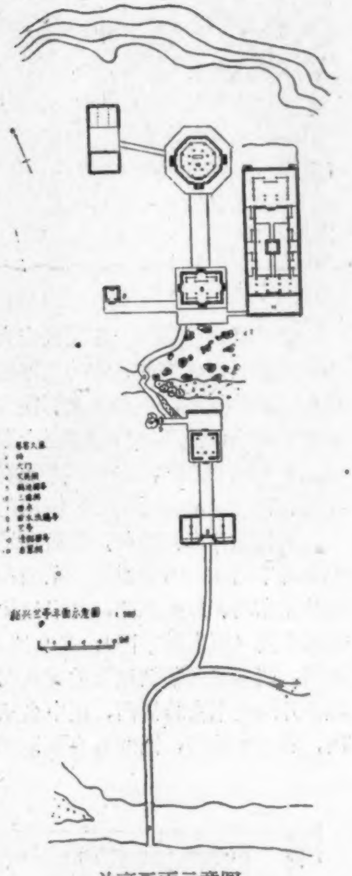
大禹庙大門次間梁架

大禹庙正殿

时，而彩画則經重繪。斗拱平身科明間四攢，次間三攢，山面自南往北，第一三两間各一攢，第二間六攢，斗拱手法及出跳均与大門相同。其旁有朵殿各三間，施前后廊，单檐硬山造，为置碑之所。最后为正殿五間，重檐歇山造，系1935年重建，鋼筋混凝土結构。其前置清乾隆辛未（公元1751年）"御書"碑亭。亭歇山頂，石柱，施一斗三升斗拱。正殿旁有左右配殿各五間。单檐硬山造。自东配殿背后登山，有八角亭，今已废，内置窆石，亭背树有"禹穴"二字碑一。于此四望，近处峰巒，远渚烟水，画入眼底。所对于窆石的解释，其說不一，康熙会稽县志謂"禹葬会稽山，取此石为窆。"明韓阳重修窆石亭記以为"是下棺之具"或"下棺之后以石鎮之"。石高約一丈，頂上有穿，題字在石下方，字大二寸許，金石录以为永建元年（公元126年）五月所刻，清阮元两浙金石志以其篆文似天璽記功碑，断为三国时所刻，今字迹已模糊难辨。石上尚有南宋赵与升隶書題名（无年月），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李倜題名。石旁有清阮元隶書重修会稽大禹陵庙碑，明天順六年（公元1462年）韓阳重建窆石亭記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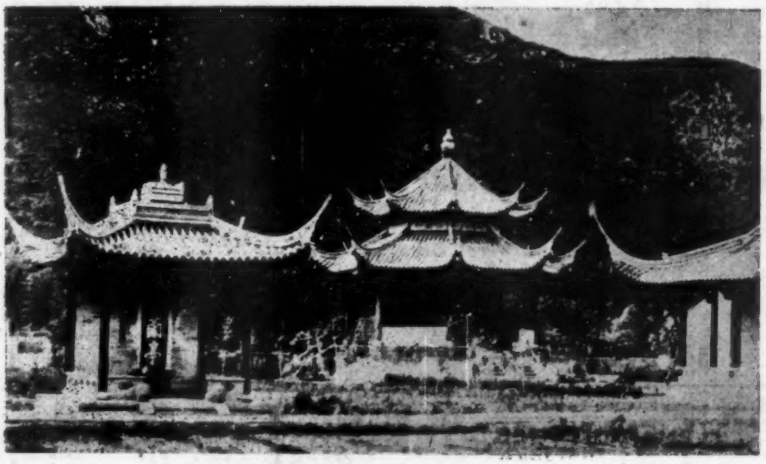
大禹陵，西向，面临禹池，正对亭山，禹池外二小山分列左右，而会稽山环抱其后。陵殿已毁，陵前尚存大禹陵碑一通，上复歇山頂碑亭，斗拱用五踩双昂，建筑手法与大禹庙大門、中門相似。其旁为八角重檐石亭，上書古咸若亭，陵南有一碑亦書禹穴二字，为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二月所立，入口处有欞星門三間，大門已不存。陵之北为大禹寺，梁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建，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毁废，明年重建，自唐以来为名刹，西偏有泉名菲飲。(据嘉泰会稽志) 今仅残存寺殿五間，也是晚近建筑。殿后壁間嵌有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岁次庚申所刻往生碑一通。

兰亭在紹兴市西南二十七里，这个地方群山合抱，曲水湾环，茂林修竹映带左右，风景非常优美。嘉庆山阴县志有如下記載："句践种兰諸田，汉旧县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临郡起亭于山椒，极高昼眺，亭宇虽坏，基陛尚存。赵宋景祐中太守蔣堂于兰亭修永和故事有詩。明嘉靖戊申（公元1548年）郡守沈启移兰亭曲水于天章寺前，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均重建，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重修，并查明旧亭基址在东北隅上，土名石壁山下"可知今日的兰亭是明代嘉靖間迁移后的所在。兰亭已有多次迁移，王羲之作曲水序究竟是那一处，现在已經不得而知了。



兰亭平面示意图

兰亭主要木构为曲水流觴亭，系面闊三間单檐歇山四面用周廊的建筑，面临曲水，其后中軸綫上为清康熙写的兰亭序碑的碑亭，八角重檐，其旁又有兰亭碑亭，系在盖頂之上再加一方頂，形制較特殊，两碑亭都是公元1923年重修。当时又在曲水前建一面闊三間重檐歇山的文昌閣及大門三間，在曲水左为右軍祠，也是1923年重修的，此外还有三角形的鵝池亭等。兰亭建筑在布局上是案江南园林的方法，以曲水平岡亭閣为主，故入口頓覚开朗，在园林設計的"借景"上是經过一番安排的。与大禹陵相較，一主严謹，一主明秀，建筑情調有所不同。从乾隆紹兴府志所載兰亭图及嘉庆山阴县志一图看来，两图情况无大异处，可知嘉庆后修理时变动較大，而以1923年的一次最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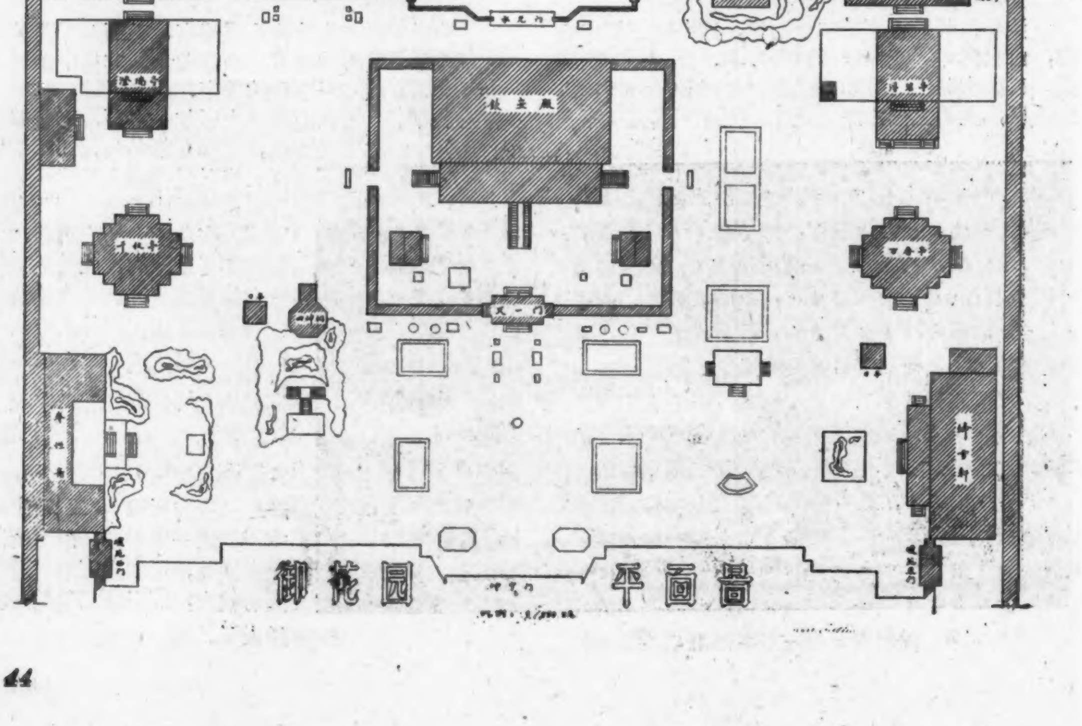
兰　亭

# 故宫御花园

王璞子

北京故宫是我国一座規模宏大的古宮殿群，是十四世紀初期建筑的。它的整体布局沿袭了古代封建“王城”的規制，主要宮殿都在宮城——紫禁城的南北軸綫上，前面是“外朝”三大殿，后面是“內廷”后三宮和东西六宮，左右两旁还有很多宮殿和附属建筑。御花园就是后三宮范围內的一部份。

御花园原名宮后苑，位置在坤宁宮的北面。正中有坤宁門和园內相通。园东南和西南隅各有門，名琼苑东門、琼苑西門，可以通往东西六宮。北面有順貞門（原名坤宁門），是宮墻北并列的三座琉璃門，門外就是紫禁城北的神武門。順貞門內有三座单开間的木构牌楼門，正中名承光門，左名延和門，右名集福門，門間各有短垣相接，是由北面进入园內的第二道入口。园內西側另有过厅門三間，可以通往西路的漱芳斋。园总計有五个出入口，东西长一百三十多米，南北深九十多米，占地面积約一万二千平方米，当宮城总面积 1.7% 左右。这个园的規模是不大的，然而却容納了大小二十多座建筑物，有十几种不同的类型，几乎占了全园三分之一的面积。另外还有山石树木、花池盆景和周廻园內的五色石子甬路。实际上这个园的布置是以建筑为主体的“宮廷式”花园。布置方法基本上也是按照宮殿主次相輔、左右对称的格局安排的。山石树木仅为陪衬建筑和庭院的景物，与三海頤和諸园的布局章法有所不同。此园以布局紧凑、建筑富丽取胜；在庄严整齐之中，力求变化，富有浓厚的“宮



廷"气氛。

园中建筑布局大致可分为三路，正中偏北与坤宁宫相对的欽安殿，是一座面闊五間重檐結构的高大殿宇，也是全园中央的主体建筑，过去是宫廷內供奉道教神象的地方。殿基为"須弥座式"的石台，正中有雕刻云龙的石陛，左右两側也各有石阶上下。台上周围安着雕刻龙鳳花紋的白玉石栏干。殿前出抱厦五間，与殿相接，构成了一个凸字形的平面。殿的上頂是平頂四坡式的"盝頂"，黄色琉璃瓦，围脊当中安鎏金宝頂，四角吻兽斜出四条垂脊，形式很优美。欽安殿周围环有方整的院墙，正面和左右有三門，正中是天一門，左右是随墙小門，形成一个独立院落。天一門为水磨砖造的单元券門，歇山式黄琉璃瓦頂，两挾有黄琉璃影壁，壁心鑲嵌白色云鶴图案，頗生动。門內左右有两座方亭，前半間是敞廊式，后半間四面安門窻，隔成半間小室。方亭是建筑上常用的一种形式，但象这样分間方法却很罕見。欽安殿院墙的結构做法和宫墙相仿，也是磨砖下肩，紅墙身，綠琉璃檐，黄琉璃頂子，不过墙身特别矮小，比殿基台稍高出，驟然看来，殿大墙矮，极不相称。然而如就园內整体环境和欽安殿所在位置联系起来，这座矮墙的处理，确乎有其独到之处。欽安殿坐落全园中心，体形高大，然而逼于四面高大的宫墙之中，其巍峨之势，已覚減色，若再环筑高大院墙，便益嫌局促。矮墙由于大小显著的对比，愈显出殿的高大。而且由院內可以望見园內景物，掩映如画，不致因墙头过高影响視綫了。而由外向內，則欽安殿宏伟之状半可收目中。不能不考虑全面的环境，使得造景越显得曲折不尽。这样一方面保持了欽安殿独立完整的格局，另方面也将园內区划成更多不同的优美环境，使入园者可以尽情欣賞。在方整规矩之內，匠心的运用是很巧妙的。

以欽安殿为中心，在左右两側采取对称方式或因高就低，或以小托大，布置了十余座亭台楼閣，前后映衬，就方正对称的局势，采取了多端的变化，所謂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是这座花园基本的特点。自北而南，在欽安殿后左方巍然矗立的是高大

欽 安 殿

的堆秀山，山是利用多种形状的太湖石堆叠而成的。此处原来是观花殿旧址，明万历間改堆成山，重阳节在此登高。山下有岩洞，左右有蹬道，山頂即御景亭，可以遙望禁城內的宫殿和御园景物。原来还設有水法，由高引下，可以从山前石蟠龙口中噴水。山东側是摛藻堂，为向南五間悬山殿。右耳房一間，紧临山脚。堂左即凝香亭。堂內从前貯藏着我国有名的四庫全書薈要。堂前是一个長方形水池，右角有石梯可下至池底，泊岸有石兽可以吐水。明代尝利用水車引禁城外河水注入池中。池当中横架单孔石桥，桥上建浮碧亭，四面开敞，亭前接有敞軒。亭內天花板都是五彩百花图案，极为美观。亭南有一座上圓下方四面出厦的重檐亭子，叫万春亭。亭平面作十字形，基座四面出陛，周围安白玉石栏干，柱額門窗的朱油彩繪，配着黄色琉璃頂子，金碧映輝，光彩夺目，与千秋亭同是园內美丽的建筑。万春亭前又有小井亭为四柱方亭，上頂轉作八角盝頂，构造新奇，外观也很秀丽。亭南坐东向西的是絳雪軒，面寬五間，旁带一耳，前出厦三間，形如凸字，梁棟間画綠色竹紋彩画。門窗装修一概楠木本色，窗格是"万寿无疆"的花紋，与园內其他建筑大紅大綠的顏色相較，特别显得朴素雅致。堂前砌方形五色琉璃花池，上堆玲瓏湖石，其間种植太平、牡丹等花卉，儼然一座灿烂絢丽的大型盆景画图。絳雪軒是占地深广而体形并不高大的一座建筑，堂前叠山也是平广取胜，一主一輔，大小分明，以平远、广闊之势，組成一体，在园內自成一

个优美境地。軒南向东的琉璃門就是琼苑东門，过門轉南是东六宮的东一长街，以上是园內东路布置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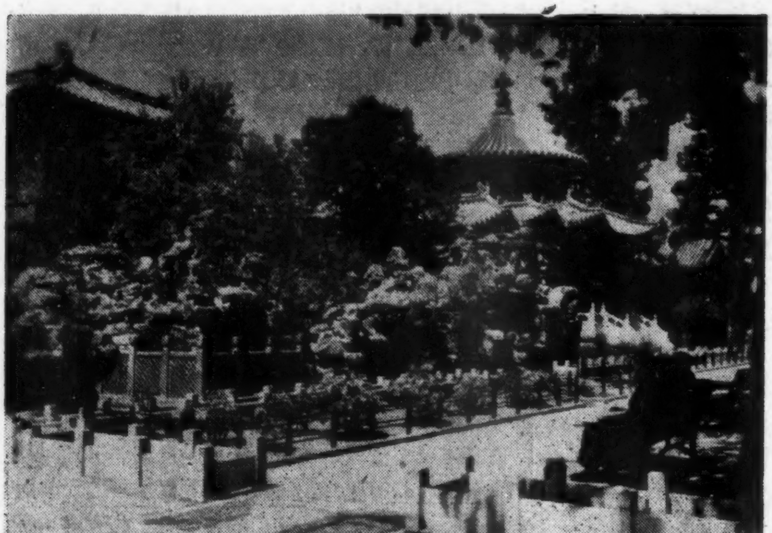
园內西路建筑，在欽安殿后右的是延暉閣，东与堆秀山御景亭左右对峙，遙相呼应，是两个不同体形的对称体。閣三間，为重檐二层楼，卷棚歇山頂，黃色琉璃瓦，与东面山上御景亭綠琉璃黃剪边的頂子，在色調上也不相同。閣下不出廊，楼上周围出廊。由順貞門宮墙外，便可望見这两座巍峨壮丽的建筑。閣右是位育斋五間，西有玉翠亭。軒前也是一个长方水池，上有澄瑞亭，形制和东面的浮碧亭相仿，但此亭四面均有門窗。水池因限于漱芳斋过厅門的位置，稍缺其西南一角。过厅門就在池的西面，形制装修和絳雪軒的前軒大致相仿。澄瑞亭南面是千秋亭，外观形制和万春亭完全相同，是园內唯一的一对构造装飾毫无差別的建筑物。南行稍左为四神祠，是前面带敞軒的八角亭子，坐南向北，正对延暉閣。亭側井亭和东井亭結构一样，但四面有門窗并用綠色油飾；与东亭紅油飾敞开式稍为不同。祠后有叠山一区，四面有蹬道、石門，可以登临。山前建方石台，高与山齐，背面有石蹬道，台上四望，松柏交蔭，景物可观。平台正西为养性斋，是千秋亭偏南最外側的一幢楼閣式建筑，平面作冂字形，位于石基台之上，坐西向东，与东面的絳雪軒相較，一个是以方广平坦取胜，一个是以高大峻拔見长。楼前点綴假山，环障如庭。尤其两側楼头的峭壁，大皴大点，頗見手法。面北一段，矫揉造作，平淡无可取。琼苑西門就在养性斋

絳雪軒前花池

的南偏，是由西六宮长街进入园內的一座琉璃門。

园中布置略如上述，由附图可以看出这些建筑物的相对位置，基本上是采取左右对称的格局。至于道路、树木、花池、盆景，也莫不如此。而最大的变化則在于各个建筑物間大小高低、方圓欹斜、横竪坐向，以及局部装飾式样色彩花紋的种种不同。現就以下几点略作初步分析：

一、平面　园內建筑物的平面有五种基本不同的形式，即方、长方、十字、八角、和凵字形等。方形的如御景亭、井亭、浮碧、澄瑞和天一門內的左右亭等。长方形的如欽安殿、延暉閣、摛藻堂、位育斋、漱芳斋过厅門、禊賞亭平台、絳雪軒和琉璃門、牌楼門等。十字形的有万春、千秋二亭。八角形的有四神祠。凵字形的即养性斋。由于建筑物附加了抱厦或耳房，因之平面也发生了变化，从这五种基本形式又发展为若干新的形式。如欽安殿和絳雪軒的前軒形成凸字形，四神祠八角亭，前接方軒，形成凸字的变形。浮碧澄瑞二亭前接方軒，变成了南北向的长方形。摛藻堂、延暉閣、位育斋都是东西置的长方形，摛藻堂加了一耳，便与二者有了区别。承光等三門和天一門都是长方加两耳。水池的平面也有圓形、扇面形、长方形三种。



千　秋　亭

二、間数　房屋間数，最

少一間，最多十五間。方亭之类都是一間，养性斋上下各十五間。其他有三間，有五間，有五間带一耳的（摛藻堂）、有一間代两耳的（天一、承光等門），有一間出四厦的（万春、千秋亭），有一間出一軒的（浮碧澄瑞亭和四神祠）。欽安殿是五間出五厦，絳雪是五間出三厦，旁带一耳。还有半虛半实的（天一門內方亭）。另外同是五間也有外廊內廊之分（摛藻堂和位育斋），同是前軒也有一敞一閉（浮碧和澄瑞亭）。延暉閣是下层不出廊，上层周围出廊，养性斋則是上下均出廊子。

养 性 斋

三、外观造型 有平房建筑，也有楼房建筑，欽安殿是单层的重檐殿，延暉閣、养性斋則是单檐（上頂）的楼房。此外各座多是单层平房式，但是在屋頂結构上則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变化。

四、屋頂形式 类型很多，有廡殿頂（养性），有歇山頂（天一），有悬山（摛藻），有硬山（位育），有卷棚，有盝頂（欽安、井亭），有一把伞的圓頂（千秋、万春）。卷棚又分悬山、歇山、硬山。盝頂也有四面坡和八角形的。

五、基座 有平台式基座（养性、絳雪等），也有"須弥座"式基座（欽安）。有正面出阶，有三面出阶，有四面出阶（千秋、万春），也有正面出重阶（养性）。有带栏干，有不带栏干。望柱头有雕刻龙鳳紋的龙鳳筒，有麻叶头，有石榴头，也有方平如意头的。栏板有雕龙的，也有起綫的。

六、色彩 柱額檐头都画有彩画，有龙鳳和璽（欽安），有旋子彩画，有福鶴錦双龙枋心（承光等門），和竹紋嵌万寿字的彩画（絳雪）。柱子門窗大多朱紅油飾，仅絳雪軒和西井亭柱子檻框全为綠色斑竹紋。琉璃瓦有黃綠二色，基本以黃色为主，亭子則用綠色瓦，以黃瓦鑲边（御景亭）。另外凝香亭和玉翠亭都用黃綠瓦相間做法，吻兽件活是烧就黃綠二色，在故宫也很少見。

七、装修花紋 門窗格扇有正、斜方格眼，有毬紋（欽安），有灯籠錦（延暉），有步步錦，有菱花窗，也有支摘窗，花样变化很多。

八、石子甬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就砖雕成花紋，一种是以瓦条組成花紋，都是就花紋空間塡鑲五色石子鋪成各种花样，多至十数种。如花卉、人物、博古、建筑、蕃草、飞禽、走兽等題材相当丰富。

总之由以上各点可以看出此园的經营当时是經过了很大的琢磨工夫，虽然受着宮殿庄严对称格局的影响和地形的限制，但并沒有因此而束縛了規划設計的技巧，原則上是保持了对称的方式，而实际上各个单元的組成，由平面以至立体，由局部以至細节，各个单元間相互烘托映衬，处处表現着变化运用的匠心。建国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对文物建筑的重視，賦予了这座花园以新的生机，不但修繕了原有的园內建筑物，栽培了更多的花木，而且就其原来风格特点，存精去蕪，适当的予以安排修整，去掉了一些后来增加的妨碍园內布局的建筑物，使这座花园更加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 关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复原的討論

楊 寬

作者四年前，为了探討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曾对我国古代冶鉄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作过初步探討。我在写“中国古代冶鉄鼓风爐和水力冶鉄鼓风爐的发明”一文时，看到王禎“农書”上卧輪式水排图翻刻有誤，不但“直木”的装置有誤，而且“旋鼓”和整个牵动“木扇”的机件不相联属，因而根据由迴旋运动轉变为往复运动的原理，画了一张复原图。当时我見到“掉枝”誤装在“上卧輪”上，使整个机件不能轉动，又見“农政全書”上和“卧輪式水排”同样結构的“水击面罗”，“掉枝”誤装在木架上，也使整个机件不能轉动，因此把“掉枝”改装到“旋鼓”上来，使它能够轉动。这样的“复原图”，虽然基本符合了机械轉动的要求，但是使“旋鼓”脫离了“木架”，使“旋鼓”的上輪軸失去了支架，并不稳妥。現在讀到本刊本年第五期李崇州先生“古代科学发明水力冶鉄鼓风机水排及其复原”一文，对王禎农書所載卧輪式水排的复原，有了提高，很感高兴。复原图把“掉枝”装在“旋鼓”的上輪軸上，是符合于原来“农書”的原图的，我很贊同。“农政全書”上的“水击面罗”也該把“掉枝”装在“旋鼓”的上輪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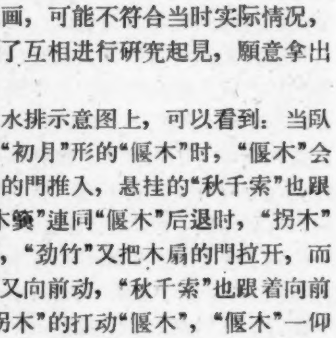
作者在四年前，也曾企图把“立輪式水排”复原，現在看到了李先生的“立輪式水排示意图”，我覚得李先生这张复原图，还有待商榷。第一，李先生所画的复原图，用繩索悬挂着木框，在木框中装置着横立的“偃木”，这和“农書”所說：“籆头竪置偃木，形如初月，上用秋千索悬之”不合。“农書”中既沒有說到木框，而且把“偃木”横立着，也就不象“初月”。第二，李先生对这张复原图沒有說明，但是照图上的結构看来，用“卧軸上所列拐木”打动排前“偃木”，未必能做到“排即随入”。第三，如果原来确是这样的結构，为什么“偃木”要“形如初月”？究竟“形如初月”起怎样的作用呢？

“农書”对“立輪式水排”的說明是：

> “先于排前直立木籆，約长三尺，籆头竪置偃木，形如初月，上用秋千索悬之。复于排前置一劲竹，上带捧索，以控排扇。然后却假水輪、卧軸所列拐木，自然打动排前偃木，排即随入。其拐木旣落，捧竹引排复回。如此間，打一軸可供数排，宛若水碓之制，亦甚便捷。”

这里，最重要的关鍵是“偃木”。“偃”有仰仆之义，“偃木”当由一仰一仆而得名。“立輪式水排”的运动，其关鍵当在“偃木”的一仰一仆之中。按照“农書”的說明，它的結构是：在木扇（排）前直立着一根三尺长的“木籆”，如同“卧輪式水排”上的“直木”。在“木籆”的头上竪置着“初月”形的“偃木”，用秋千索悬挂起来。所謂“秋千索”，只是象秋千那样的索，并不是用“秋千”悬挂起来。再在木扇前直立一根“劲竹”，上端带“捧索”，拉住木扇。水輪轉动时，水輪的卧軸上的“拐木”，就打动“偃木”，木扇的門随即被推入，等到拐木从“偃木”上落下，“劲竹”上的“捧索”又把木扇的門拉开。这样，由于“拐木”的打动“偃木”，“偃木”一仰一仆，就使得木扇的門一关一开，起着鼓风的作用。我曾經根据这样的理解，画了一张复原的草图，但因“农書”上原来无图，全憑說明来画，可能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沒有发表，現在为了互相进行研究起見，願意拿出来向大家請教。

从这张立輪式水排示意图上，可以看到：当卧軸上的“拐木”打到“初月”形的“偃木”时，“偃木”会推动“木籆”把木扇的門推入，悬挂的“秋千索”也跟着向后蕩，等到“木籆”連同“偃木”后退时，“拐木”就从“偃木”上滑下，“劲竹”又把木扇的門拉开，而“木籆”連同“偃木”又向前动，“秋千索”也跟着向前蕩。这样，由于“拐木”的打动“偃木”，“偃木”一仰一仆，“秋千索”如同秋千那样前后摆蕩，而木扇門就一开一閉，起着鼓风作用。（因为沒有經过試驗，也沒有經过計算，所画示意图的比例不一定正确）



立輪式水排示意图

李先生看到

王楨說："古用韦囊，今用木扇"，于是把"农書"上"水排"的"木扇"改換成了"韦囊"，認为是恢复了古制。这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从世界各国冶鉄鼓风机发展的历史来看，都是先有风囊而后有木风箱的，但是从风囊到木风箱，其間經历着一两千年时間，从用风囊的"水排"到用木风箱的"水排"，也經历着几百年到千年以上，在这样长的时間里"水排"不断有着进步，我們怎样可以把后来用木风箱的"水排"改装风囊，就算是恢复了古时的形制呢？第二，从欧洲"水排"的发展情况来看，所有早期的"水排"，水輪的臥軸上的拐木都直接打动风囊，有的打在风囊的底部，有的打动风囊的柄，最初的形制和"水碓"一般无二，后来經过不断改进，机构就逐漸复杂，运动起来也越来越灵巧，工作效率也越来越高。象王楨"农書"上所講的"水排"，不但臥輪式比較复杂灵巧，就是立輪式的也不是原始的形态。如果把它們都当作从古以来就如此，即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李先生說："到北宋的时候，水排就已經不存在了，所以苏軾在其'志林'里竟将当时四川冶鉄所使用的人排誤認是創制于后汉时候的水排"。这个說法也可商討。苏軾"志林"中明明說："后汉書有水韛，此法惟蜀中鉄冶用之，大略似盐井取水筒。"可見宋代只有四川还在用水排冶鉄，并不是北宋时水排已經不存在，也并不是他把人排誤認为水排。苏軾只是說四川的水排和盐井取水筒"大略"相似，一样的"用机械"，并不足以說明当时四川冶鉄用人排。苏軾很注意冶鉄，当他在徐州做地方官时，还曾派人找寻冶鉄需要的石炭矿，曾做"石炭行"詩記述这事，他对冶鉄不是全不了解的。王楨說："去古已远，失其制度，今特多方搜訪，列为图譜"，該是到元代使用水排的很少了，几乎"失其制度"了，但还能"多方搜訪"得到，可知也还有留存的，否則到那里去搜，到那里去訪呢？因此，王楨所搜訪得来的水排式样，应該是当时的式样，至多是唐宋以来的式样，不可能就是汉代的式样。第三，根据欧洲水排的式样来看，所有风囊都是平放的，沒有悬挂起来的，因为悬挂起来，将經不起水輪轉动时有力的推动。如果水輪有力的推动，风囊趁势搖蕩，怎能吹出强有力的风来？在鼓风机上鼓风器的装置必須是牢固地固定的，必須要很着实地的装置，否則就不可能經常不断有力的鼓风。一般說来，风囊适宜于上下推动，木风箱适宜于前后推动，因此，运用风囊的水排和运用木风箱的水排，結构上不可能完全相同。

科学的研究，要善于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需要不断的探討，也需要相互的探討。希望大家对我上述意見不吝指教。

## 我对"滇王之印"的看法

吴　朴

本刊第5期"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一文中，对于"滇王之印"金質印，从其成色、蛇紐和字体三方面，定为其本族自制的。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見，是否有当，希望批評。

1."滇王之印"的篆体和章法与一般汉印完全一致，出土的另一方銅印"胜西印"也是很标准的汉小私印，說它們字体和汉印篆字不类，实在看不出来。同时該文最后說，"在这批随葬品里，除銅鏡、銅錢和两个印外，始終沒有发現文字。……据近来調查，云南各少数民族自創文字或采用汉字，时代比較晚，滇池区域的这个民族，在二千年前沒有文字，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有了这样的結論，又說"滇王之印"汉文篆字金印，是本民族自制的，实在令人費解。

2."滇王之印"的印面边长2.4厘米，和汉朝賜給日本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質印（見書道全集27卷4頁），印面大小相同，和上海文管会所藏"晋归义氐王"金質印，印面2.2厘米見方近似，可見"滇王之印"和汉晋王朝給少数民族君王及邻国的印，体制大小还是符合的。

3.关于印紐，汉旧仪云："諸侯王黃金璽台駝紐"，"滇王之印"是蛇紐，确是有些問題，不过蛇紐也不是沒有的，在秦汉之际还是通行的一种印紐，这种印紐到东汉以后就很少見了。上海文管会所藏的"浙江都水"和"琅左盐丞"两方秦或西汉的銅印，都是蛇紐，印面2.4厘米見方，通高1.8厘米，与"滇王之印"大小正同，所以也不能肯定說因为是蛇紐，就一定是本族自制的。史記："西南夷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我認为还是以汉朝賜給的王印可能性为大。

4.关于金質成色問題，我是这样理解的，純金太軟，刻字有困难，有百分之五的銅和銀的合金，就比較硬，易于鑄刻，耐使用，"晋归义氐王"金印也不是十足純金。因此，以金質成色来确定其为当地自制，理由也难以成立。

# 战国题銘概述(上)

李 学 勤

我国旧名为“金石学”的学科，用現代术語来說，可称为“题銘学”（эпиграфика）。中国先秦的题銘，按照时代演进，应分为殷、西周至春秋、战国等三个阶段。

器物题銘的內容及形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奴隶制时期。自西周晚年以至春秋，族长制（宗法制）关系逐漸瓦解，氏族貴族的統治逐漸崩潰。适应于这一过程，在銅器题銘上可以看到下列現象：

第一，西周早期、中期，銅器都屬于居統治地位的姬、姜等氏族的貴族及其僚屬，至此开始出現了“庶姓”甚至“蛮夷”的题銘，例如曹姓的邾器、曼姓的邓器、允姓的鄀器，都表現了一些特色。

第二，春秋时代，在若干国中产生了取代公室的“僭主政治”，也就出現了大量的卿大夫和家臣的题銘。在晋国，如呂氏的郘黛鐘和新著录的三兒簋：

> 惟王三（四？）年正〔月〕初吉丁巳，□孙三兒曰：余呂以□之孙、殼□跛子口父之〔子〕，择厥吉金，用□宝簋，用□□□，□其遵孟考跛子望仲，□□毋乞（迄）。余严龔圣□□忌，余□□叙□，□□□□□望□皇母，用祈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
> 录遺 166

欒氏的欒書缶：

> 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書也，择其吉金，以作鑄缶，以祭我皇祖。[illegible]（吾）以祈眉寿。欒書之子孙万世是宝。 录遺 514

文风字体都和公室的晋定公盥等有别。在齐国，可以明显地看到媯姓陈（田）氏的势力扩展。陈氏器銘，如陈逆簠、簋和賆簋，也和公室的齐侯三器等不同。

相反的，在公室繼續維持統治的地区，如魯国或燕国，这种变化就比較不显著。魯器司徒元鼎、盂或燕器燕侯軍簋、豆等，都与西周器銘相去不远。

同时，在以楚为中心的江淮区域，包括芈姓的楚、越，嬴姓的徐，姬姓的蔡、吳和子姓的宋（都彭城），出現了狭长的特殊字体和艺术性的“鳥虫書”。西方嬴姓秦国题銘秦公鐘、簋和所謂“石鼓”的詩刻，也自有其独特的风格。

但，春秋时代以至战国初年的题銘，虽然变化繁縟，在总的方面仍然沒有脫出“銘功紀德”的窠臼；到了公元前四世紀末，才基本上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新形式所代替，这就是本文所說的战国题銘。战国题銘的种类远較前此为广泛，除青銅器外，还有陶器、璽印、貨币、簡策等等，其內容多可与同时文献互相补充印証，因而是一項重要的史料。

战国时代的器物题銘多記录該器的督造者、制造者和使用者，例如：

左軍之戟僕大夫敀之卒，公孙里雎之□，工[illegible]里瘟之戟戈。（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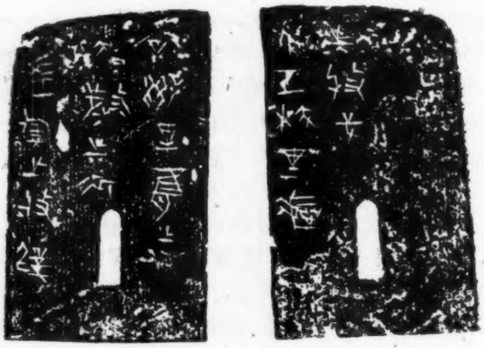


图 1 瘟戈题銘(原大)

这在形式上已經开启了汉魏器物题銘的先河。特别是关于生产者身分的紀載，对战国时代奴隶制社会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战国题銘的研究必須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考古学和器物学的成果結合起来。这是一个还有待于系統分析和开辟的新領域，本文不过是試探性的扼要介紹，希望能引起同志們对这方面的注意。

## 一 齐国题銘

首先从田齐的量器题銘談起。

1857年，山东省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銅量

器，即丘关釜、左关釜和左关鋘；1939年，济南大辛庄出土了一件灰陶的陈固区（图2），可以看出齐量的形制。齐量单位是四进的豆、区、釜、鍾，鋘的容积相当三晋两周的单位鈚，是折合用的挹取器。

图2　陈固陶区

丘关釜题銘說：“左关釜节于廩釜，左关鋘节于廩鈚”，关职司征取貿易税，廩則是政府貯藏剝削来的农产品的所在，都备有标准的量器，即所謂“王区”或“公釜”等。战国时代关、廩的璽印，現已发現很多。齐国廩所用陶量的例証有：

陈固，右廩亳釜　綴遺斋彝器考释28,19,1

陈榑三立事岁，右廩釜　衡斋金石識小录（陶印）

陈华，右莫廩□亳釜　（图3，陶印）

在丘关釜銘中有人名陈得，据陈璋壶銘是齐宣王时人。这个人名又見于下列残陶量：

平陵，陈得，丕□王釜　季木藏陶80,1

平陵，陈得立事岁，綤公　史学論丛2插图

闆門外，陈得，平陵县廩豆，酉感□里（参簠斋手拓古印集1，15，3平陵县左廩璽）　古陶瑣萃1，1

疕尙（党），陈得再，左里敀亳豆（图4）

郑阳，〔陈〕得参　鉄云藏陶69，4

图3　陈华廩釜陶印（高5.1，寬4.4厘米）

图4　陈得残陶豆拓本（高6.5厘米）

郑阳，陈得四　季木藏陶111,4（陶印）

这可以代表齐陶器以及銅器的一种题銘形式。

“立事”即“位事”或“莅事”，莅事者即器物的督造者。齐器署名次第为莅事者、工师、工，如左关釜为陈犹、左关师发，敦者陈純，春秋时器齐侯罐为国差、工师何。（陈璋壶系伐燕所获，所刻“郑〔阳〕，陈得再莅事岁，……”当为修补时补記。）

战国时代齐器的莅事者都是陈氏，如王孙陈棱、王孙陈这。莅事所在地有县、鄙、党、关、門等，他們是都邑大夫或关尹之类，例如陈窗曾任平門守：

平門守陈窗，左里敀亳□

权璽斋拓本2,21,1

莅事的“再”、“参”、“四”指任职届数，如陈窗在平門一届、异党二届、圖党二届、閭門三届。

齐器有許多为右或左敀所制，例如：

右里敀，鎜　殷周青銅器通論282(銅量)

簠斋手拓古印集1,12,16(印)

华門，陈棱参，左里敀，亳区　季木藏陶79,8

屑鄙，陈悊，左敀，犄均釜　方清霖拓本

…右敀，均亳釜　簠斋藏陶11,18,4(陶量)

“敀”与“伯”通，見說文。按战国作品管子輕重戊篇說：“令謂左右伯沐涂树之枝”，又說：“令左司馬伯公将白徒而鑄錢于庄山”，均指左右敀。“左司馬伯公”的“公”应为人名或职名，“左司馬伯”可与下列璽印参校：

左司馬敀　古印丛3,25

右司馬敀　齐魯古印粹

司馬敀璽　簠斋手拓古印集1,14,3

司馬閗敀　善斋璽印录上3,7

据管子乘馬篇，方一里为九夫之田，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一乘为四馬，一馬有甲七、蔽五，一乘有甲二十八、蔽二十，又有白徒三十人，奉車一輛，这大抵合于田齐的兵役制度。由此可知，方六里的一暴不仅要出一車四馬，还要攤派七十八人的兵役，压榨的酷重实难想象。所謂白徒，在战时是徒手的步兵，但同时也是服公共差役的丁壮，他們虽然是自由民，却与奴隶受同样的奴役剝削，这正是古代东方国家的专制主义特征。輕重戊所假設的鑄錢的白徒就是器物题銘中屬于左右敀的生产者。由于他們按照軍事編制受征召，所以由司馬管轄。

这种“敀”的制度，在战国时代不但設于中央政府，而且也設于都邑和鄙、部（五暴为部），如璽印：

瞉陵右司馬敀璽　（图5）

輤鄙右敀　周秦古璽精华122

謚部敀璽　十鐘山房印举1,5,4

斁俅左敀　尊古斋古璽集林2,1,18

母遝敀璽　　　　秦汉璽章 61（玉印）

左右敀当即分辖于左右司馬。

齐陶器多記有生产者的籍貫名氏，例如：

右敀郗鄙尙毕里季䶂　　　（图 6）

图 5　戳淩敀印
（高3.8厘米）

图 6　季䶂残陶器
（高 10. 寬 4 厘米）

| | |
|---|---|
| 右敀郗鄙蒦里□众□ | 季木藏陶 80,7 |
| 王卒左敀城阳桓里土 | 古陶瑣萃 1,6 |
| 王卒左〔敀〕城阳□里人曰得 | 季木藏陶 60,10 |
| 王卒左敀□阳北里五 | 鉄云藏陶 1,4 |
| 王卒左敀甘里攴 | 古陶瑣萃 3,6 |

可知他們都是"王卒"，但被使用于陶器生产。有題銘的齐国陶器，包括各种日用器皿，虽不象汉代陶器那样明記"某市"，但不难看出是在市上出售的商品。奴役白徒进行商品生产，乃是一种奴隶制的剝削形态，这就証明了馬克思在"資本主义生产以前諸形态"中所論述的"尽人皆是的奴隶制的东方"的著名原理。

左右敀可視为汉代左右作部的前身，不过在汉代封建社会中，左右作部只是管理公共職能的机构，其主管者已移为都司空令等专任官吏，和軍事組織的联系較不密切。汉洛阳筑城徒隶墓志砖記：

> 右部、无任、□□安完城旦□□，元兴□年□月□□物故，死（尸）在此下。
>
> 左部、无任、东郡濮阳完城旦夏侯当，延光四年九月一日物故，在此下。　陶斋藏砖拓本

夏侯当等是刑徒，即有期限的奴隶。周礼地官小司徒說：

>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所謂"无任"，就是說他不是被"任"而征召服役的，而是"編之司徒，輸之司空"的罪犯。砖銘的格式可以和前引齐陶器題銘相比照。

齐国有銘陶器是清代陈介祺第一个鉴定的。陈介祺跋陈諹陶片拓本說：

> "瓦器残片，出濰之东，甚古。……同治壬申五月六日己丑，得之于姓。"

同治壬申是 1872 年，这是关于齐国陶器題銘的最早記录。这种陶器在临淄集中出土，該地当即制陶工場的遺址。由所記生产者籍貫，可知他們有些来自边远都邑，如城阳是故莒国地，孟棠应即孟尝，但大多数还是来自临淄周围鄙里，如：

門左南郭鄙：卒□新匋里

楚郭鄙：直里、诰里、凡里、蒦里、关里

直丘鄙

丘齐鄙：杉彫里、㷣里、又㷣里、平里、新里、东里

紹鄙：上𢻃里、䜭里、东匋里、中匋里、去匋里、稷阳南里（等等）、甫阳□里

黍髶鄙：䜭里

郚鄙：䜭里

貣鄙：匋里

桀鄙：新里

鄙相当汉制的乡，而里名頗多重复。直丘鄙即魯連子所記"齐之辯士田巴辯于徂丘，議于稷下"的徂丘。

从少数記氏的例子看，同里者大率同氏，如丘齐鄙㷣里都是王氏（王通、王陛、王宰、王鄙、王頜等），新里都是公孙氏；还有原为貴族的氏，如陈何、王間鲐、公孙犸、司馬敔旨、国□、东方恢、邾（邹）去心等。

制陶工人称为"陶尙"，如：

| | |
|---|---|
| 高閭豆里人陶尙曰日□ | 簠斋藏陶4,21,2 |
| 高閭里人陶尙曰洎 | 古陶瑣萃1,7 |
| 酷里人陶尙部 | 鉄云藏陶82,4 |
| 稷阳南里陶尙期 | 季木藏陶57,1 |
| 去稷阳里陶尙穋 | 鉄云藏陶25,4 |
| 去稷阳陶尙捷 | 簠斋藏陶10,13,2 |

主管制陶手工业的官吏称为"陶正"，有一鈕璽印文为"齐陶正𩑇"（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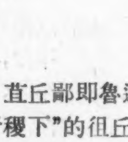


图 7　齐陶正印
（原大）

齐陶器題銘絕大多数是用璽印印成的，而少数銅器（如右里敀鎜）也采取印文的形式。有的璽印不但有文字，而且有花紋部分，它其实也就是范（图 8）。这种璽印一般

不称为璽。

齐国称璽的官私印有特殊风格，很容易辨别。前人印譜有些专收山东省所出璽印，如高庆齡齐鲁古印攈，郭申堂續齐鲁古印攈，孙文楷齐鲁古印捃，刘仲山攟华斋古印譜等。續齐鲁古印攈所录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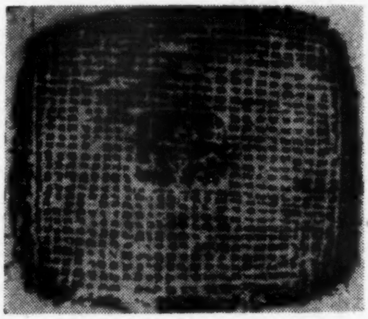


图8　丘齐东里陶范（长7.4寬8.5厘米）

一鈕大印“易郿邑圣逯盟之璽”（图9），可視为齐官印的典型。“郿”即“党”，陶器所鈐大印“平郿陞𢦏左宛□男璽”（图10）可資互証。同記“逯盟”的

图9　阳党官印
（寬4.5长5.2厘米）

图10　平党残陶器
（长7.寬6.5厘米）

有“沼鄙逯盟金璽”（图11）和三鈕“逯盟之璽”。

阳党大印和三鈕“逯盟之璽”印面上边都有一个突起，而攟华斋古印譜的“上大夫之保璽”也是如此。此外，“聋曲氏之璽”之一，四边都有突起，“齐立邦璽”上下两边各有一突起（图12）。“立邦”与齐刀币背文“辟邦”、“安邦”同义。

图11　沼鄙官印
（长3.寬3.7厘米）

陶斋藏印所录“右司徒逯昏途貨之璽”，“徒”字作“迖”，同于丘关釜等齐器。同書“日庚都萃車馬”空鈕大銅印，据吉金零拾拓本跋文，也是山东出土的。类似的大印，如易大厂所藏“㞕（萊）䣙鍚□𨌔（造）車之璽”（图13）、德九存陶3,1陶片所鈐“左討都車司馬之璽”，从形制考察，都是齐印。

图12　齐立邦璽
（长2.7寬2.2厘米）

图13　萊造車印
（寬4.2厘米）

## 二　燕国题銘

燕国璽印的印面多呈条形，有細长的柄，自名为鍴，如清光緒初年易县西关出土的“单佑都□王氏鍴”（图14）。下列三鈕是特别値得注意的：

易軍主車　　　簠斋手拓古印集3,5
易江里丞　　　古印丛3,12
易下都□王氏〔鍴〕（图15）

图14　燕单佑都官印
（銘文长7.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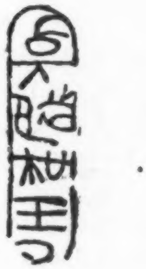


图15　燕下都官印
（长4.3厘米）

由第一鈕可知“易”是地名，由第二鈕知它大于里，由第三鈕知它大于都。“易”应即燕国，燕都于临易，别称为易，和魏称梁、赵称邯鄲、韓称郑同例。燕“明刀”币背文有：

| | |
|---|---|
| 易邑，一 | 古泉汇，亨8,10,1 |
| 左易，下 | 古錢大辞典1103 |
| 右易，四 | 东亚錢志5,53,2 |
| 上易 | 綠庄严館古泉拓 |
| 外易，一 | 古錢大辞典1075 |

“易邑”和井邑（古今錢略4,40,4）、安邑(同上4,48,1）一样，都是地名，应即临易；所以“易軍”即燕軍，“易下都”即燕下都。明刀背文的“左”“右”可能就是“左易”“右易”等的簡略，均为燕国的地方区划。

燕国陶器題銘都是用壐印印出的，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作“陶攻（工）某”，印面呈条形。1930年在易县老姥台掘得的十二件有銘陶豆都屬于此式。

第二种作“左宮某”或“右宮某”，如：

左宮寇　　　　德九存陶1,5
左宮巨隼　　　　权壐斋拓本1,7,1
右宮秉　　　　拓本（易县出土）
右宮馬尨　　　　德九存陶2,19

制作者是王宮所隶的陶工，印面呈正方形。

第三种系用几鈕条形印面的阳文印联鈐，如：

（1）十七年八月，右陶君（尹），倕䲃、敀賀　　季木藏陶61,7

（2）廿一年八月，右陶尹，倕疾、敀賀、右陶攻湯　　艺术丛編20第三器

（3）右陶尹鑵□□□，倕朝、敀賀、右陶攻湯　　望文生誼斋陶拓

（4）廿二年正月，左陶尹，左陶倕湯、敀国、左陶攻敌　艺术丛編21完器

（5）左陶尹鑵乇男鍴，左陶倕湯、敀国、左陶攻敌　　艺术丛編20第一器

（6）〔左〕陶尹鑵□□鍴，〔左〕陶倕湯、敀国、〔左〕陶攻賬　望文生誼斋陶拓

（7）廿三年三月，左陶〔尹〕，左陶倕湯、敀国　艺林旬刊17（易县郎井村采集）

（8）□□年四月，右陶尹，倕敌、敀賀、右陶攻徒　前北平研究院院务彙报1,1（易县炼台村采集）

由这八例可以考見左右陶尹所屬倕、敀、工三級的升迁。第八例“四”字作“四”，与早期明刀的重画的“四”（古今錢略4,31,3）不同，所以上引題銘的年号是燕王喜的在位年号。

燕下都遺址出土的青銅兵器有些附記工尹和工：

燕王晉作行議鍨，右攻君青其，攻豎
　　　　三代吉金文存19,52,3
燕王晉作行議鍨，右攻君□，攻众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10,53,2

工尹也分左右。“尹”字的这一写法还見于易县出土的不知名銅器（图16，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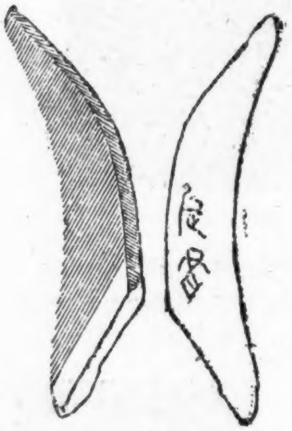


图16　易县出土銅器(毓廉旧藏)（长18.寬3.3厘米)

“行議”是使用該兵器的人員职名，此外还有王萃、力萃、黄萃、宂萃、巨攻、巨旃、百执御、亲者等，即燕王的侍卫徒御。战国时代燕兵器名称自成一套：胡有刺的戈称鍨（戣），无刺的称鋸，小矛称鍦，大矛称刘，剑形矛称利，剑称鍺鍮或鈦。

燕王是兵器的名义上的督造者，共有下列五王：

燕王（侯）职：戣四、鋸十、矛六、鍺剑一
燕王晉：戣二、鋸一、矛二、刘一
燕侯脮：戣二
燕王戎人：鋸一、矛二
燕王喜：鋸二、矛二、利一、鈦五

职是昭王。記有他的名字的兵器曾在山东益都、临朐出土，是昭王伐齐时遺留的。这五王应該就是在下都建都的五个燕王。晉的兵器和昭王的极似，他最可能是惠王。戎人沒有戣，近于燕王喜，他可能是孝王，而脮可能是武成王。

---

## ·更　　正·

1959年第6期“談談文姬归汉图”32頁左栏第7行“被王充下獄”，“应为被王允下獄”。同栏第15行“王桀七哀詩”，应为“王粲七哀詩。“关于明摹胡笳十八拍图的一些問題”36頁右栏第4行“迎……天子旗鼓置太子帐前”应为“迎……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同栏第6行“与实縱火焚行宮”应为“与德实縱火焚行宮”。又同期27頁“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一文，左栏21行“24頁图2的纏枝蓮天字罐”下应加：“（盖墻、罐肩蓮花朵及足上皆为青花，盖的上下边和足的边为黄色，盖顶是八个青綫蓮瓣組成的圓体花，上塡紅色，纏枝的梗叶是青花輪廓內塡綠彩，器底部中心有‘天’字款）。

# 河南南召二郎崗新石器时代遺址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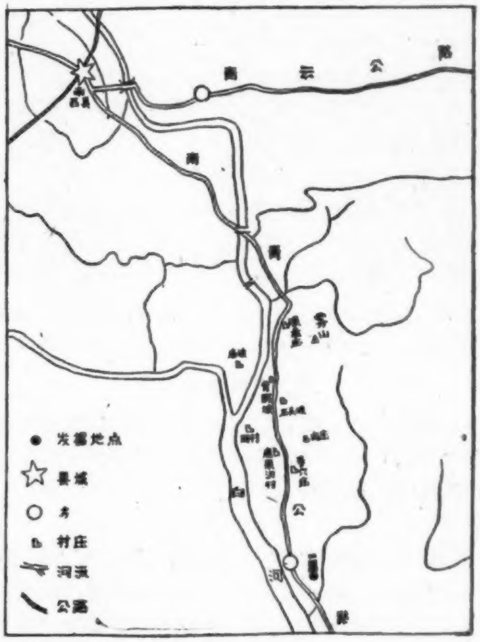
为配合鴨河口水庫工程，經我队派人調查，发現南召县二郎崗新石器时代遺址，并确定由我們“刘胡兰”队进行学习发掘。“刘胡兰”队有八位剛从中学毕业的姑娘，两位輔导員，发掘工作从1958年11月—12月，由于各級領导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我們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給的第一次发掘学习任务。計挖探方（包括探沟）三个，面积近二百平方米，发掘时只找了两个女工，主要都是自己挖土、运土，并且也采用了边发掘边整理的工作方法。

这篇报告是我們的习作，可能有不少錯誤和缺点，請同志們多加批評指正。

## 一 遺址的堆积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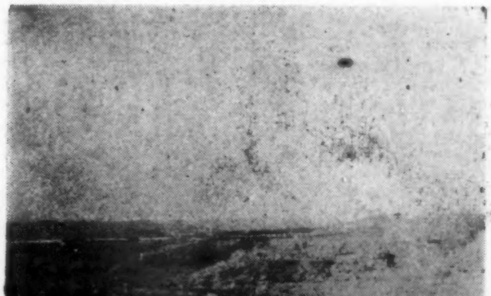
二郎崗位于南召县南約三十里，紫崗村东南一里处，东、西、南三面被水环繞，崗下有几座小村落，四面环山，风景頗为幽美（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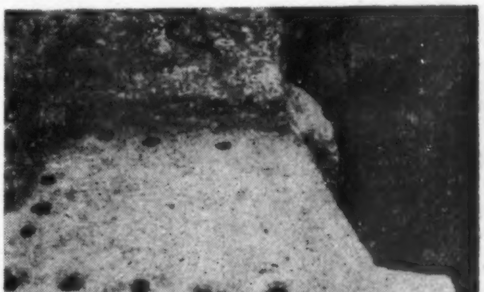
崗的中部較高，四周逐漸低下成坡状，南北长約三百米，东西寬約二百米。中部地面上分布着許多大块的紅燒土，西部主要是黑色磨光陶片，东部多紅衣彩陶。遺址北部灰层的堆积較其他部分为厚，紅燒土及建筑遺迹很少看到，遺址南部的灰层堆积較薄，紅燒土和建筑遺迹很多，如在探方三(10×10)內，共发現了房基五座，分布在探方的西南角、东南角、南部、北部及中部，同时在东北部还发現窖穴两个，分布在上述房基中間。探方中部有排葬坑，坑內葬人骨架十三具，有成年人和幼童，可見此处不仅是居住区，也是埋葬区。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說明这个遺址的南部，是当时居住区域，北部是倒垃圾的地方。



1. 二郎崗发掘位置图

遺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以探方的北壁为例，最上面是农耕土，厚0.10米，下面是遺址堆积第一层（紅燒土层），厚約0.80米左右，由


2. 二郎崗全景


3. 三号房基

紅烧土和紅胶泥土混合而成，組織緊密，呈紅褐色。在这一层里出土的陶器残片，以灰陶片較多，器形有陶鼎、陶瓮、小陶罐、磨光陶豆、带耳陶瓮及陶鉢等。紅陶片次之，有陶鉢、小口瓮陶盆、鏤孔陶豆、夹砂鉢及陶鼎等。此外还有石犁、石斧、石鏃、弹丸、紡輪等遺物。

第二层为灰土层，厚約0.75米左右，呈灰褐和黄灰色，較松軟。这一层出土遺物有陶鼎、陶鉢、陶罐、陶盆、陶缸、陶豆、陶甑、陶瓮、陶盘等残片。此外还有石斧、石鏃、骨簇、骨錐、骨管、弹丸、石拍子、紡輪、石杵等遺物。

从上下两层出土的遺物来看，在器形和制作上沒有大的区别，并且两层中所出的陶片有些还可以对粘起来，說明上、下文化层堆积是一个时期的。在这个遺址上，仅发現了几座战国墓，沒有发現較晚的灰层。

## 二　建筑遺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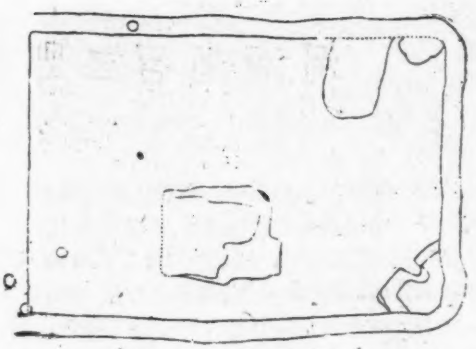
共发現房基八座、窖穴两个。根据調查和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建筑遺迹多半分布在向阳的地方，即本崗的南部和东南部。

（一）房基。

八座房基編号为$G_1$—$G_8$。建筑方法可分两类：一类是把墻垛好后，上面再糊一层草拌泥，而后經火烧。另一类是不經火烧。房基位于遺址第二层上（即灰土层），門多向南，也有向北的。个别房基的四壁和地面尚保存完整。房基形状分三类：

1. 长方形房基：

以探方三东南角的$G_5$为例：东西长4.6、南北寬2.9米。各壁与地面都塗一层草拌泥，并經火烧。地面中部較高四周稍低，厚3厘米。在地面中部偏南



4. L2 G5 平面图

有近方形的火坑一个，口径100、深16厘米。室內东南角还发現一个近似三角形的灶。灶壁高3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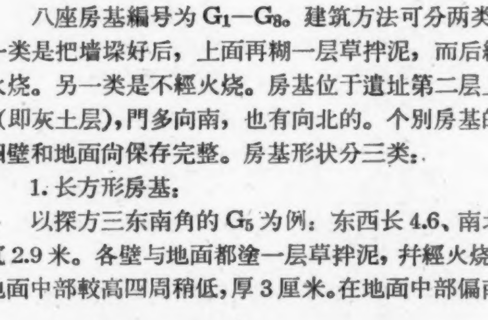
四壁中保存較好的是北壁和东壁，不过也不完整，現存高90—60厘米。根据西壁北部残留痕迹推測，門可能向西。在室外西南角发現柱窝两个，其中較大的一个口径13、較小的口径12厘米。北壁上也发現柱窝一个，口径7、深13厘米（图4）。

房基內出土遺物有石斧、陶瓮、紅色砂質陶罐及很多紅陶残片。屬于同类的建筑房基还有$G_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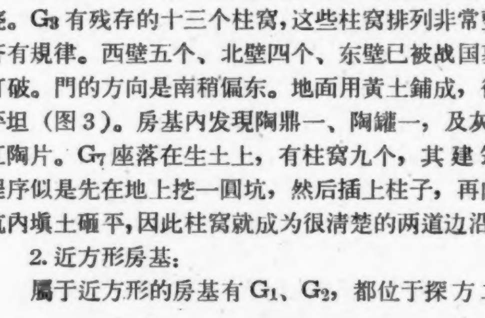
此外如$G_3$、$G_6$、$G_7$也是长方形的，但未經火烧。$G_3$有残存的十三个柱窝，这些柱窝排列非常整齐有規律。西壁五个、北壁四个、东壁已被战国墓打破。門的方向是南稍偏东。地面用黄土鋪成，很平坦（图3）。房基內发現陶鼎一、陶罐一，及灰、紅陶片。$G_7$座落在生土上，有柱窝九个，其建筑程序似是先在地上挖一圓坑，然后插上柱子，再向坑內塡土砸平，因此柱窝就成为很清楚的两道边沿。

2. 近方形房基：

屬于近方形的房基有$G_1$、$G_2$，都位于探方二



5. 一号房基



6. 二号灰坑

7. 探方三排葬坑

內。以$G_1$为例，該房基有十七个柱窝，室內发现了烧灶坑，坑上还遺留陶鼎两件。在房基的門前另有一柱窝。柱窝排列也很整齐，門南向（图5）。$G_2$与$G_1$紧相連接，形制結构也大致相同。

3. 不規則圓形房基：

即$G_4$，位于探方三中部偏东南的灰层上，有十三个柱窝。房基座北向南，門向东南傾斜。門外側也有一个柱窝，推测可能与$G_1$門前那个柱窝一样，是用来支搭小棚的。在清理过程中沒有发現地面，从发現柱窝的地方向上向下都是灰土，可知原来的地面已被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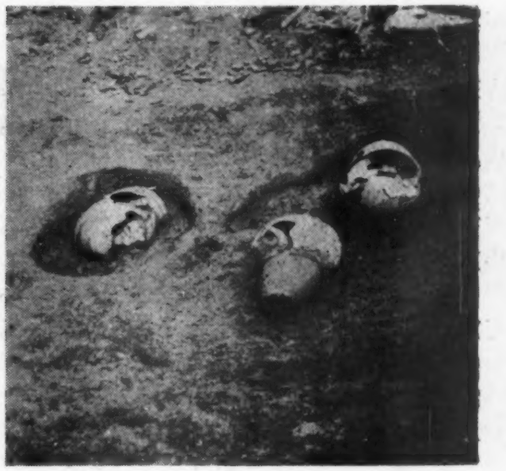
房基內有很多蚌壳，并在灰土里发現幼童瓦罐葬一座，説明当时幼童即埋在屋內下边或房子周围。

（二）窖穴：

在探方三的东北部，发現两个貯放东西的窖穴，穴口外露在生土面上，編号为$H_1$、$H_2$。

$H_1$口小腹大圜底，呈袋状。深1.27米，直径1.96米，坑內土色黑灰，內含少量紅烧土，出有陶鼎、瓮、罐、盆等残片及少量兽骨。

$H_2$是一个很規則的圆形袋状灰坑，比$H_1$略小，口径1.15、深0.60米，土色黄灰，有大量紅烧土块和石头。出土遺物极少，仅骨头一块，彩陶数片和



8. 墓八一十

极少的灰陶片、黑色磨光陶片等（图6）。

## 三 墓葬

（一）排葬

在探方三紅烧土层下面，发现了人骨架十三具。这些骨架周围无边沿也无葬具，由探方西北至东南排列的有七具，探方西南部一具，与上述七具位于同一平面上。在此层下边与$G_4$同一平面上，又由西向东排列了五具，由此可知，这些骨架并非一次葬入，但都是头北脚南仰身伸直葬（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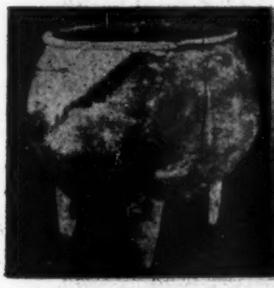
在十三具骨架中，有两具是女的，两具是幼童其余皆为成年男子。探方三內的五座房基，一在排葬骨架的中部偏西，四在南部，我們推测这些骨架与房基是有密切关系的。

（二）瓦罐葬

共发現二十二座，全在紅烧土层下边，灰土层中。一般距地表1米左右。探方三中发現了十九座，多系两个平底罐扣合而成。也有用鼎、盆及尖底罐或器盖扣合者。大致可分以下七类：

1. 两罐扣合而成。如探方三的墓十六。长94、宽46厘米。

2. 一尖底罐和一盆扣合而成。如探三的墓二十



9. 墓24陶鼎

10. 墓24瓦罐

11. 探方三石拍子

12. 探方三灰陶罐

三。全长70、寬40厘米。

3. 一罐与一器盖扣合而成。如探方三內墓二十（图20）。

4. 一平底罐与一圜底罐扣合而成。全长53、寬34厘米（图21、22）。

5. 一瓮与一罐扣合而成。如探方三墓墓九。全长58、寬34厘米（图8中）。

6. 一碗与一盆扣合而成。如探方三墓十二。

7. 一鼎与一罐扣合而成。如探方三的二十四。全长68、寬38厘米（图9、10）。

这些瓦罐葬大部分平放着，多近于南北方向，仅探方三的墓七和十二为竖置。幼童骨架多半是头北脚南，仰身伸肢。

## 四 生产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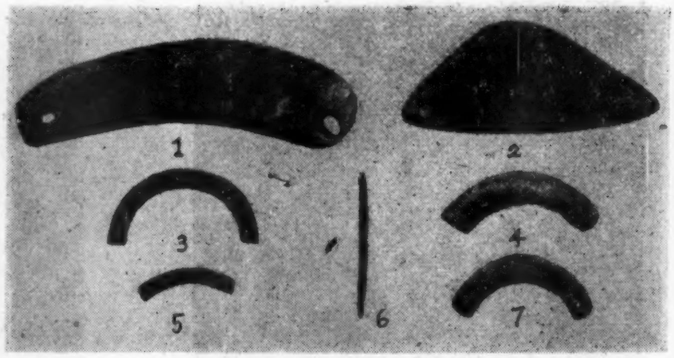
1. 石犁、石斧、蚌鐮　石犁仅有一件完整的，前端两側刃部有显著的使用痕迹，长18、寬为12、厚1.2厘米。石斧和蚌鐮可能也是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图26）。

14 探方三灰陶盘

2. 拍子、紡輪　有陶石两种，說明当时已經有了紡織和窑业。虽然这次沒有发现烧陶窑，但在調查中在崗的南部发现过残破的窑壁（图11）。

3. 箭头、弹丸（?）。

出土很多，箭头有石和骨两种，弹丸有石和陶两种（图2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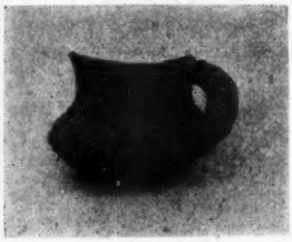
13. 1—2 玉飾品 3. 陶环 4. 玉环 5. 石环 6. 骨簪 7. 玉环

4. 石錛、石凿。

## 五 生活用具

遺址中出土陶片多是灰色沙質和紅色泥質。下层有少量的黑色磨光陶片，探方二第一层还发現蛋壳陶一件。

陶片多为素面，或素面磨光，也有带划紋、旋紋、鏤孔、附加堆紋、繩紋等紋飾的，繩紋数量很少，还有許多彩繪陶片，制法有：手制，輪制，泥条制，手輪合制四种。



15 探方三单耳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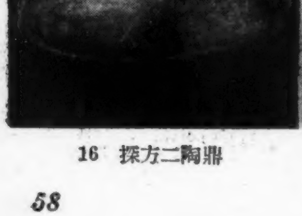
1. 鼎　較完整的共十七件，一类为灰色沙質鼎，另一类为紅色沙質鼎。如探方二出土的一件灰色沙質鼎，通高15厘米，斂口鼓腹，腹部有弦紋，腹下内收成小平底（图16）。陶鼎残片也很多，底部都有黑灰痕迹。

2. 甑　仅出有底部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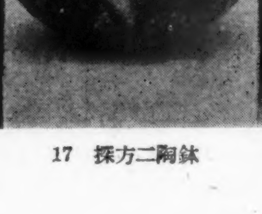
3. 鉢　有紅色泥質、灰色泥質和彩繪三种。最大的一件口径26、高12厘米（图17）。

4. 豆　仅一件，紅色泥質，圈足上有方形、圓形鏤孔（图18）。

5. 盘　出土两件，一件为灰色泥質，直径48、高



16 探方二陶鼎



17 探方二陶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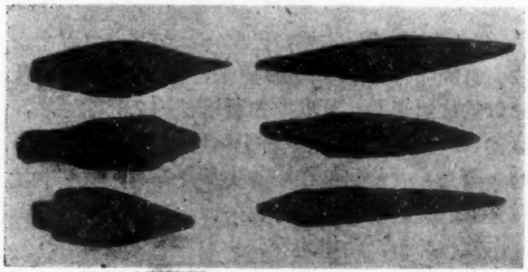
18 探方二陶豆

19 探方二彩陶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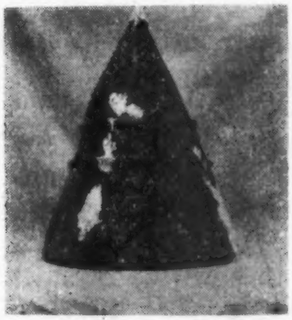
20. 墓20瓦罐

21. 墓15平底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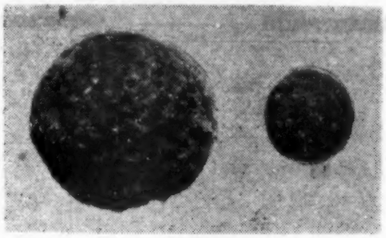
22. 墓15圜底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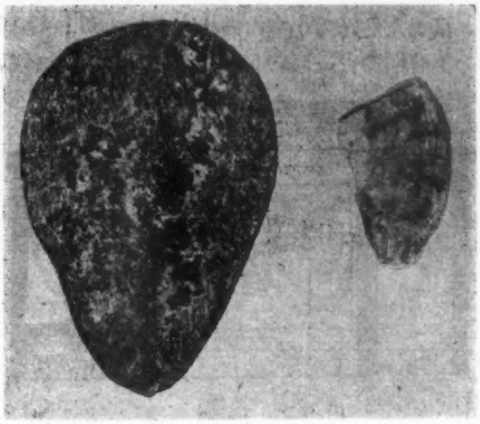
23. 箭 头



24. 探方二尖底器



25. 探方三陶弹丸



26. 探方三石犁 蚌鐮

8厘米。周围有圓孔二十一个，可能是穿上繩子吊起来使用的(图14)。另一件为紅色泥質，非常精致。

6. 盆 彩繪和紅色素面两种（图19）。

7. 碗 仅一件，不完整。

8. 罐 共出土八件，一件为紅色沙質，斂口，小平底，腹部有附加堆紋。三件单耳罐，鼓腹圜底，其中一件带鋬（图15)。其余皆为灰色沙質，斂口(图12)。

9. 瓮 仅一件較完整，其余为残片，多为紅色小口泥質，有些飾有划紋和白衣彩繪。

10. 尖底器 一件，紅色沙質，飾划紋及附加堆紋。(图24)

## 六 其他

1. 装飾品 有玉飾、骨簪、石环、陶环等(图13)。

2. 兽骨 能辨認出来的有牛、羊、猪、鹿、龟等残骨。此外还发現很多蚌壳。

从这一遺址的发掘状况来看，当时农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过着定居生活，工艺制作也达到一定水平。居住址与葬地不分。基本上反映了无剝削、无阶級的原始社会面貌。

"刘胡兰"发掘小队发掘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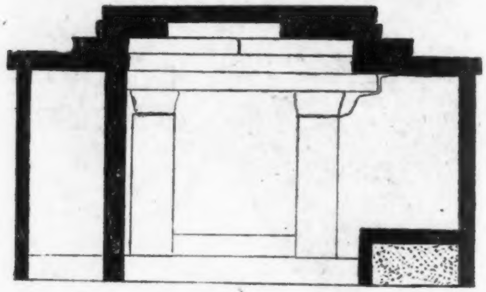
# 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簡报

李 庆 发

1957年9月間，辽阳上王家村农业社在田园中掘菜窖时，发現壁画墓一座，墓在辽阳市北郊約十里，南距棒台子約一里，东南隔长大鉄路距三道壕約八里。1958年5月，辽宁省博物館遵照省文化局指示进行了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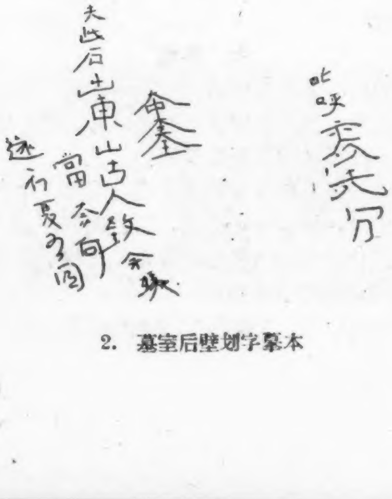
## 一 墓室結构

墓室全是用淡青色的南芬頁岩石板支筑，平面"丁"字形，門东向，偏南16度左右。墓室东西进深5米，南北寬4米，最高2.5米，分前廊、左右两小室和两个棺室（图3）。墓用石灰鈎縫，石板平滑，易于繪画。墓門用方石板封堵，門內两側立支二根方柱石，上撑拱石、楣梁等，下垫方形础石，二柱間有門檻，入内是长2.36、寬2米的横廊。横廊左右即为小室，右小室，长2.65、寬0.95米，下有明器台，高約52厘米；左小室，长2.4、寬約0.60米，中間支立一柱石，上撑墓頂。廊后接左右并列的棺室，中隔一壁上托拱石，横梁，有窗式过門，使两棺室相通。墓頂大部分用石板平盖，但前廊的頂部則是用四行石板，互相抹角叠压，成平頂方形天井，这种結构，在辽阳还是首次发現。



1. 墓室横剖面图

在墓室的后壁上，刻划有文字（图2），可能是石工在筑墓前随意在石板上刻划的。由上面文字可知石材大約是出在辽阳东山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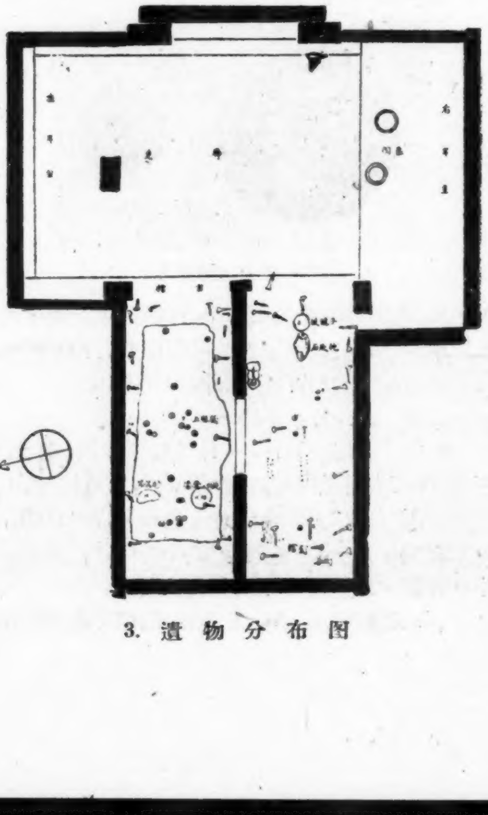


2. 墓室后壁划字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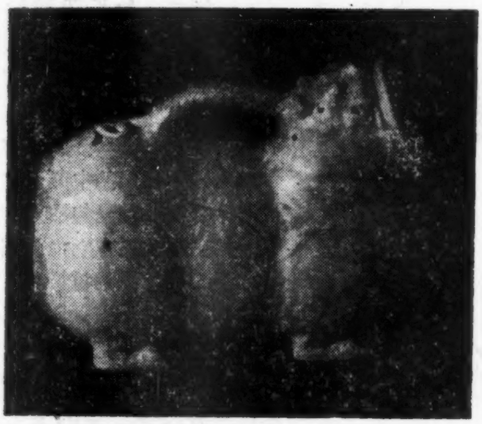
## 二 葬具和遺物

两室內各置一木棺，已腐朽，仅存棺釘五十余枚。釘圓帽方身，全长19厘米，帽径3.6厘米。从棺釘的位置来看，可以推知两棺长約2.3米左右，寬約60—70厘米。从棺釘上粘附的木痕来看，棺厚約8厘米。人骨架仅存少許头骨及骨屑，从石灰枕和头骨的位置来看，当为头东脚西，仰面伸直葬式，右棺为男，左棺为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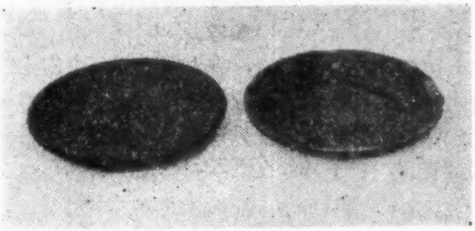
殉葬品很少，男棺出土鉄鏡一面，扁平鈕，直



3. 遺物分布图



4. 青 瓷 虎 子



5. 陶 盘

径14.5厘米，以絹包裹；在右臂旁出一青瓷虎子，虎头，把手后附蛇尾，腰側有翼，全长25、通高19厘米（图4）。女棺也出鉄鏡一面，置于圆形朱漆奩盒內，直径約20厘米，盒已残碎。在右小室明器台上出土灰陶盘二件（图5）輪制，口径22厘米，一盘底划一"徐"字（图6）。貨币分出于两棺中，共七十枚，有五銖、剪輪五銖、貨泉三种（图7），大都鑄造粗劣，厚薄不一，字体不清。

## 三 壁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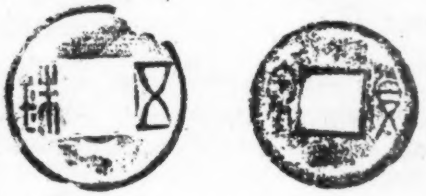
在棺室前柱石及左右两小室的壁上，有朱、墨、黄、白等色繪的壁画，顏色以朱为主，輪廓用墨鈎勒，构图簡单，綫条粗豪，不同于汉魏风格。在右小室正壁上繪主人宴飲图，堂上朱幕高悬，下垂朱帷四結，男主人端坐在方榻上，头戴冠蓄鬚，紅唇，右手持麈尾，着服模糊不清，面前置紅方案，背后有朱色屏障。榻右侍立一人，黑幘长袍束腰，捧笏面向主人，头部墨題"書佐"字样，标明侍者的身份。屏后侍立三人，均黑幘长袍束腰，捧笏面向主人。榻左一侍人似向主人进食，人已模糊不清，仅見手里举的耳杯等物（图8）。左小室正壁上繪車騎出行图，前导騎八人分列路两側，騎吏均黑幘长袍，拱手捧笏，鞍勒俱全。后有黃牛黑輪車一輛，車廂內坐一人，黑冠，作拱手状，当为主人。御者黑幘短袍，持繮繩步行（图9）。小室右壁上呈現朱黑粗綫，可能是房宅，已难辨認。棺室壁上有朱笔鈎勒的框綫，可能原繪有壁画，由于滲水冲刷，顏色多已褪落。棺前柱石上則繪有流云图紋。

在已发現的东汉到魏晋十余座辽阳壁画墓中，我們認为当以此墓为最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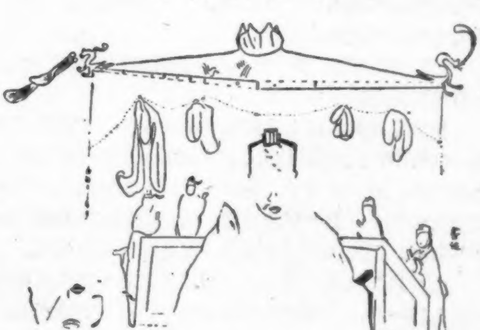
辽阳壁画墓，从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以前共发現过十余座，其中魏晋时期的壁画墓，右小室多长于左小室，画面色彩簡单，墨綫粗豪，死者头下常有石灰枕，殉葬品很少。此墓除具有这些特点外，还有抹角叠压的平頂方形天井，同时壁画的內容及画法都与朝鮮安岳东晋冬寿壁画墓壁画相同（見1959年"考古"第1期"关于冬寿墓的发現及研究"一文及插图），而从画上題字、陶盘上"徐"字已近于楷書、出土物如青瓷虎子等来看都可以說明墓的年代不能早于西晋，也不能晚于东晋。

由于这座墓的发現，可以有助于解决下列几个問題：第一，此墓的发現加上1955年发掘的辽阳三道壕有"太康二年八月"瓦熖的小石墓，我們可以进一步推断，东北博物館文物工作队1955年清理三道壕窑业二厂第一

6. 陶盘底部文字拓本



7. 出 土 錢 币



8. 右小室壁画 墓主人宴飲图

9. 左小室車騎出行图

号、二号壁画墓应为晋墓，决不能早于魏。

窑业二厂第二号墓的墓室結构与本墓几乎相同。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划分壁画年代与进行晋代历史文物的研究，而且为研究我国魏晋时期的繪画史提供了資料。

第二，如果說朝鮮安岳发现的东晋多寿墓，处于汉代壁画墓和高句丽壁画石墓的中間的話，那么，此墓也可以列入汉魏壁画墓和东晋多寿壁画墓的中間。在直接探討汉墓对高句丽墓的影响的渊源关系方面，此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材料。

第三，沂南画象石墓的时代，有的說是汉代，有的說西晋，至今一直无定論。这个晋代壁画墓的发现，或可作为沂南墓断代上的参考。

第四，虎子的用途，有人說六朝墓中出土的青瓷虎子是酒器、水器。我們的看法，从虎子本身的形状，加上它单独出在男性墓主人的身旁等情况，我們肯定，它不是什么酒器，而是溺器。

---

## 对"太平天国起义錢的发现和經过"一文的辨正

余仲衡

1957年12期文物参考資料載有陈达农"太平天国起义錢的发现和經过"一文并附拓片一紙。按此錢原名风云际会錢，系压胜品，并非太平天国起义錢（原錢际字泐去或是漏鑄）。

此錢在清乾隆以前即已有了，商务印書館出版丛書集成清乾隆五年撰人不詳所著錢币考一書，第七十七頁压胜錢类内有如下記載：

"风云际会錢：径一寸一分，圆孔起花，面文龙虎，上有风云际会四小字，背刻十二生肖"。

我曾見过风云际会錢实物和拓片多种，其錢質有銅有錫，其錢孔有方有圓，其面文有风云际会四字者或无风云际会四字者，另一面有十二生肖文者或有太平通宝四字者，錢型大小不一，龙虎形状各别，而各錢譜定名不同，分类也不尽同。但此錢有一个同点，就是一面有龙虎文。

以古泉汇为例，該書貞五集压胜正品类第六頁拓有风云际会錢一品，一面有太平通宝四字，一面有龙虎文，此錢虽未鑄有风云际会四字，但据古来云从龙风从虎之說，只要有龙虎文同在一处，即含有风云际会之意，不止錢币如此。

同書貞九集压胜生肖类第七頁拓有风云际会錢另一式样者一品，該錢一面有十二生肖，一面有龙虎文，无风云际会四字，而有日本国三小字。

同时太平二字系利市語，不一定专指年号，古泉汇貞一集无考正品类，拓有太平通宝七品，太平圣宝一品，太平丰宝一品，同集第七頁并援引陈莱孝解释太平二字意义为：

"前代紀元用太平字者凡九（作者按自汉迄清太平紀元实有十二个之多），此只取太平意耳，无庸以年号为疑也"。

历史上紀元以太平为年号者既很多，则太平二字并不能作为太平天国的专有称号，况且太平天国四字即使簡称也只能簡称天国，不能簡称太平。1957年12期文物参考資料岑子潜、岑立虎所辑太平天国錢文，有称太平天国者，有簡称天国者，而无簡称太平者，可以对証。

至于太平天国开爐錢，列有太平通宝四字，此太平二字，亦系利市語，并不是指年号而言。

总之太平天国起义时，即使鑄有信号錢，也不会仿旧有压胜錢式样，这是毫无可疑的。

簡又文輕信当时以鎭压革命起家的柴德元信口开河，率尔記載，是不对的，罗尔綱先生已有辨伪三点，极有道理，可惜未說明此錢的来源，所以陈达农又有此誤。

# 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鎮金墓

李逸友

1958年7月，內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在內蒙古自治区昭烏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鎮北山坡，清理了小型古墓三座，現将所得情况簡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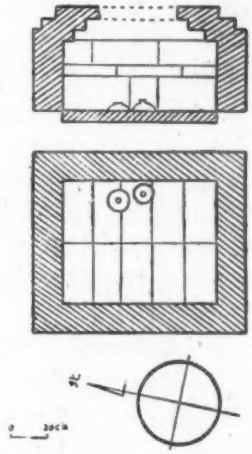
## 第一号墓

巴林左旗林东鎮南面为辽代上京临潢府故城，鎮西北山坡有辽代残塔一座。第一号墓位于辽塔东北約200米的山坡，由該旗公安局工作人員在此义务劳动时发現，在挖树坑时正好打破了墓頂，于是进入墓室內将文物取出。

墓室全用长31、寬15.5、厚5.5厘米的素面砖砌成，为单室八面形，內长1.9米，寬1.88米，八面的寬度不等，在60—80厘米之間。墙壁在1.3米高处开始起券，呈圓形頂，室內全高約1.8米。八个轉角用两块砖砌成半圓形的柱子，半径約12厘米，自80厘米高处开始砌出斗栱，全是一斗三升。墓門在南，方向为北偏东20度，墓門全高2米，券門高1.2米，寬55厘米，墓口用一块厚約10厘米的大石板封閉。(图2)墓門两側紧靠壙壁生土，券門上砌有斗栱三座，也是一斗三升，两側斗栱紧靠壙壁只砌了半座，斗栱以上砌出椽檐两层，各露出椽头9个。墓內外墙壁均涂一层白灰，厚約2—4毫米，墓內八面墙壁及門外两側，都用蓝色拘出方框一圈，斗栱均用紅色拘出輪廓，八柱全塗成紅色，墓頂在发券处繪有紅色粗綫一圈，墓外券門两側均用紅色繪出門楣，檐椽全塗为紅色。此墓发現后未封口保存，以致在夏季山洪灌入墓內，将墓上的白灰及彩繪淤毁，清理时只見有部分完整的地方。

2 昭盟林东鎮第一号墓图

墓內北部淤土內发現有火葬骨灰。当古墓最初发現时，群众在墓內取出了許多小木板，后經旗文教局发覚，拾回了一部分，是一座小木棺，系盛火葬骨灰用的。这座木棺的材料，惜丢失太多，难于复原，其形制略同于第二号墓的木棺，全长43厘米，寬24厘米，棺木上有墨書文字两行，隐約可辨出“靈櫬記吉”“進義校”等七字，其上下皆闕文，意义不明。



1 第二号墓图

墓內共出土有殉葬品八件，大都在木棺的南边，只有白瓷鉢在墓門附近。

1. 印花陶瓶一件，仿古銅器制作，印有精美雷紋、云紋及夔紋等，并仿銅器鑄造痕迹印出了合縫，外表塗有一层綠粉，全高25.5厘米。(封三图1)

2. 印花陶鼎一件，制作也如陶瓶，全仿古銅器形制，全高9厘米(封三图2)。

3. 白瓷大碗一件，瓷胎薄，火候高，浅圈足，乳白色釉，口沿部分无釉，可見是在窑內复烧成的仿定窑产品，口径18厘米。

4. 白瓷碟二件，質地如同大碗，碟內印有花草紋，有极浅的圈足，口径12.5厘米(图3①)。

5. 白瓷杯一件，質地也同大碗，杯內印有花草紋，口径9厘米，小圈足(图3②)。

6. 白瓷鉢一件，粗胎，火候略低，牙白色釉，圈足部分无釉，为当地烧造的产品，高7.8厘米。

7. 白瓷碟一件，也是粗胎，牙白色釉，小圈足部分无釉，口径 14.7 厘米。

### 第二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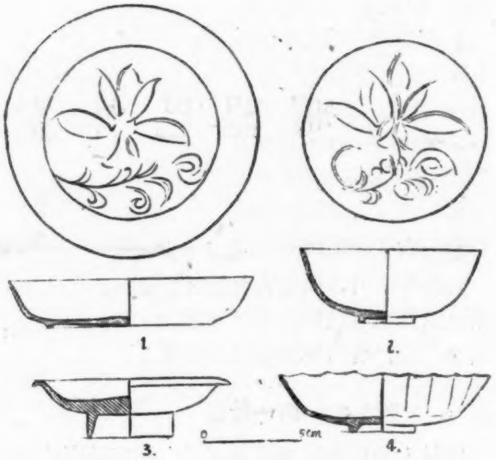
在第一号墓的上边，相距約 50 米，春季平整土地时将墓頂打破，取出了一些木棺残片，清理时墓室已露在地面。

墓室用长 36、寬 18、厚 5.5 厘米直紋砖砌成。如长匣状，无門，墓向北偏东十度。墓室底用十块砖鋪成，分做两排，长 86 厘米，寬 68 厘米，再在四边砌墙，至 40 厘米高时，平砌墓砖，每层逐漸向內收縮各約 10 厘米，現尚有三层，頂部砌法情況不明。(图 1)清理时墓內全为淤土积滿，其中夹有許多木片，經修整后，得小木棺一具，为柏木板用竹釘釘成。棺长 44、寬 26、高 26 厘米（图 4）；并得小木架一具，架腿腐朽，因出土时零散地夹在淤土中，它是否为盛放小木棺用的，不能确定，全高 18 厘米（图 5）。在墓底北部，发現有火葬的骨灰一堆。

随葬品有小瓷碟两件，一件小圈足較高，口沿微外捲，胎細而薄，呈半透明状，白釉带天青色，是汝窑的产品，口径 10 厘米（图 3 ③）；另一件为浅圈足，口沿呈折曲形，胎細略薄，乳白色釉，是定窑的产品，口径 10.5 厘米（图 3 ④）。

### 第三号墓

位置紧靠第二号墓，在其南面約二米处，清理时发現墓內已积滿淤土，墓口外露，墓室砌法略同于第二号墓。墓底平面为正方形，共用八块直紋砖砌成，长寬各为 68 厘米，墓北偏东 20 度。无葬具，只在墓底有火葬的骨灰，也无其他随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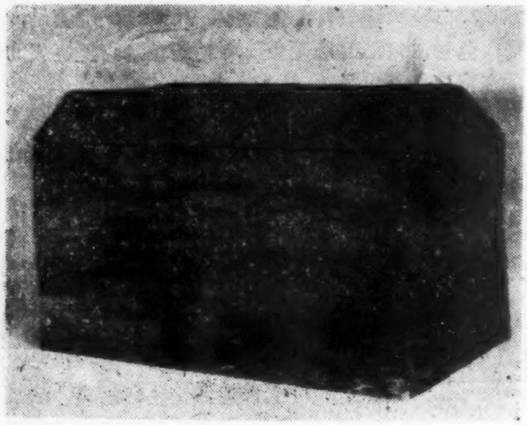



3　白瓷碟(1)、白瓷杯(2)、小瓷碟(3)、小瓷碟(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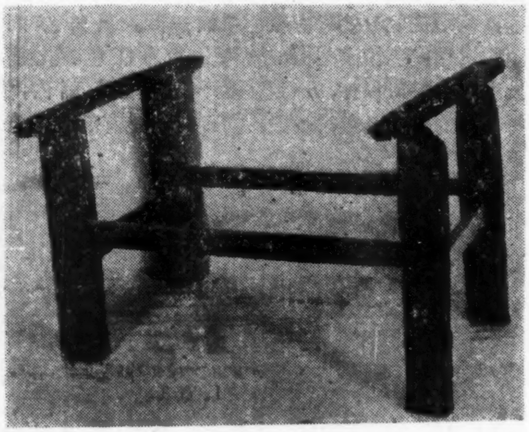
在辽金元时期，北方各地都流行火葬制度，这三座古墓都采用了火葬制度，从第一号墓的形制及随葬的印花陶器来看，仿古銅器的制作，不能早于北宋后期，而这两件仿古銅器的陶器，也不可能是辽代的作品，因而这座古墓有可能是屬于金代；第二、三号墓的形制相同，它們可能由于阶級和貧富的关系，而形制都不同于第一号墓，但从第二号墓出土的文物和葬具来看，它应和第一号墓是同时代的墓葬。这种小木棺的埋葬制度，过去曾在該旗井沟子村发現过，并推断为契丹人的埋葬制度(注)。由此可見，这种小木棺葬的年代和族别問題，是值得商榷和今后繼續調查研究的。

---

注　汪宇平："內蒙古文物組調查契丹族遺址"，載文参 1955 年 8 期 152 頁。



4　二号墓出土木棺



5　二号墓出土木架

博物館藏品

# 商周时代的几件玉雕

——天津艺术博物館藏——

范汝森

琢玉是我国有悠久传統的工艺。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中就偶有玉質者，但制作簡朴，多为实用的生产工具，到了殷商时期，琢玉工艺放出了灿烂的光輝。

玉，它的質地坚潤美观，出产在高山深谷中，古代因交通地理及制作工具等条件的限制，采覓和琢制困难，所以十分珍貴，玉器几乎都为統治阶級所服用。

这里介紹天津艺术博物館珍藏的几件古代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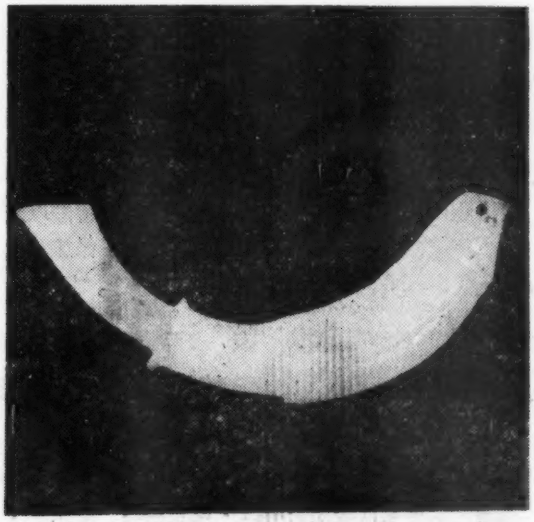
商代玉牛首：花紋多用直綫条构成，形状和銅器上的兽面紋很相似，但有角，看来又象牛首，是具有高度的想象力的艺术作品。

商代玉魚：通体晶瑩透明，古人以魚来象征吉祥，多用它制为佩飾。魚身只用了很少的綫条，并用穿綫孔作为魚的眼睛，那种张口掉尾迴身的形象，极为生动可爱。

东周透雕人形玉飾：色澤溫潤，双面花紋作人形，玲瓏剔透，疏密有致，是件极为罕見的珍品。

战国人形玉飾拓本
长12.5、寬4.2厘米

商代玉牛首 长4.1、寬3.8厘米



商代玉魚 长6.9、寬1.3厘米

# 牛　　鐙

——湖南省博物館藏——

高至喜

牛鐙銘文拓本

銅牛鐙1949年（解放前不久）出土于长沙北門桂花园。顏色淡綠，高50、长40、寬25厘米，灯盘外径16.7厘米。形象似牛，耳下垂，腿矮小，造型生动。两角从背上两側以圓管状向上竪立，幷折曲会合为一，向下扩大呈复碗状，作为“出烟管”。背中心有一圓洞，洞上置一带把圓灯盘，盘中有錐体，盘边緣設槽，用以放“挡风板”，防止被风吹熄。腹中空，可以盛溶液。在点灯时，烟通过“烟管”，到达腹中，因而能保持室內清洁，右側还有“敕庙牛鐙四礼乐长监治”十字銘文。同时出土的有一附耳矮足銅鼎，上有“长沙元年”的年号，鼎的形制，是西汉常見的器形，又有长沙元年年号，因此牛鐙的时代，当屬西汉，幷与长沙元年相距不会太远。（图見本期封面）

## 保加利亚博物館代表团在我国訪問举行座談

五月二十五日，首都博物館界在故宮博物院絳雪軒邀請了保加利亚博物館代表团米尔契夫同志和札姆博夫同志举行了座談会。参加座談的共四十余人，座談会由吳仲超院长主持，首先他代表中国博物館工作者表示欢迎他們这次的訪問。吳院长和历史博物館副館长韓寿萱分别介紹了这两館建国以来的工作簡况，米尔契夫同志接着也介紹了保加利亚博物館发展的历史及保加利亚的考古工作、有关博物館陈列的技术問題。札姆博夫同志首先着重談到在党的領导下中保两国工作者的友誼，然后談到参观我国各地博物館的印象，談到文化部应帮助各地进行革命斗爭史陈列、博物館陈列生产工具、博物館工作同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結合等問題。座談会始終在兄弟般的友誼的气氛中进行。

## 德国艺术史家代表团在我国訪問举行座談

根据中德文化协定来我国訪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史家代表团布魯諾·佛衣格特、維尔那·諾特等，六月四日应故宮博物院的邀請在故宮博物院絳雪軒举行了座談会。該代表团从五月中来我国后，陆續参观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洛阳等地博物館和考古发掘情况。座談中，他們对这次到我国訪問表示滿意，佛衣格特同志介紹了柏林国家博物館为庆祝我国建国十周年筹备展覽会等情况，座談最后在友好的气氛中結束，故宮博物院吳院长幷将出版物贈給代表团以示感謝。

# 瓷·器·浅·説(續)

馮先銘

二、各窑瓷器特点

前节簡略地介紹了唐宋两代古瓷窑的分布情况，本节起按照前面次序择要的介紹一些瓷窑，对于窑址分布說明表格中窑址尚未发現或传世瓷器很少，不足以說明全貌的暂不介紹。本节先介紹河北省古瓷窑。

（一）定窑

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澗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宋时屬定州，因此称为定窑。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与汝、官、哥、鈞窑同时并重于世。五大名窑中汝、官、鈞窑以釉色見长；哥窑以紋片著称；而定窑則有着丰富精美的装飾花紋。正因为定窑的花紋有很高的成就，当时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瓷窑都爭相模仿，明、淸两代也多仿烧。

对于宋代这样一个名窑，我們怎样認識它呢？我們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文献記載去探討，另一方面是从实物来印証研究。关于文献記載方面，从宋代到清乾隆时期止，我們看到的有关材料有十多种：

1. 宋陆游老学庵笔記："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2. 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青窑器。"

3. 宋周密志雅堂杂鈔："金花定椀用大蒜汁調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脫。"

4. 明曹明仲格古要論："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眞，划花者最佳，素者亦好，亦有綉花者次之。宋宣和、政和間窑最好，但难得成队者。有紫定色紫，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东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

5. 明张应文清秘藏："定窑有光素、凸花二种，以白色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泪痕者佳，間有紫色、黑色者，不甚珍也。"

6. 明田艺衡留青日札："似象窑色，有竹絲刷紋者曰北定窑；南定窑有花者出南渡后。"

7. 明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瓶，口有四紐，斜烧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

8. 明稗史类編引志雅堂杂鈔文。

9. 明谷应泰博物要覽："定器有画花、綉花、印花三种，多用牡丹、萱草、飞鳳三种。时造甚有佳器，式多工巧。定窑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时为御府燒造，色白質薄，土色如玉，物价甚高。其紫黑者亦少有，余見一、二种，其器色黃質厚者下品也。又若骨色青涸如油炭者，彼地俗名后土窑，又其下也。近如新仿定器如文王鼎爐、兽面戟耳彝爐，不减定人制法，可用乱眞。"

10. 清唐衡詮文房肆考引格古要論、清秘藏、留青日札与博物要覽諸文。

11. 清南窑笔記："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种，名定州花磁是也。尊、爵、盘、碟、佛象及各种玩器，雕琢精巧，靡不全具，間有花紋內填采綠色者。"

上述記載中，宋代老学庵笔記及坦斋笔衡两書都說定窑不入禁中是因为口部沒有釉子不好用，而为汝窑所接替。志雅堂杂鈔記載了定窑的一个品种和它的制做方法。留青日札的記載不够清楚，象窑是什么釉色，現在我們还不知道。对于定窑有南北之分，北定特点为竹絲刷紋，南定特点为有花的說法，也談得过于簡单。妮古录所談上面斜烧"仁和館"三字的白瓷瓶，应当屬于辽瓷而不是定瓷。从富弼使辽行程录中提及的"临都館"、"松山館"、"官窑館"等名称来看，"仁和館"这三个字很可能是个辽地名，同时辽瓷中常見上有斜書"官"字及斜刻"官"字的，并且在定窑中从未見过有四紐瓶，在窑址的碎片中也沒有看到过紐，倒是辽瓷中这种四紐瓶比較常見，因此妮古录称这种瓶为定瓷是有問題的。稗史类編、文房肆考两書都是引用前人的記載。清秘藏、博物要覽、南窑笔記三書虽談得比較具体，但都不及格古要論的記載詳細和全面，因之它最有参考价值。

关于从实物来研究印証方面，最好的方法是調查瓷窑遺址，因为窑址的材料是最眞实的、最可靠和最全面的，从实地調查得来的材料也是最科学的。

多年来人們对于定窑的窑址做过了四次調查。1922年定窑窑址第一次为叶麟趾先生所証实。抗战期間日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叶著"古今中外陶瓷彙編"的綫索前往窑址調查。1951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为了解决曲阳澗磁村是否定窑遺址的問題，做过一次調查。1957年笔者为解决定窑的上下限、紫定和黑定問題，再次去調查，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根据上述两方面的材料可以有以下四点認識：

一、定窑的上下限

关于定窑的烧造时間，格古要論曾說以宋宣和、政和間窑最好，由此可以知道定窑烧制最好的时期

是北宋末期(1011—1025年)。但根据宋会要記載：“磁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磁器及漆器以給用，以京朝三班內侍二人监庫。宋太宗淳化六年七月詔磁器庫納諸州磁器拣出缺璺数目等第科罪”。可以知道在北宋初期淳化六年（995年）定窑就已經烧制得很好，而且为宮廷烧制器物。而吳越备史卷四里提到“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謝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瑪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株。”时間又提早了十五年，从这段記載还可知道北宋初期定窑已經复烧，而为吳越鑲上金口来供奉宋代宮廷。更早的記載当屬曲阳县志，在該志卷十一里有：“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碑在法兴寺之西数十步，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鎮使鈐轄瓷窑商税务使馮翱。碑立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二月（957年）。”这个記載又較前書提早了二十三年，时限提早到五代末期，而且可以看出当时生产量很大，以致官府要設官收税。文献既已明白指出定窑的烧制上限早到五代末期，那么这种定窑的早期瓷器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形状呢？这就是我們前年去調查要急于解决的一个問題，在这次調查中采集到了二十多片典型的造型为唐代与五代造型特点的白瓷碗碎片，而这样的碗片，过去多被中外談瓷的人列为邢窑的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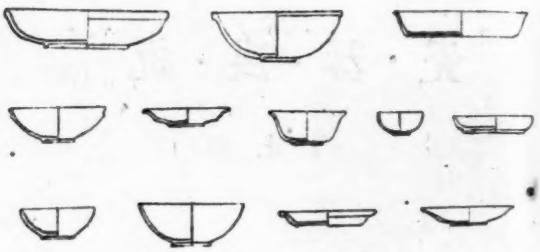


插图1　定窑盘盌的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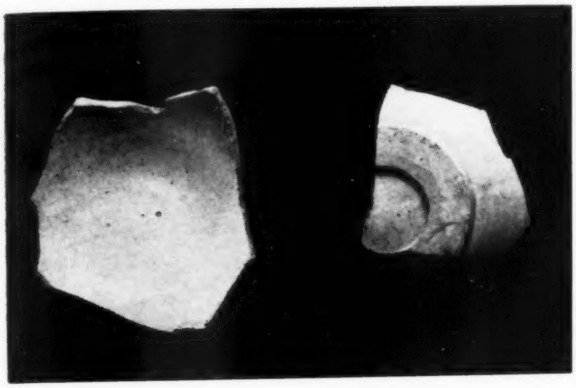
器（图1、2）。这些唐瓷标本的发現，不仅提早了定窑的烧瓷上限，同时給我們提出了邢窑、定窑同时并存的問題，两窑之間的关系也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

关于定窑的下限究竟晚到什么时期，从采集的两千多片标本中看不到有晚于宋的造型器物。因此笔者認为庄季裕鷄肋篇：“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經过，尽皆焚燹。”的記載是解决定窑下限一个比較可靠的旁証。处于“凡所經过尽皆焚燹”的情况下，定窑很可能同样无例外的遭到破坏，工匠逃散轉到景德鎮等地，因而定窑停止了生产。

## 二、定窑的装飾花紋及造型

定窑的装飾有印花、刻花、划花三种，印花用模子压印，刻花划花用竹或金屬工具划刻。刻花的效

插图2　定窑花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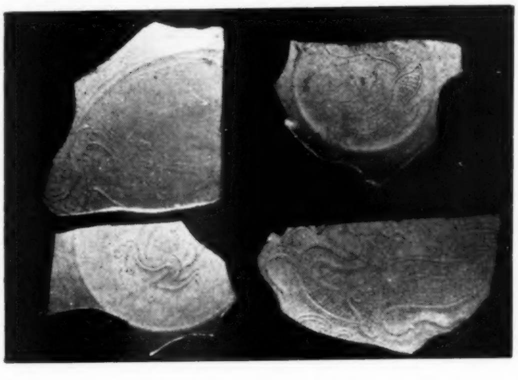


1. 定窑唐盤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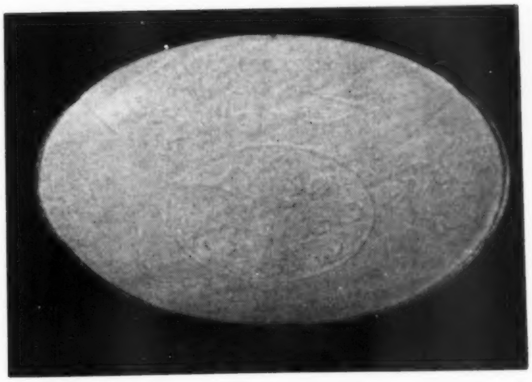
2. 五代定窑盤残片

3. 宋定窑刻蓮花碗

4. 宋定窑刻蓮花紋盘



5. 刻划各式龙紋宋定窑残片



6. 宋定窑划花蓮池游鴨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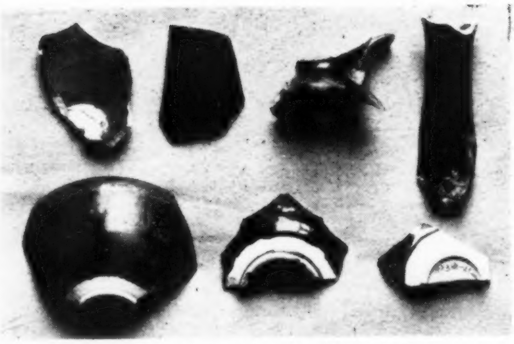
7. 宋定窑印花云龙盘

8. 宋定窑划花瓶

9. 宋定窑划花瓶

10. 宋定窑划花唾盂

11. 宋定窑紫釉瓶盤残片



12. 宋定窑黑釉瓶壶盤残片

插图3 宋定窑銘文拓本

果綫条較寬，有明显的刀鋒；划花的效果綫条較細，实际上两种都是屬于刻的技巧，沒有显著的区别。

刻花器皿最常見的是蓮花紋（图3、4），这种花紋在澗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刻划海水双魚紋的数量（参見本刊上期"定瓷的装飾艺术"一文插图）也不少，此外还有刻划各式的龙(图5)、螭和蓮池游鴨（图6）等的。

印花的以花卉紋为多，在整个盘的里面布滿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花朵，花紋的层次分明，并不給人以繁瑣的感覚。常用的花卉有蓮、菊、牡丹、梅等十多种（插图2），其中的"富貴宜男"为二裸体婴兒嬉戏于花間（俗称太子玩蓮）。这种装飾图案在宋代瓷器与織綉中是常采用的，在定瓷耀瓷和景德鎮影青瓷器上都見到过，不过定瓷的較为少見。印生物的有飞鳳、鴛鴦、雁、牛（插图2），印云龙紋的碎片在澗磁村法兴寺遺址上散布最多，完整留传下来的很少，图7是一件完整的大盘，中心的龙姿态矫健，四围环以云紋，綫条清晰，是定窑印花瓷器的一件有代表性的作品。

定窑的造型就传世器皿和窑址散布的大量碎片来看，盘碗占絕大多数，造型多种多样（插图1）。盘碗等以外的器皿所占比重很小，图8、9两件瓶造型都很优美，图10唾盂更是一件定窑中罕見的作品。

三、紫定、黑定与綠定

1. 紫定　关于紫定的釉色，格古要論只說它色紫，沒有提出它相当于什么顏色；项子京历代名瓷图譜形容紫定如熟葡萄如茄仓。笔者認为所謂紫定实际上是一种醬色，这种釉色与我們日常生活中食用的醬顏色相同，在窑址調查时我曾采集了三十多片（图11），沒有看到与葡萄和茄子相近的釉色。

2. 黑定　格古要論形容它色黑如漆，这个形容是比較恰当的，在采集的四十多片碎片中，大部分是色黑如漆，而胎骨洁白，黑白两色成为强烈的对比（图12），这就无怪当时"其价高于白定"了。

3. 綠定　綠釉的定器不見于任何記載，以往也沒看見过这种瓷器，調查中采集了两片盘子的残片，一片光素，一片里刻龙紋，龙紋及造型都与白定刻龙大盘完全相同。据当地农民談，过去曾出过綠釉瓷瓶。根据这些材料，我們可以确定綠釉也是定窑的一种，从而使我們对于定窑有了更进一步的認識。

四、定窑的銘文

定窑带銘文的多在白釉瓷器的底足內，字多直行划刻。横刻銘文的只見到刻"尙藥局"三字的白釉深碗和盖盒，銘文写法由右向左。定窑銘文較多的为"尙食局"，三字直行划刻，多为大盘，調查时曾采集到三片。早年流出国外的一件盘子，盘底直刻"会稽"二字，盘的造型为五代时的风格，可以肯定是吳越錢氏定烧的瓷器。盘底刻一"官"字的曾見有一荷叶形小盘，辽宁省建平县辽墓出土有"官"、"新官"銘文的白釉瓷器多件，究竟是定窑还是辽瓷仿定窑的作品，沒有看到实物尙难判断。調查中也采集有一件"官"字銘文残片。此外，还采集到一件直刻"五王府"三字的残盌片（插图3）。就象晚明时期景德鎮青花瓷器底足內書"德府""赵府""潘府"等字的一样，都是宗室王府的定烧瓷器。上述"尙藥局""尙食局""五王府"和"官"字銘文的瓷器，銘文都是在烧制前划刻的。故宮博物院所藏定窑实物資料中有底刻"奉华""鳳华""慈福""聚秀""禁宛"銘文的，而在一件宋汝窑出戟尊上也刻有"奉华"二字，两者銘文相同。"奉华""鳳华""慈福""聚秀"当为北宋宮殿名称，"禁宛"銘文的含义較广，带有宮廷的含义，"宛"字似为"苑"字之誤。这五种銘文是瓷器到宮廷后刻的，字体都比較秀丽。"奉华""鳳华""慈福""聚秀"这些宮殿名称从未見諸記載，这一点倒可以补文献之不足。

文献記載常有以泪痕为定窑的唯一特征，甚至以此作为鉴定眞假的唯一尺度。泪痕的确是定窑的一个特点，但定窑并不一定都有泪痕，泪痕是因为釉子施厚了往下流而留下的痕迹，施釉薄时就沒有这种現象，这点是値得我們注意的。

# 文物工作報導

## 河北省

### 邯鄲王郎村清理了五十二座汉墓

陶棺墓

1958年6月河北省文化局邯鄲发掘組，在邯鄲市西約二里王郎村清理了汉墓五十二座。墓地在該村西边約半里王郎村窑厂附近，据了解，这里不仅是汉代的古墓群，在附近路沟的断崖上还有战国时代的遺存。发掘区在窑厂的东南角，这里古墓分布相当稠密，墓与墓相距很近，常有三或五座相互打破的現象，这次清理的五十二座墓，占地面积仅900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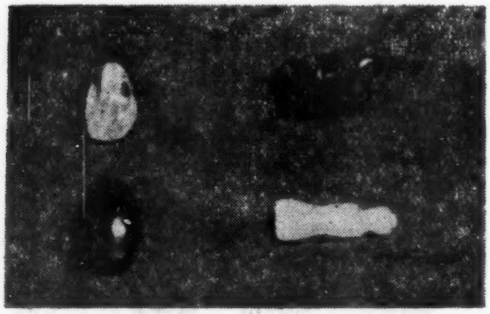
墓的結构可分豎穴墓和砖室墓两种：

（1）豎穴墓：共四十三座，皆为略呈长方形的豎穴，一端較寬；一端略狹，口与底同大，四壁垂直，墓的大小以底計算，长1.42—3.23米，寬0.60—1.00米，这些墓都只有墓室而无墓道。第41、43、48号三座墓并有生土二层台，值得注意的是33号墓底为台阶形，在墓室的西部留有一生土台，上面放棺，这种作法与砖室墓中棺台作用相同。

（2）砖室墓：共九座，皆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墓的大小以底計算，长1.92—4.28米，寬0.52—1.00米，墓室的砌法除1、2、4号三座为四壁砌砖外，其余皆为三面或两面砌砖，其余就土壁形成四框。除1号墓为船篷式券頂外，其余都在砖室上平鋪木板，可能是起着椁的作用。墓底除4、6、20号三座鋪有单层人字形外，其余皆为生土底，而1号墓底只在南北两端鋪砖两道，这种做法可能是起着架棺的作用。

墓的方向，大部皆为南北向，东西向的有十六座。

葬具：在五十二座墓中除十五座因棺痕不太明显，不敢肯定是否有棺外，其余皆用木棺，20号墓保存最好，棺长2.10米，寬0.70米，前高0.60米，后高0.40米。在这些棺的底下发現有白灰痕迹。五十二座墓中只四座有棺釘，此外，还清理了三座埋葬兒童的陶棺墓，棺用陶土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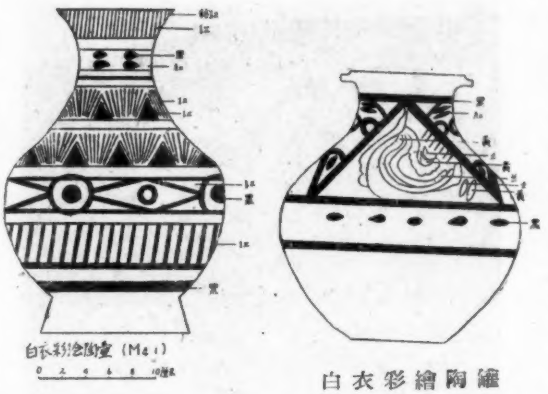
上：水晶珠（左）　黑青蛙（右）
下：瑪瑙珠（左）　玉石人（右）

成，略似空心砖，棺四壁素面无紋，上面以砖封盖，这种葬法以往还沒有发現过。

葬式：所有墓皆为单身葬，其中以仰面伸直葬占多数，屈肢葬仅有七座。

殉葬器物很少，在五十二座中只出有百余件。陶器中以灰陶居多，釉陶只四件，一般墓中往往放有两件陶壶或两件陶缸，有的并配以陶尊。在壶、罐的表面除少数在腹两侧印有鋪首衔环外，有九件表面先塗一层白地，然后用黑、紅、黄、蓝四色画成图案式花紋。其他如陶罐、白衣彩繪陶俑、陶圈数量不多，只限于个别墓中。銅器中有銅鏡五件，两件照明鏡，两鏡为日光鏡，一件銘文为"見日之光，天下大明"；另一件为"見日之光，长毋相忘"。規矩鏡一件，在規矩和四乳間飾有四神，配以鷄和长尾兽等花紋。三稜形銅鏃八件，个别的一側边有三角形血槽。此外尚有銅鈴、蛇形、孔雀形、兽头形带鈎。正方形阴文銅印一枚，背上有环状鈕，篆体字，文为"楊係"当为墓主人的名姓。貨币

彩陶俑



白衣彩繪陶罐

中有东、西汉五銖、大泉五十、剪边五銖等。鉄器共得十件，器形有鏃、带鈎、刀三种。錫器四件，有环形及梅花形飾。殉葬品中除上述几种外，在2号墓还发現水晶、瑪瑙珠、白玉石人、黑石青蛙、料珠，这几种遺物在小型汉墓中以往是不多見的。漆器多已腐朽，从残痕只能看出为圓形漆盒，內放鷄骨。

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这里似是一处普通人民的墓地，就各墓中的出土的器物很单純一点看来，它与磁县講武城情况很相近。关于这些墓的年代，从出土的貨币来看最早不超过西汉末，最晚也应在东汉晚期。

（唐云明　江达煌）

## 山西省　大同西南郊发現三座辽代壁画墓

1957年9月与今年6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在大同西南郊两次清理了三座辽代砖室壁画墓。三座墓都位于大同西南郊平原地区，其中两座在十里舖村东約一里处，两墓东（27号墓）西（28号墓）橫列，相隔約2米，墓室均保持完整，室內壁画彩色鮮明。另一座（29号墓）在新添堡村东北約百余米处，墓頂部坍塌，室內壁画模糊不清，部分脫落，內有辽"天庆九年故彭城刘公墓志"一块。

这三座墓的結构形式完全相同，都是圓錐形单室砖墓，坐北向南，圓形起券，墓頂距地表深2.5—4米，墓大小相仿，現以27号墓为例，簡介如下：該墓室底直径1.45米，由底至頂，全高1.75米。建筑材料是用长38、寬19、厚7厘米的沟紋条砖，錯縫平砌，并用紅褐色粘泥勾縫，室內周壁白灰面上施彩色壁画，室底后部倚壁砌半圓形棺床，高20厘米。室前用条砖砌圓拱頂墓門，南北长40、东西寬50、高75厘米。封門用等边38厘米的沟紋方砖。門外接連阶梯土墓道，共为七級，全长2.8、寬0.6米。墓內用黃白釉刻花瓷罐盛骨灰，与骨灰伴出的有"开元通宝""咸平元宝"等銅錢八枚。

29号墓是用石棺作葬具，与骨灰伴出的有"乾元通宝""皇宋通宝"等銅钱36枚；28号墓內葬具与随葬品全无。27、29两墓的随葬品有：白瓷碗、碟七件，其胎質細膩，釉色乳白，类似定窑作品；白瓷小鉢、砂陶八角印紋盘、陶长方形盘、陶水斗、鏤孔高足陶盘、陶壺各一件；大小砂鍋二件；黑釉高足瓷瓶二件。

27、28号墓的壁画基本相同。制作方法，是在已砌好的砖壁上，先抹紅褐色粘泥一层，再抹白灰一层，再在白灰面上以墨綫勾出輪廓，然后着朱、黃、蓝等彩色。其內容繪有影作木建、人物、花卉等。室壁四隅，以朱色繪四柱，柱头上有加黑边的一斗三升栱。室頂繪作天空，有金鷄、桂树、玉兎，并点綴有粉紅色星球。棺床上繪朱色蓮花毯。

墓門东西內側壁繪两个門卫，側面相对，头有髮髻，着浅蓝色上衣，袖手抱杖守門而立；正中一幅，中間繪花卉围屏三条，上悬黃色帷幕，围屏两旁繪二女侍；东壁一幅繪一老翁与鼎、罐、勺、鐘等用具；西壁一幅繪車馬出行图。

29号墓的壁画是內外两层，內层壁画內容与27号墓基本相仿，外层壁画分为上下两部。下部画在室內的周壁，上部画在室頂。塗彩有朱紅，浅蓝，米黃等色。下部四壁的壁画，內容为車馬出行、設宴、走廊与围屏。

上部室頂壁画繪有云气、星球，并在云气內繪有姿势不同的双头人及仰面而坐状、伏卧等人物。

（边成修）

## 陝西省　乾陵勘查情况

乾陵位于陝西乾县西北十三里的梁山上，它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后则天的合葬墓。1958年12月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会为配合乾陵水庫工程，派員曾对該陵进行了勘查。已找出陵的墓門和隧道的上部情况，同时也勘查出乾陵的內城遺址全部范围。这个墓門及隧道全是在自然形成的一个石灰岩石的山上凿成的，隧道呈斜坡形，正南北方向，长約达65米，东西寬約3.87米，深度只勘查出2.75米。隧道口及隧道底的深度由于道內全为鉄拴板（群众称为鉄䥫板）石条所堵塞，无法勘查，略悉墓門即在隧道的北部，墓門及隧道內用石条叠砌，石条之間用鉄拴板連接起来，同时鉄拴板与石条之間的空隙用白鉄浆灌縫，以資坚固，隧道內除用石条叠砌堵塞外，其上部皆为夯土，相当坚固。鉄板大小不一，有的长达24、头寬12、厚6.5厘米。有的长达18、头寬10、厚5厘米。其重量为10—20斤不等。

另外探出了乾陵的內城遺址范围，城遺址四面墻基比較完整，地面上残存的唐代砖瓦片、石条等遺物很多，特別是內城遺址四角的土墩残迹很显著。勘測城东西全长1450米，南北全长1582米，墻基寬为2.10—2.5米不等。

这次对乾陵的隧道墓門及內城遺址的勘查，給今后对乾陵进一步研究或发掘提供了必要資料和有利条件。

（楊正兴）

## 江苏省　宜兴发現六朝青瓷窑址

今年5月1日在江苏省宜兴县鼎蜀鎭湯渡西南一里半均山北麓斜坡上"小碗窑"地方，最近发現六朝青瓷窑址

一处。窑址主要部分是一直径20米、高4米的圆丘，基部露出砌叠齐整条石，頂上堆积大量窑具和青釉瓷片，附近20米半径范围內，也有同样残片分布，窑址尙未受到扰动。这是江苏省已經发現的唯一瓷窑，为历代文献所未記载，对于研究我国陶瓷发展和江苏省陶瓷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員会）

安徽省

## 繁昌县古代炼鉄遺址

1958年10月間，繁昌县黄滸人民公社的鋼鉄战士們，在鉄塘冲开采鉄矿石，发現鉄屎墩藏有大批的鉄块（图1），經过勘查，发現鉄屎墩的下层，还有鉄炼渣、紅烧土等炼鉄的痕迹，确定为古代炼鉄遺址。以后又在竹园湾，三梁山、鉄牛山等三地发現古代炼鉄爐址六处，废墟墩十处。以竹园湾門前爐址較为完整，爐膛內尙存有未炼成的鉄块、栗树柴炭、石灰石块等。废墟墩以竹园湾鉄屎墩最大，高約2米，面积約750平方米。善峰山发現古代开采鉄矿石井口一处（图2），出土有条形鉄刀一把，圆形鉄鎚一柄（根据开采工人反映，两物均在工地遺失）。依各遺址伴随出土的唐宋陶瓷片及爐砖形制的推断，炼鉄时間約在唐宋时期。

炼鉄爐的結构，与現在繁昌县桃形炼鉄爐的形式很相近，平面为圆形，直径1.15米左右，現存高60厘米，爐壁厚36厘米。壁用長方形的灰砖（長32、寬20、高10厘米）立砌，內壁搪4厘米的耐火泥，泥中羼大量的粗砂粒，以增强耐火的較度。爐門寬約60厘米。爐底下层鋪長方形的灰砖，上层搪羼合大量砂粒的耐火泥，厚約17厘米。

按竹园湾和鉄牛山两处爐址遺存情况，唐宋时代炼鉄的方法，是先将栗树柴鋪在爐膛的下层作燃料，后将破碎的鉄矿石和石灰块。两者直径皆1.5厘米，鋪在上层，最后燃火冶炼。

1.鉄屎墩出土鉄块

2.善峰山古代采鉄矿石井口

从鉄塘冲經三梁山、鉄牛山至竹园湾十里范围內，除发現較大的六处炼鉄爐址和十七处废墟墩外，还有許多零星炼鉄遺址。由此証实該地区在唐宋时代，炼鉄作坊星罗棋布。但在这些遺址中，沒有发現鑄鉄范和成品，都是鉄块。可能由于这时冶鉄工业的发达，冶炼技术的提高，冶炼和鑄造有了分工。冶炼作坊設在矿山附近，专門冶炼矿石。因此，可以推測所发現的遺址，皆为炼鉄遺址。

（胡悅謙）

福建省

## 太宁县发現了一处宋代木构建筑

福建省太宁县城南三十里的長滩地方，巍峨的聳立着一座叫作甘露岩的山岩，山岩底部有一个半露天的岩洞，高达80米，寬30米，深20米，洞外古木参天，洞內有四座不大的殿宇建筑，风景幽美，是太宁县的名胜之一。

最近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会普查全省文物时，調査了这組建筑，发現在建筑物的梁架上和粉壁上还保存着許多宋代以来的墨笔題記、題詩和壁画，原来这里是一組十分珍貴的宋代建筑。

这四座殿宇是蜃閣、上殿、南安閣和觀音閣。它們是依岩势修建在洞內木栈上。在前方的是蜃閣，閣面寬三間，进深二間，屋頂墁草泥、无盖瓦，閣內供佛象，閣內梁架上有墨笔書写的宋代紹兴十六年及开岩僧募款与善男信女捐款等事宜的題記。

紧靠着蜃閣之后，居高临下的是重檐歇山頂的上殿，殿內有佛龕及佛象，斗栱梁架上还保存有剝落的土白、土黄、土紅彩繪的卷草花紋。在梁架上有明代万历廿四年修繕屋頂板的墨笔題記。在殿壁的白灰墻上布滿了宋代嘉定、咸淳、开禧，元代元統、至正，明代崇禎，清代順治、康熙等各代的紀游題詩，眞是琳琅滿目，美不胜收。

蜃閣的左右两方是南安閣和觀音閣两个形式相同的建

筑，南安閣內有宋乾道元年建造时的題字，壁上有以閻罗、神怪、飞天等为題材的壁画，壁画上写满了宋代以来游人的題字。

观音閣的建筑时代从墨笔題記可以知道修建时是宋代紹兴廿三年。这里現在是僧人的膳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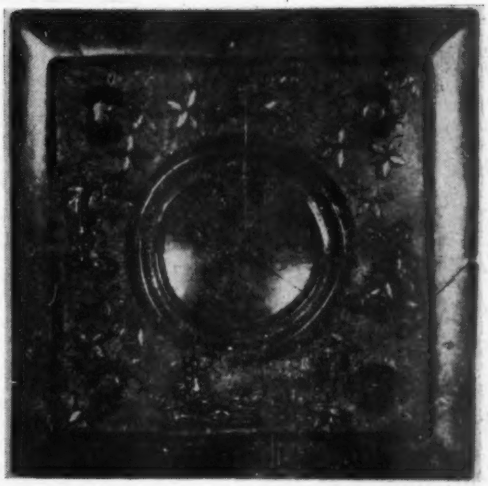
寺內还有三块碑刻，从碑刻記載、建筑內的題字和建筑結构上看，这組建筑建于宋代，中間曾历經各代修繕。我国古代的木构建筑，保存在南方的极少，这次却发現了这样一处有着丰富壁画、題詩的建筑，是十分珍貴可喜的事。（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会）

## 广东省 陈大年先生将珍藏文物献給国家

最近广州市文史研究館館长陈大年先生将他本人珍藏的一批文物捐献給国家。捐献的文物共有四百余件之多，包括銅器、鉄器、漆器、木器、滑石器、泥陶器、竹木器、玉器、皮革、絲織品残片和琉璃、水晶等。无論在数量上、質量上和文物內容方面都是相当丰富的。

陈大年先生这次捐献的文物，鏡一类，有三絃鈕兽紋的、夔龙紋的、弧紋的、四兽紋的战国时代銅鏡十六面（图1），这些銅鏡与湖南长沙楚墓所出的屬同一类型，当是楚墓出土的遺物；还有西汉百乳鏡，西汉末期或东汉早期的銘文鏡，“乔”字紋鏡和唐代海馬鏡、菱花形大鏡（直径30.4厘米）；还有“阿房”二字素面平鈕的“阿房”鏡一面和方形鏡三面。这三面方鏡，一是有“元帅本印”四字的；一件为伏猪形鈕；其余一面形制比較特殊，长寬14.3厘米，正中成圓渦形凹下，外为四叶花紋及魚兽紋，四圓鈕居于四周，边緣为斜圓形寬边。这三器較之一般銅鏡为厚重，陈大年先生認为后者是古代作取火的用具阳燧，正中的圓

1.战国銅鏡



2.阳　燧（?）

渦形凹下处是用以聚集阳光以取火的（图2）。还有用滑石磨制的作明器用的素面鏡，另外有滑石璧、木璧、琉璃璧、琉璃杯等，璧大都是刻穀紋或圓渦紋的，木璧是素面的。装飾品有琉璃珠、水晶珠等。还有一些是用滑石雕刻成的猪、龟和剑上装飾品，如剑首、剑格、璏等。漆器方面有漆俎、漆琴、漆弓、漆奩各一件和四个漆羽觴。漆琴通长56厘米，两端台部排列五孔，其余附件均已不存。竹木器方面有木俑、竹俑、木梳、木篦和猪牛羊三牲等物。木俑通高約50厘米左右，为整木雕成，其雕刻形式，輪廓綫条等都与长沙楚墓发現的木俑非常近似。銅器方面以銅鏃为多，还有銅鑾和馬含勒、車飾、鋪首、尺、权衡（包括砝碼大小六、銅盘二）、壶、鈁、鑑、案、鐎斗、鐎壶、方爐、勺等。屬銅兵方面有弩机、剑、刀和戈。銅戈三件，其柲、鐏、鐓皆全，保存得这样完整是十分难得的。鉄器方面有戟、剑、剪刀、环首刀和斧等物，其中有一把鉄剑、柄部全用玉嵌鑲，刻有精細花紋，是較为罕見的。陶器有彩繪陶壶、陶鼎各一件，从器形彩繪图案花紋来看，大概是战国时期的。明币有楚泥金板、泥馬蹄金、泥半两錢和泥五銖錢。此外，还有皮革和絲織品残片。

这一批历史文物，是陈大年先生数十年来搜集的。据陈先生說，这批文物中，有不少是湖南长沙出土的，出土后被古董商盗运到香港等地，抗战期間他在香港等地設法購得保存下来。解放后，陈先生感到党和人民政府对文物的重視和保护，为使广大群众得到更多机会欣賞研究，因此捐献給国家。今年三月間，这批文物曾在广州市文史研究館內展出，并由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員会接受并全部轉寄北京，以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館今年国庆节的陈列。（英）

湖南省 省博物館編撰 湖南文物志

为了整理历史遺产，总結解放以来新建設的成績經驗，湖南省委决定在1959—1960年內編纂湖南省志。省志計分十五类，第一类为湖南近百年大事紀述，其余为专志，"文物志"即为专志之一，由湖南省博物館担任撰写。

文物志的內容大致拟定为三大項目：(一)历史考古，将解放后九年来为配合基建所作的考古发掘四千六百多座古墓葬中出土的各朝代文物，以及对石器时代遺址的調查清理，作出綜合的叙述，給历史研究提供科学的根据。(二)历代器物。将解放后湖南省博物館及前文管会历年采集以及发掘出土的各种器物，按时代編列，俾能明了各个时代的一些器物面貌，反映当时的經济情况。对于出土的楚文物，将着重进行介紹。此次将搜集的各时代能反映政治、經济、文化、风俗、民族等情况的碑刻。同时革命文物列为其中的重要內容。(三)名胜古迹，将包括革命紀念地、古建筑、紀念性建筑物、革命先烈墓葬及古墓葬、名胜(包括著名的公园)古迹。文物志写作的体例与旧志条例式的体例不同，将以現状、沿革、历史和考証作綜合性的叙述。至于古文化遺址因屬历史考古部分；古城遺址因屬地理志范围，文物志中将不撰述。除文字的叙述外，文物志中并将附以許多精美的图版。根据湖南省志編纂委員会的要求，省志要作到以下三点：一、資料性最强，二、科学性最高，三、思想指导最明确。现在这一工作中正在积极进行中。(刘与为)

# 目 录

一九五九年第七期（总第一〇七号）


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談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簡化……郭沫若（1）

* * *

有关文成公主的几件文物……胡 嘉（5）
跋唐蕃会盟碑……张政烺（9）
八思巴朝見忽必烈壁画……安守仁（12）
故宮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朱家溍（14）
西黃寺与須弥福寿庙……朱家源（20）
关于駐藏大臣的几件文物……张 林（23）
1904年西藏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軍的几张图片……謝 平（27）

* * *

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几件革命文物……（29）

* * *

东阳木雕与建筑上的木雕艺术……賀鳴声（32）
湖北均县武当山古建筑調查……湖北省文物管理处（35）
金殿……李竹君（38）
紹兴大禹陵及兰亭調查記……陈从周（40）
故宮御花园……王璞子（44）

* * *

关于水力冶鉄鼓风机"水排"复原的討論……楊 寬（48）
战国題銘概述(上)……李学勤（50）

* * *

河南南召二郎崗新石器时代遺址……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55）
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簡报……李庆发（60）
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鎮金墓……李逸友（63）
博物館藏品 商周时代的几件玉雕……范汝森（65）
博物館藏品 牛鐙……高至喜（66）
瓷器浅說(續)……馮先銘（67）
文物工作报导(八則)……（72）


封面：湖南省长沙出土的汉代牛鐙

内蒙古自治区昭盟巴林左旗
林东鎮金墓出土陶器

(文見 63 頁)

1. 陶　　瓶

2. 陶　　鼎

# 最近出版新書

## 北京古建筑

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筑理論及历史研究室編

內容包括：城市、宮殿坛庙、园林、住宅、宗敎建筑、陵墓等。每一部分均有簡要的說明，是全面系統地介紹北京古建筑的一部好書。

图版222幅　彩版10幅
12开　精装　14.00元

## 宋米芾二帖册

故宮博物院藏

珂羅版影印　宣紙4开　綫装　2.50元

## 北　海（彩色图片）

文物出版社編

46开　彩色銅版精印　0.50元

## 考古敎材（重版新書）

科学院考古所編

32开　平装　报紙印　0.50元

本書由我社內部发行，讀者可向北京景山前街故宮內文物出版社邮購部邮購。

## 魯迅墨迹（二）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

32开　0.30元

## 延安革命紀念建筑

內容包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会址、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書記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会、八路軍司令部、解放日报社、魯艺学院等革命紀念建筑，还有毛主席在枣园写过"論联合政府"等名著的住宅、閱讀書报的地点以及中央各首长的办公地点和住宅的外景。全書共有图五十余幀，并有文字說明。

延安革命博物館編
銅版紙精印
25开　平装　0.50元

文物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書店发行



文物

（月　刊）

第七期　（总107号）

1959年7月8日

編輯者　文物編輯委員会
北京故宮內
电話4局1440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每册0.50元

預訂价目

| | |
|---|---|
| 三个月三期 | 1.50元 |
| 半年六期 | 3.00元 |
| 全年十二期 | 6.00元 |

平邮在內挂号費另加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邮局新聞稿件另寄整付許可証第22号　　本刊代号 2—27